

# 漫议全球化

朱厚泽

全球化是当今涵盖面最广、影响最大、渗透最深、最突出的全球趋势。

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如果从地球上处于不同地区的各部族、各民族之间的人们要求相互交往来说，这是古已有之的了。原因很简单：自然资源在地壳里的富集，生物资源在陆地和海洋里的分布，人文资源（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在地表上的聚集，都是不平衡的。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人们相互索求、相互交往的绝对性。古代部族、民族间的商业贸易关系，大体反映了这么一种需求。这是从物质经济生活上说的。

其实，人类除了物质生活，还有精神需求。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希腊大思想家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那本流传千古的名著《形而上学》中，谈到哲学和科学诞生的条件时，第一条就叫“惊异”。人们对千姿百态的大自然和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的困惑与惊奇，激起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正是这促成科学

的探索和发展。古代探险家、旅行家的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宗教徒、智者的千里朝圣、万里求学、取经……不都出于一种巨大、高尚的精神需求的支撑吗！

人类相互之间总是要交往的。当然这与近代和当今的全球交往不能同日而喻。

近代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是随着工业革命一起出现的。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它打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表现出一种外向的，突破国界、洲界的限制，走向全球的趋向。美洲的发展，经过南非走向印度和远东航路的开通，是其重要的标志和表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50 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所明确描述的那样：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似指文化或文明）”

20 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化，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表现得迅猛异常的全球化进程，是这一历史趋势在当今时代的延续和进一步的大发展，是全球化在新时代里，全方位地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全面深化。

当今全球化局面的形成和急剧扩展，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似乎与许多因素有关。

一、自然资源的富集，人文资源的聚集，始终是非均衡的。这个非均衡的绝对性，规定了扩大人类活动空间，实行对外开放，促进内外交往的绝对性。

要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各种资源配置的变化，就必须突破地域的限制，扩大配置空间，走向全球化。国家要开放，人们要交往，这都带有绝对性。

这个条件仍然是当今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因。

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创新，20世纪下半叶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数字化光纤网络通讯和卫星远程通讯技术革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使人类居住的家园——地球缩小了。

技术进步为全球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和支撑。

三、长期的冷战对峙，引发出持续的军备竞赛，给世界各国都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大量核武器的存聚，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

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谁也无法从这种愚蠢的相互对峙中得到好处。对抗毫无出路，合作才有前途。对人类自身的这种现代愚昧和现代野蛮，人类正在世纪性的反思中有所领悟。

长期冷战对峙的结束，为人类增进理解、扩大相互交往，提供了一个平和、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政治气氛。

四、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标志，封闭的“大家庭”瓦解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归一了。原苏联和东欧各国，举着各种“社会主义”牌号、自称奉行国家计划经济的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经历痛苦的挫折和历史教训的反思，走出困境，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和道路，从而使全球一体的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

正是这个贯穿全球的市场经济，形成当今全球化的经济体制基础。

五、大量军事技术转向民用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军事战备费用转向民用和全球金融实力的膨胀、扩大在全球一体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这个发展早已越出传统的“你死我活”、“你穷我富”的时代。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只有“双赢”才能持续发展。而只有全球开放，全球一体，才能为“双赢”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使多方共同发展、共同受益成为可能。

六、全球性资源、生态危机的出现，使局部、区域性问题的越出地区疆界，造成全球一体性的威胁与灾难。全球生态危机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只有从全球一体的视角，制定和遵守全球一体的协议和公约，依靠全球一体的共同行动和努力，在全球一体化中，才能挽救人类于共同的灾难和危机。

七、在历史性的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人们越来越清楚，无论是人类自身相互敌视和对抗，无论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对抗，都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决不会是人类的胜利。相反，长期的人类自身的对抗和人与自然的对抗，正在并已经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将地球搞得千疮百孔，引发出长期的生态危机；把现代蒙昧强加在全人类身上，把文明引向现代野蛮。

八、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野蛮堕落、凶险残暴、牺牲惨烈、斗争悲壮的一个世纪；又是意气风发、才智飞扬、人才倍出、成果辉煌、群星璀璨、飞跃发展的一个世纪。

经历了最惨烈的牺牲和最悲壮的战斗的人类，经历过愚昧的苦楚和启蒙的醒悟的人类，通过自身深刻的文化哲学反思，从自身的实践中有所领悟，获得人类深沉的自我觉醒，以理性的锐利目光扫视现实，以明智的博大胸怀面向未来，那将是人

类的幸运。

九、全球化最直观地从经济领域表现出来，但不仅仅是经济概念。全球化早已越出单纯经济的范围，渗透向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各个领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地球的面貌。前述那段引自 150 年前《共产党宣言》的引文，似可作如此理解吧？！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乡土观、民族观、国家观……是以全球思维替代传统思维方式的时候了，虽然人类必将经历痛苦的自我折磨。

十、全球化是什么，它要求什么？我们这一代人能达到对全球化的近似理解吗？

全球化正为人类展现出一种诱人的前景，人们已从新世纪的朦胧中感受到它将来临。

全球化是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和平代替战争，以合作代替掠夺和抗争吗？

全球化是以共存替代“一个吃掉一个”，以“双赢”替代“你死我活”吗？

全球化是以多元、开放、和谐替代那“闭关锁国”、“唯我独尊”和那永无止境的“斗争哲学”吗？

历史将表明，这一切都是肯定无疑的，虽然人类还将经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 温故而知新

李 锐

全球化问题我所知甚少，很愿意参加这个会，来学习和增加知识。

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资本主义出现就已开始；随着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当前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全球网络化”，更加促进整个经济尤其资本的全球化。超越时空，信息共享，任何一个国家都被卷入网络之内，现在国际互联网络已达 160 多个国家。

世界在日新月异，年龄大了的人都容易怀旧。多年以来我好反思过去的事情，孔夫子说：“温故知新”，不温故确难以知新。前年我发表了一篇读《顾准文集》的文章：《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谈建国后实践与理论的失误，顾准是先知先觉。此文曾引起一场小风波，我立即反驳予以平息，现在怀念顾准文章的结集就要出版了。去年十五大前夕我写了一篇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提出应当总结 1978 年以来这 20 年的经验教训，从而作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使

21 世纪的中国能走上康庄大道。这篇文章在好几种书刊发表了，没再出现任何风波。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戊戌变法 100 年，“大跃进”40 年，真理标准讨论 20 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诞辰 100 周年。值得回顾的事太多了。20 世纪即将过去，这 100 年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变化，我们要温些什么“故”呢？

这个世纪前 50 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出现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国家垄断；后 50 年冷战对峙，核军备竞赛，苏联、东欧红旗落地。可以说，整个世纪中，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对相撞，资本主义浪潮起伏，社会主义潮涨潮落，从而推动世界向前发展。两个阵营曾相互对立，壁垒森严，不仅军事、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如此，经济也是如此（斯大林提出过两个市场的理论）。冷战结束后，出现反霸权统治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大潮流。和平与发展终于成为人类与新世纪的主题。回顾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经历过多么大的痛苦，才得到这个共识；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学派、政党和各界人士的共识。今后，大家都应当为这个共识不懈奋斗。

会议的题目是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把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是很恰当的。前面提到，20 世纪的这 100 年，世界是在剧烈对撞中走过来的，不仅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大对撞，资本主义内部仍一直对撞着，社会主义国家间也有过对撞。现在世上的议论，对资本主义看好，对社会主义持悲观态度，情况究竟如何？历史和现实确在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后者来源于前者），也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也同马克思主义有关）。

马克思考虑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发达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可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却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军事封建大国；中国革命胜利时，更是农业封建大国，经济比俄国更落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后，就应当建设社会主义。原苏联和我国也都是遵循这个理论而实践的，苏联曾经几次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也曾急于想向共产主义过渡。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和高度发展的文化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用先进的上层建筑来改造落后的经济基础，即用革命的手段使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不是“发展了”而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曾经走苏联建设的道路，而且还有所发展，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 20 来年“左”的错误路线及其灾难性的实践。

当然，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时，没有想到过资本主义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也不可能想到科技革命会有如此神速而且会左右经济的发展，知识资本会日益代替人力、技术资本；也想不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商品、货币、个人物质利益原则仍如此重要，商品生产不仅不能废除，而且经济发展仍离不开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也难以预料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间会如此漫长，到了出现过社会主义国家的 20 世纪末，还无法估计这个过渡时间究竟需要多长，是百年、几百年还是上千年？当然，马克思也没有想到，曾经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会难以实现他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即人民当家作主，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为此他曾主张，管理国家的公职人员要由普选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



阶级民主。可是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大肆镇压异己，无产阶级专政同民主脱节，变成个人专制独裁。毛泽东也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一把手说了算，认为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

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资本无祖国，到现在经济、科技都向全球化发展，因此，我们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正确地看待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过早宣判资本主义寿命不长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尤其高新技术在继续发展，其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资产阶级仍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西方发达国家白领阶层在扩大，蓝领阶层在缩小。考察这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这些国家中社会党所起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者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运动，即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第二国际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双方的分歧、争论与批判可以不说，80年来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在各自国家中的所作所为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实值得探讨，不无启迪。按1996年的统计，这个宽松的社会党国际组织中，共有正式成员党80个，咨询成员党29个，观察员党20个。大多数西欧、北欧国家的社会党和左翼党，都曾上台执政或参政过，如在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等国家中，执政时间都累计在30年左右，法国和英国的也长期执政过，都曾试行过公有化、参与制、福利制等多种试验，或有成就，或不成熟，或不成功，如公有化后导致经济效率低，又被迫改行私有化和股份化，福利制也导致依赖性等。但这些国家总的趋势是生活水平较高，人均收入差距较小，社会比较稳定。总之，这些第二国际的社会党组织在资本主义现代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 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停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50年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似乎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在变化着：不仅生产力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生产关系也不断在发生变化，全部社会关系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不仅整个生产和管理，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已向全面社会化发展，而且国家干预下社会生产计划化。如资本占有与经营管理已经分离，管理功能已遍及生产和消费各个方面；国有企业的发展，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国有化，国家对金融信贷的控制；公司财产制度将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化资本；合作制企业、中小合伙企业的发展，等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固有矛盾，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了国家干预政策，利用经济计划进行宏观调控，使计划与市场有效结合。法国和日本从40年代后期到现在，一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由政府有关部门主管其事。应当说，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制度是发生了影响的。由于国家干预和工会组织等的不断斗争，在按劳分配上也发生了变化，即劳动者多少参与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分割。

可是，我们过去曾长期禁锢在这样一种认识中：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兴无灭资”，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在经济上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遗产，都打上资产阶级印记，予以排斥。为了尽快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曾经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文

化大革命”。其后果大家都知道，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遭受了多么大的牺牲：饿死几千万人，斗死多少万人（三军元帅、国家主席都难幸免），导致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泛滥，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国家走到了一条绝路。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真理标准讨论，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上商品经济进而市场经济的道路；才有了“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三个面向”；“发展是硬道理”；“不要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等内容的邓小平理论。

过去我们对资本主义尤其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认识不清楚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是认识不清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推进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创造了资本主义本身灭亡的基础。生产力是一个最活跃的因素，当然要求社会随之不断改变其生产关系，以便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变，除开一定条件下暴力革命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自然调节的原则。前面谈到，为了避免各种经济危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自然调节其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也就是所谓和平演变吧！列宁在十月革命时说过这样的话：“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国外学术界有一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论”，我没有接触过，列宁的这一提法，是否可以为之作注脚呢？资本主义在发展变化，社会主义也在发展变化。（西方学术界据说有几十种“社会主义”的称号）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俄国和东欧的左翼政党也仍在积极活动。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并无“你死我活”之争；这两种国家相互之间是可以求同存异、协调共处的。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今后世界的主题。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

李慎之

我这里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全球化的理论框架问题，第二个是全球化的大方向，最后一个是全球化的悖论。先谈第一个。人，这个物种应该是起于同一个源头的，但是在以后若干万年的过程中却由于求生存而散布到地球上各个角落，一群一群地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化。这种情况大概就是庄子说的：“道术已为天下裂”了。但它并不是“往而不返，必不合矣”。随着交通能力的进步，分散的人群又慢慢地会合起来了。到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可以算全人类又互相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因此，1492 年是全球化的开始，距今已有 500 年了。在这 500 年中，人类的交往程度大大地增加起来，开始由 1492 年前的一体多元状态向多元一体化发展，其中充满了战争、掠夺、冲突、殖民，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联合的趋势。如钱锺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992 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又一个标准，是下一个 500 年的开端。从 1992 年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

取得绝对优势。

推测全球化的方向是要一些胆量和勇气的。国际关系学界有个规矩：推测 10 年之后的事情等于胡说。现在我们索性推测长一点，也许反而可以准确一点。全球化方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人类遇到了重大灾难，如永远不断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传言，地球毁灭了，人类也毁灭了。这些我们只能不管它，不能作为推测的根据。另外，信息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发展也到了人类不能控制的地步，因为从遗传上改进智能和体能属性将首先属于世界上有特权的个人或团体，这会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起希特勒种族净化的狂想。对于人类以外的和内在的这两种情况我们都无法顾及，视为相应不理。在全球化的未来，自由将成为第一价值。计划经济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自由。自由是人类内心最高的价值追求，但是平等、公正同样是人类内心的强烈要求，这是人类第二最高价值。这两者不断发生矛盾，又不断调和，但第一第二看来任何时候不能颠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问题很明显，以至于有个法国人写了一本叫做《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书，主要是谈欧洲资本主义与英美资本主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区别，他们对平等的重视不同，但无疑都把自由放在第一位。谈到全球化的未来，必须提一下文化问题。前些年文化被炒得很热，有人把亚洲的成功看作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在我看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什么是价值？价值是所欲、所爱、所好。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生存和生理就成了最基本的，也就是最低的价值。我们谈的价值要高一点。价值至少有三个层次：乡土价值、民族价值和全球价值。三个层次的价值分别被不同地域的群体所拥有。乡土价值与民族价值，只要不强加于人，可以自适其适。全球价值已经有了，如《人权宣言》、《环保宣言》、

《核不扩散宣言》等等……但许多还不能为各国自觉遵守，而且还可能引起冲突。今后，一个民族最大的光荣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全球化的未来将是全球价值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

全球化的悖论就是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使全球化化不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国际关系中一方面全球化的力量日趋重要，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两者常有冲突。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他对这种局面的洞察，也表明对西方中心地位行将丧失的恐惧。现在西方中心很难维持下去，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世界单民族就有 3000 多个，而且又有着不同的发展，如托夫勒所说，有农业、工业和后工业文明，这种多元格局与一体化趋势，有互相促进的一面，但是相互矛盾很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已成了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有人提出把联合国变成世界政府，我想这在短时期内至少是不现实的。全球化悖论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我从来不提全球化，不提全球一体化；现在冒一句，真正的全球一体化可能还要 500 年吧！

##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

吴 江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全球化的问题。我对全球化没有研究。这里，准备就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粗略地谈一点看法。

何谓世界多极化？何谓经济全球化？这是两个有多种解释的概念，尤其是后者。在多种不同的或相似的解释中，按我个人的选择：所谓世界多极化，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用语，指世界摆脱霸权统治，各民族国家、各地区组织，包括各大国之间，都实现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权利平等，按国际协议办事，由此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所谓经济全球化，指在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无论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均实现国际化，亦称“全球的网络化”。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 20 世纪末出现，无疑是 21 世纪两种不可避免的并行的发展趋势，其关系很值得注意。

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500 年来资本主义在开拓世界



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冷酷的竞争，这种竞争总的说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资本主义初中期，以及垄断的帝国主义时期，经济还以“民族国家”为主，各强国（欧亚大陆为主）剑拔弩张，你争我夺，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一度受阻。但是，20世纪下半叶起，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科技革命，将知识引入生产函数，知识资本日益代替人力、技术资本。因此，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使用的跨国国际化呈不可阻挡之势。信息产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大、最有活力的企业。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最有活力的企业。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使各国、各地区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贸易、信息和通讯网络之内。民族国家的经济界限被冲破了，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谁也无法从这个趋势中脱身。原苏联的垮台，从经济上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僵化、封闭的经济不能适应这种新潮流所致。

但是世界市场的拓展还有其另一方面，那就是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竞相争夺世界落后地区，使之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出现强权政治、霸权政治并因此造成许多灾难。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世，虽然大大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在反法西斯战争获得胜利之后，但是社会主义的出现并未结束世界霸权统治，相反地，一度强大的苏联后来反而成为霸权的一极，造成世界两极对立，并形成长达40年的冷战局面。冷战结束，世界形势为之大变。正像二次大战后出现世界民族解放浪潮结束旧殖民统治那样，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反霸权统治的世界多极化浪潮。在这个浪潮的基础上或与这个浪潮相适应，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两种趋势并存并且同样不可阻

挡，那么，两者对世界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特别是，世界霸权是否从此就会消失？

首先要说明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影响深远。这种影响有两方面：一是跨国的经济统一运作有可能为不发达地区或发展中国家带来吸取新科技、新文明和发展经济的机遇，正好像过去的殖民统治赐给殖民地以这种机遇一样；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同样可能为不发达地区或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经济霸权的现实威胁，损害其国家主权和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就是直接与世界多极化相违。看不到这一点是危险的。

经济全球化已经达到怎样的规模？香港《信报》1989年3月31日上有一篇文章例举了几个数字，这里引用两个：就能量来说。现在每日全球的外汇交易平均超过一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5倍，是实物贸易量的50倍。国际上流动总资产近83兆美元，加上证券化和杠杆动作，可操作的资金是这个数字的数倍，是名副其实的天文数字；②就行动速度来说。在近年才开始形成的资讯社会中，全球的经济讯息，包括数据和各路人马的举措，都可在数分钟内全球分享。而资金的进出，各种投资（投机）工具的买卖，都可通过一个电话，甚至一按钮，几秒钟内完成。

还有《中国国际报》2月27日刊载的一篇文章透露以下关于国际互联网络已拥有160多个国家的5000-8000万用户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以每月10%-15%的速度增加。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网络用户将达到10亿之多。文章同样指出：“信息技术的这些发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严峻挑战。”

所以，我们在世界多极化形势下，在自身开放的格局下，必须十分注意经济全球化的动向。可能大家会留意到，江泽民

主席在九届人大香港团的讨论会上，特别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的全球化问题”。

我想，这话可能是针对这次东南亚及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冲击而言的。而这次东南亚及亚洲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属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负面反应（还是不大的反应）。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的货币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因承受不了外来国际炒家的压力而大幅度贬值所致（据香港报纸披露，美国炒家索罗斯承认，他在去年 10 月狙击泰国铢时，两三天之内动用了二千多亿美元，搞乱了东南亚，使东南亚地区丢脸。其威力实不低于美国两艘航空母舰）。而中国之所以幸免卷入，主要因为金融系统尚限于试验性开放，资本账外汇不能自由兑换，以及外资不能买卖 A 股等。一句话，中国基本上还站在全球的门外。如果中国的金融已融入全球，或者如果中国已完全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加入世贸组织（美国是狮子大张口，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标准加入世贸，并强迫中国开放更多项目的市场），那么，中国今天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

但是，中国在大力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同时，中国的经济总有一天也是要进入全球化的（香港则早已进入了全球化）。鉴于人家的血泪教训，我们，特别是我们的金融在未进入全球化之前应当怎么办，应当做好哪些基础工作和该有哪些应付危机冲击的举措，以保卫国家主权和经济上的安全及稳定。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同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也不能足不出户，只呆在国内谈改革，他们必须放眼国际，涉足国外，研究、认识和掌握经济全球化的规律，特别是发生金融风暴的规律（这是极难掌握的），并能够提出预防和对付突发风暴（大都为了实现经济霸权）的办法，这样才能谈进一步的开放。

## 全球化的二律背反

俞可平

“全球化”在这些年中成为一个时髦的术语，它本身也像麦当劳、互联网和电影“泰坦尼克号”那样被全球化了：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都在纷纷谈论“全球化”。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全球化”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全球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人们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仍在争论不休，一时间不可能，也不应当有统一的答案。但对全球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人们应当有大体一致的看法，否则，就缺乏共同讨论的起码条件。全球化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概念，这里我不想对此作全面的论述，而只想谈谈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全球化概念的内在矛盾性。

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由此产生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全球化对策：一种认为应当舍弃一切去寻求全球的同一体性；另一种则认

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特色去抵御全球的趋同倾向。这种把全球化仅仅视为一体化和同质化过程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是缺乏对全球化过程的辩证性质的认识，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首先，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化与多样性的统一（universalization/particularization）。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欧洲的起源，而成为全球的抽象；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被核子家庭取代；民主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而专制政治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但是另一方面，与上述单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市场经济虽然正在成为全球的抽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相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又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但若严格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难说是西式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可能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主权在民的基本制度。

其次，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或者说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

一 (integration/fragmentation)。全球化是一种整合,是一体化,它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尤其是跨国组织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大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间的整合程度极大地提高,以致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如国家主权,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消解,国家间的一体化运动十分活跃,并且从原先少数人头脑中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如欧洲一体化、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等等。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向纵深发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纷纷要求自治,如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最近南斯拉夫联盟的科索沃问题,等等。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和社区主义浪潮也伴随着全球化而高涨,而不是消退,社区运动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成为新的政治热点。由于地方自治在全球化背景的继续发展,以致于出现了特别反映这一矛盾发展的专门术语——“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

再次,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 (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兼并之风此起彼伏,则更助长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如不久前航空领域两位“大哥大”——麦道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并即是强强联合的突出例子。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与全球化有密切的联系,但结果是国际政治的霸权从两个变成了一个。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分散化的趋势也有增无减。中小资本在各国仍然极其活跃,资本的集中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它们的发

展；信息共享的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的集中程度虽然在提高，但谁也甭想再垄断它；虽然霸权国家只有一个，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格局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国际互联网。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信息集散地，它储存了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各个不同部门的无数信息，各种信息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集中；但任何人都不能垄断这些信息，每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享用这些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信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分散性。

最后，全球化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统一（internationalization/domestication）。正如在前面所说，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许多国际通用的标准或准则直到现在才第一次获得其真正的国际意义。但是，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其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是在解释这些公约的意义，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国际公约时，都深深地带有每个国家的特殊烙印。

总之，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第一，全球化的这种内在矛盾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匪夷所思，它都是合理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第二，全球化的这种内在矛盾是必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反之，最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

痕迹。第三，全球化的这种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化也好，一元多体化也好，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真谛。既然全球化本身所内在包含的矛盾、对立或悖论是合理的，那么它就不是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矛盾或悖论，而是哲学上所说的二律背反，所以我们说全球化是一个二律背反。

一些成功的跨国公司可谓深谙全球化的这一合理悖论，并将它巧妙地运用于其生产和营销的实践中。“全球化地思考，本地化地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是这些超级跨国大公司的执行总裁们的普遍准则。正如 ABB 公司的执行总裁所说的那样：“ABB（Asea Brown Boveri）是一个包含有三对内在矛盾的组织：我们既想成为全球性的，又想成为地方性的；既想大，又想小；还要用集权来推进分权。”

全球化是一个二律背反，这就要求我们也要像那些精明的跨国公司总裁们那样，不能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对立的另一个方面，不能将看起来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不能因为全球化包含有单一化、一体化、集中化和国际化的内容，而忽视其相反的多样化、碎裂化、分散化和本土化因素，反之亦然。把这种理解应用到现实的政策中，要求我们既不要以全球的一体化进程为由去消除我们的民族特色，也不要以我们的民族特色为由去阻挡国际化的潮流。将单一化与多样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对待全球化的正确态度。在这里，借用一句早先流行的口号或许是恰当的：“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 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 ——兼及考察全球化的方法问题

纪玉祥

自 80 年代西方媒体出现“全球化”一词以来，人们对全球化概念的理解一直歧见纷纷。比较各种观点不难看出，方法上的不同是导致对全球化看法各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趋势”，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同化”；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无论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均实现国际化，亦称“全球的网络化”；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不仅包括经济全球化，而且还包括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全球化。上述观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我以为，它们似嫌仍

停留在对事物现象形态的描述上，因而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其实，上述认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趋势”，是“单一化”、“趋同化”、在国际范围内实现“网络化”等观点，不能作为已知的根据，而是恰恰需要加以说明的论证。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尽管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一术语，但是，他们最早发现和考察了全球化趋势问题：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论述资本的扩张本性及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的时候“顺便”谈到全球化问题的，自始把这一问题同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第二，全球化趋势虽然不限于经济领域，但它主要是一个经济范畴。全球化趋势首先源于经济上的必然性，从本质上说，它是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扩张本性的外在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sup>〔1〕</sup>然而，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迫使资本冲破国内市场的狭隘界限而走向世界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sup>〔2〕</sup>，全球化趋势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第三，全球化趋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们的普遍交往空前扩大，生产和贸易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第四，作为资本扩张结果的全球化趋势具有两重性。首先，全球化趋势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sup>〔3〕</sup>，“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

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同时，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这是因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和全球化，“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 ..”<sup>[4]</sup>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力量而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sup>[5]</sup>第五，普遍交往的扩大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了前提。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不可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sup>[6]</sup>。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关于“多国同时革命论”设想为后来的实践所修正，事实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关于共产主义不可能作为“地域性存在”，而只能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是可能的思想依然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

100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仅从上述举例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全球化趋势的预见及论述，仍然为我们科学揭示当代的全球化趋势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原则和指导线索。比如，关于全球化是否是“古已有之趋势”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方法是不难解决的。马克思曾以“劳动”范畴为例指出，“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

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它“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sup>[7]</sup>就是说，只有把它置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加以系统考察，才能揭示其本质规定性。

同理，全球化趋势从现象上看也是“古已有之”，但它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后、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才逐步形成的。从 100 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全球化趋势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自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即一战之前的 50 多年间。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有人估计，当时主要欧美国家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比 20 世纪内绝大多数年份中的平均比例甚至还要高。第二个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本世纪 50、60 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由美国实力地位支撑的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第三个阶段滥觞于 70 年代，到 80、90 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的，其影响是空前广泛和深刻的。

当代的全球化趋势，归根到底和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不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变化，就不可能对全球化趋势的本质、动力、原因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有真正深切的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近 3/4，可以说，全球化进程首先和主要是由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引导和推动的。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全球化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紧密联系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来加以考察，应是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

## 一、贸易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导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为最大限度的攫取利润，有一种要超越一切民族和国家疆界的冲动和欲望。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国际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自始就起着先导作用。特别是，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新科技革命，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创造了品类繁盛的新产品、新技术和劳务服务，拓展了世界贸易广阔空间，推动了世界贸易总量、结构、体制等等方面的深刻变革，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贸易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和“引擎”。二战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而且其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生产的增长率。1950—1995年，世界出口贸易额从607亿美元增至6万多亿美元，增长上百倍。1985—1995年，世界贸易额平均增长约5.5%，为同期世界生产平均增长率的两倍；1996年和1997年均为7%，为同年世界生产增长率的2—3倍。

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仍然居于全球贸易的中心。1996年仅美、日、欧三个贸易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总额就占世界进口额的47%，加上

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近 60%。值得注意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呈现出工业制成品贸易不断扩大，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而初级产品贸易增速相对较慢；高科技产品在出口商品所占比重逐步提高，日益成为推动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劳务贸易发展很快；国际旅游业增长尤为迅速；部门内贸易日益占有显著位置；半成品和部件贸易增势强劲等一些新的特点，预示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正面临着—场新的变革。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强劲带动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世界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1960 年 12.2%，1989 年则上升为 18.2%。据预测到 2000 年将达到 20% 左右。这表明，各国有很大一部分产品价值是通过世界市场来实现的，各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在增强。

## 二、资本的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源

二战后，资本的国际化趋势愈益明显，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空前加快。由于平均利润率下降，生产成本增加和环保投资加大等原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此后的中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向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转移所谓夕阳产业，引发了强劲的资本国际化浪潮。资本是连接世界各国经济的桥梁和纽带，而作为资

本国际化最重要载体和主角的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突出地反映了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及其相互交融的新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资本主义历史上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途径一向是传统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则成为其强有力手段。与国际贸易等形式相比，直接投资具有使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加密切、融为一体的作用。

据统计，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标志之一的跨国公司对外大规模直接投资，1985—1995 年年均增长 19%，1995 年增长到 3178 亿美元。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看，1995 年全世界是 27301 亿美元，其中美国为 7055 亿美元，占 1/4 强；美、英、日、德、法等 5 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65%。如加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比例更高。

全世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仍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到 1995 年为止，在 26578 亿引进的外资存量中，发达国家占 72.7%，发展中国家占 26.7%，但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在总数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国别看，引进外资最多的仍然是美国，1995 年美国引进外资的存量为 5646 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 21.2%。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看，跨国兼并与收购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1995 年占世界对外投资流量的 72%，为 1988 年的两倍。当前国际企业兼并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1996 年世界企业兼并案达 22729 起，金额为 1.14 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西方媒体在评论这次兼并潮时称，西方正进入“新一轮大型公司时代”。同以往的企业兼并潮不同，这次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是企业在全球经

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实施的一项战略行动。据统计，美国 159 家大企业的销售额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9% 以上，日本 135 家大企业的销售额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32%，韩国 13 家大企业的销售额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

### 三、金融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和驱动力

金融国际化、一体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特征，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力量。

由于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电讯技术的发展，80、90 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一体化出现了一个高潮。首先，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速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遍及全球的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正在形成一个全时空的国际金融市场，十分活跃，使得资金的调拨和融通变得空前便捷，大大提高了资本流动的效率。据估计，世界金融市场一年的交易量 400 多万亿美元，简直是天文数字，为国际贸易量的几十倍。其次，各发达国家的股票交易所，都对外国公司开放，允许其购买本国的股票，因而投资者和筹资者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市场和投资对象，从而实现了证券投资的国际化。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的流动像一股巨大的洪流，冲来杀去，甚至不受政府的控制。另外，各国金融政策趋向一体化。当前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等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因而各国中央银行往往超越国家界限，从世界总体范围来观察和处理某一具体金融问题，以采取具体对策。



## 四 生产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资本主义的生产早已发展为世界性生产。由于现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而为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是高度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它既要求不断增加投入与发展新技术、新工艺，也要求分工更加精细化、专业化与协作范围的扩大化、广泛化。这样，过去那种以垂直为主的分工变成以水平为主的分工，以往在一个国家内部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必然发展为一系列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协作，从而使各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相互依赖，在国际范围内结成一个整体，并且发展到一个很高的阶段，从而使各个国家的生产活动进一步纳入国际范围的再生产过程。例如，波音 747 飞机，共有 450 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 6 个国家、1100 家大企业和 15000 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R—1800”载重汽车，其发动机是瑞典制造的，底盘、弹簧是美国提供的，控制系统是联邦德国制造的，车身是意大利生产的，而整车的装配则是在英国完成的。

现在，随着纵向生产国际化程度的发展和加深，生产的国际分工和协作呈不断升级态势，由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而发展为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以致同一件产品的各种零件往往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整个地球俨然成为了一个大工厂，各国

经济不断融合、互补，形成新的嫁接优势，其优势正像有人形容的那样：“人类已进入组装的世界”。

同时还应看到，随着产业地区转移和投资国际化的加速，必然促使横向生产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各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在新的以水平型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有一定位置，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而作为国际投资和主要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的跨国公司，在推动横向生产国际水平不断升级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它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结构和资源组合，生产越来越多的“全球产品”，即生产一个产品所用的资金、原料、技术、劳动力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并且销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促进生产国际化的同时，又加速了资本的国际化 and 世界贸易的发展。

## 五、跨国公司及其跨国经营是经济全球化的决定性力量

上述作为经济全球化诸推动因素的贸易国际化、资本国际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国际化不是没有主体的“自然”过程。其主要载体和承担者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成为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和力量。

早在上一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出现了跨国公司的雏形。然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则是二战后的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组织把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扩大到世界各地，组成为跨国公司。特别是，80、90年代以来，跨

国公司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急剧扩大。据联合国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有1.5万家，它们在国外开设的分公司约3.5万家。而到1995年已增加到约4万家，它们在国外分公司约25万家。跨国公司目前继续呈发展势头。其中，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跨国公司居多数，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生产经营中占有极大份额，起主导作用。例如，仅美、德、英、日、法五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就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2/3。在全球500家大企业中，美国有159家，日本有135家，英国有41家，德国有2家，法国有26家，韩国和瑞典公司各12家，澳大利亚公司10家。在全球十大公司中，美国占一半，日本占3家，西欧占两家。

据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已占西方发达国家总产值的40%。跨国公司内部（母公司和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贸易”和各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约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60%，控制着75%的技术转让、90%的生产技术、8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和90%以上的民用科技研究和开发以及科技发展转让。在全世界4万多家跨国公司中，为数不多的巨型跨国公司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世界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而不是国家（51个公司和49个国家）。有些巨型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经济力量已超过它们所在的一些国家。如三菱公司的经济力量超过了印度尼西亚，沃尔玛公司的经济力量超过了以色列。1982年，世界200家大公司的销售量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2%，到1995年，这个比重已达28.3%。这200家大公司的销售额合计为7.1万亿美元，大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大于182个国家（即除9个最大国家之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合计的国内生产总值。

近些年来，大型跨国公司规模继续扩大，投资、生产、销

售等领域不断拓宽，大量中小跨国公司乘势崛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大跨国公司迫于激烈的竞争或跨国联合，或跨国兼并，凡此都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国际经济关系史和资本主义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以上所述尽管是很不完全的举例，但足以说明全球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既为全球化提供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如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使得信息传递极其迅速，立体交通四通八达，国际经济交往变得非常快捷，巨额资金的调动瞬时即可完成，等等，这都为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时逢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纷纷独立自主地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相互提供了历史机遇。还应看到，虽然全球化首先源于经济上的必然性，但是，决不能忽视政治因素对促进全球化进程的巨大作用。如长期冷战对峙结束，消除了过去东西方两大阵营实行两个“平行市场”的人为分割状况，使世界市场联成一个整体，国家的干预作用增强，各种国际政治组织的成立及其作用的发挥，都对促成全球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增长，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世界各国间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发挥“后发效应”，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人们对于全球化的进步作用和历史意义谈得已经很多，兹不赘述。

在本文的论题范围内，笔者要说的是，由于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实质和阶级实质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因而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记、局限和弊端，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和风险不容忽视。有人将经济全球化的内含矛盾概括为，一是超越主权与主权国家，二是市场力量与国家干预，三是经济财富增加与社会分配不公，四是竞争——斗争与合作——协调，五是“快经济”与“慢经济”，六是旧秩序与新秩序，七是国家权力向上转移与向下转移，八是全球化与地区化。笔者认为其中主要值得注意的问题和矛盾是：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二战后 60 多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中欧、东欧和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纷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中国为代表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现在全世界 85% 以上的人口卷入了市场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国家和人口之多，参与程度之深，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市场经济对全人类的命运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然而，市场经济是具有二重性的。它除了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较高效率优点外，还具有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缺欠的一面。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把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也全球化了。在一国之内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加以纠正，而在全球范围内现在则没有这样的调节机构和机制，将来也很难。特别是，现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及其他弊端也将影响整个世界。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导和推动的，它在平等竞争的旗号

下掩盖其经济霸权主义、金融霸权主义、技术霸权主义，实行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经济霸权威胁，妨害其国家主权的维护和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打破贸易壁垒，开辟国际贸易市场，发动了一场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的“取消全球经济管制的运动”，实际上向全世界推销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是美国霸权在世界经济领域内的一种反映。今年初《日本经济新闻》刊登的一篇题为《“市场万能”主义可以休矣》的文章认为，“现在世界存在着三大潮流，即‘市场经济化’、‘全球化’和‘信息通信高度化’的浪潮。美国不仅是这些潮流的始作俑者，它更通过灵活运用这些潮流使自己的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比如，由于美国国内对信息化的投资不断增加使得美国成为尖端信息通信领域和软件技术提供者。此外，也可以说美国的另一个作用是制造了全球模式。”“三大潮流的继续发展是美国保持其影响力的源泉。”美国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向全球强制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制定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使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战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成立了国际经济组织，签订了国际经济协定，建立了国际信息网络，它们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制定了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它们至今仍是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基本依据。现行的国际经济法律和规则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的。执行它们，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民族经济，势必造成冲击，使其国家作用减弱，甚至牺牲部分经济自主权和决策权。这将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利益，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将造成

损害，甚至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无法行使政府职能。

——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其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和控制力，依仗信息技术的先进和跨国公司的强大，利用全球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形式上的平等下面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两者无论是历史前提还是现实条件都是不平等的。其实，两者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与被动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在剧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马太效应”愈益明显，结果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发展中国家为应对竞争的压力，不得不作出各种调整，竞相提出优惠政策，放松限制，甚至接受各种苛刻条件。发达国家始终占有竞争的主动地位和垄断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地位，或者发展缓慢，或者步履蹒跚、进退退甚至“边缘化”，或者有发展但付出了较大代价。

——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扩大，金融创新工具增多，投资自由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好处，但是也导致国际投机猖獗，蕴藏着破坏性、传染性很大的金融危机。在经济金融愈益全球化条件下，某一国家、地区的危机都有可能触发全球性的动荡甚至危机。1994—1995年的美元危机，1994年底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1997年7月以来发生的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些年日本金融形势严峻和日元持续贬值等，都是这种潜在危机的公开化和突出表现。这些危机显示出市场经济的弱点和脆弱性，全球市场经济只能使这些弱点更加突出和蔓延。

——全球化也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推行其思想文化战略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高功率的广播、卫星电视覆盖整个地球及其外层空间，使世界大大缩小，强大的西方

传媒借此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任何一个国家，影响、干扰甚至破坏有关国家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电子媒介已成为国际传媒舆论斗争的主导工具，使国际传媒舆论工具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传统的传播方式产生巨大的冲击。

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官方传媒的宣传重点是集中攻击和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体和政党制度。早在冷战时期，美国新闻署直属的美国之音就制定了一份宣传提纲，共八条：（1）宣传西方生活方式；（2）宣传社会主义是一种力图为统治世界而发动战争的侵略势力；（3）宣传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没有“人权”；（4）煽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5）动摇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6）报道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困难，并把这些困难解释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消除的；（7）宣讲改良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宣讲社会主义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8）将资本主义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相等同。冷战结束后，极力颠覆和演变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西方传媒的首要任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对外宣传手段有变化，但宣传的内容仍然集中在鼓吹和传播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党化、人权人道化、民族自治化、社会多元化等方面上。90年代以来西方传媒更为突出地将经济宣传列为对外宣传的主要内容，如宣传本国的经济利益高于其他国家利益；维护以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宣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际互网络等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乃至腐朽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

笔者更进一步认为，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不能仅限于简单化、形式化、表面化的“两分法”分析，即现在人们所常说



的，一方面看到其积极方面，这是主流；另一方面看到其消极方面，要引起注意和加以防范。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经济全球化既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下出现的，那末，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亦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者如国际舆论有种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换言之，看来是呈“中性”的全球化，是否是当代资本主义正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质的阶段？姑存一说。笔者倾向于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实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质阶段的综合结果和外在表现。经济全球化趋势把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内重现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痼疾。在不可能有“世界政府”加以干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不可避免地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金融风险和危机。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预感到了这一点。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在《新观察家》周刊 1998 年 9 月份一期上发表文章说，资本主义从 14 世纪开始产生以来，尽管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现在正向“全球化演变”，但它始终“保留了自己的致命的弱点：一种为赚钱而赚钱的本性”。因而自 80 年代以来它又犯下了“那么多的冒失行为”：1982 年和 1994 年的墨西哥，1997 年以来的东南亚和日本，现在的俄罗斯。他认为，这些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资本主义仍然是不稳定的”。“如果说自 1989 年以来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了它的对手和老竞争者，那它也并非因此就万事大吉了。资本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他还援引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话说，“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裂缝，这些裂缝孕育着地震。人们不知道地震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以怎样的方式爆发，然

而却知道它总有一天会要爆发。”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意味着全球性危机不可避免，一旦爆发其深重程度将是空前的，将是人类的一场空前劫难。对此，我们应作深入研究，在思想上预有准备。

全球化问题不仅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而且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现在看来，在人类还没发现地外文明的情况下，地球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到尽头，取代它的必将是全球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全球化为未来社会主义进一步准备了物质技术的、社会文化的条件。从全球资本主义到全球社会主义、全球共产主义将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但是，历史辩证法所昭示的这一大趋势是不改变的。对此需要专门缜密论证，而这远非拙文所能胜任的。

#### 注 释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23 卷第 368 页。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5 卷第 279 页。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卷第 86 页。
- [4] 同上书第 89 页。
- [5] 同上。
- [6] 同上书第 86 页。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卷第 21、22 页。

# 关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几点认识

李克穆

随着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强劲势头为世界所瞩目，日益强大的中国已被视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全球化进程成为我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如何客观地认识经济全球化问题，特别是从国情出发适度地把握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应采取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全球化进程是一种趋势而非目标

作为一个国家，总是首先从本国的利益及其国情来考虑全球化问题，参与全球化进程应当有利于本国的发展。经济全球

化体现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任何国家或实体均无义务遵照某种规则参与这一进程。当然，由于无视全球化进程而阻碍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则无疑是不明智的。面对经济全球化或其他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新的概念，去理解和探讨它的唯一合理动机只有一个即如何运用其为国家利益服务。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撰文提醒人们：“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把（金融）自由化本身当作一个目标追求。我们没有系统地评估什么情况下自由化才能有助于促进稳定和增长这样的最终目标。自由化是达到这些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应该成为指导政策的准则。”“在考虑金融改革时，我们需要把自由化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

目前，在一定范围内对世界经济全球化问题存在着某种误解，主要是将全球化看作一种既定的目标，并把一系列国际条约和规则与其直接联系起来，统而言之划定出一条中国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例如有的观点认为，我国已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必须在经济制度上与市场经济国家保持“同步”，否则便无法正常地推进改革、发展经济。这种观点把全球化及其条件作为改革与发展的前提，看问题过于简单化，是脱离国情和片面的，而且也相左于一些现代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包括世界银行、IMF 以及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主要经济学家在内的一大批世界级学者，均普遍认为在当今世界没有经济发展的蓝图，没有一本教你发展国家经济的教科书，更没有一位通晓各国发展的教师爷。他们很少全面否定一个实行任何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制度，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主张根据国情制定发展战略，倒是我国的某些学者常常否定自身，习惯于套用外来模式。

## 二、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风险不容忽视

90年代发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二战前后出现的以国家为根基的国际化倾向相比，可称为一次飞跃。贸易自由化、投资和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的流动以及高科技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可改善国家间的劳动分工，提高市场机制的效率，促进资本流向能够提供高收益项目的国家，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然而，全球化也是有成本和风险的，绝不可忽视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不利或消极因素，主要为：

1. 全球化进程主要由发达国家引导和推动，势必使其首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利益。以美国为首发起的降低贸易壁垒、开辟国际贸易市场的行动，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为“一场取消全球经济管制的运动”。这一行动使若干中小国家的生产者和管理者受到巨大冲击和压力，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能导致某些后发展的中小国家政府职能无法正常运转。有的专家指出，美国运用其在资本和技术上控制力，利用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2. 有助于世界性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扩展。一次次实例说明，动荡到来之际，开放资本帐户的中小国家在全球的联动作用下难以抗拒国际性金融风潮的冲击。

3. 全球化进程使人们感触到市场经济的脆弱性。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显示出市场经济的脆弱性，而市场经济在手段上的表现就是经济全球化。

此外，全球化进程可破坏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使污染向

穷国转移以及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总之，对于全球化的风险，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并表现出诸多疑虑。

### 三、全球化进程日趋复杂化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使若干经济环节迅速扩展，而高科技的进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升级换代使众多环节变得复杂化和难以驾驭。这一趋向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例如，已实现“无纸化”的现代金融业不断产生和演变得更加变幻莫测，仅此一点便足以阻碍经济全球化的运行。从去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东南亚金融风潮，深刻地证实了这一点。

现实说明，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复杂化，其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活动的“不可测性”日益显著。许多国家的经济工作者有一种同感，即科技愈发展，经济愈发达，经济活动愈难以操作，人们认识事物和控制事物的能力似乎越来越有限。索罗斯最终将他的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是受到量子物理学中“测不准原理”的启示，他深感金融业“毫无理性可言”。美国桑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在复杂系统研究（Complex Systems）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这一自称诞生于秩序和混沌边缘的学科认为，必须改变自牛顿以来主导科学进程的直线与简单化的思想束缚，充分认识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进化的复杂系统，现有科学尚无法解释和驾驭，而复杂系统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趋于平衡的能力。其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同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程度、经济制度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经济运行发生一系列不同步、不协调以至混乱现象，这是在现行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必然面临的局面。其三，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全球的作用仍然相当有限，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远未达到预期的水准，而国际组织的能力和作用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基础条件。

#### 四 坚持从国情出发制定独立的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全球化进程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发展趋势。这一进程提出了一项挑战，即要求我们在发展中更多地采用国际惯例，提高国际化程度，按国际行为准则处理事务。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进步，是迈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走向经济全球化应当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相当的综合国力、健全的管理与运行机制是内在因素；完善而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外部环境。两者是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必要条件。而对全球化进程，在策略和观念上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1. 坚持从国情出发制定独立的发展战略，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审慎参与全球化进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机会与陷阱总是并存的。条件不成熟的事情不做，该把住的“闸门”不能松。不可因追求全球化进程而人为地改变与国情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斯蒂格利茨最近提出：“我们需要理解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立即放松管制。这些步骤将不

只导致国内资本的更有效配置，也会帮助国家更好地管理国际资本流动。”

2. 重新认识国际间与全球化进程有密切内在联系的赶超战略。所谓赶超，即表明预先设定了一个样板，从而限定了自身的发展轨迹。这种赶超战略必然是被动的，可称其为“国际攀比”，其结局极易导致经济发展失衡。

3. 现代市场机制、全球化进程均无蓝图可模仿。如前所述，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可测性”四处可见，无序状态比比皆是，以往人们头脑中的既定模式或蓝图日趋淡漠，快速运转的经济活动正在打破自身的一系列原有规则，在一些领域中出现了无规可循的局面。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十分成熟的国家，也出现了发展模式的危机，也存在误区和盲区，亟待寻求新的出路。经济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不言而喻，我国的发展策略只能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寻求规律性，走自己的路。

4. 注重在全社会范围内更新知识结构，以适应全球化进程，适应我们所面临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节奏。与发达国家相对照，我国综合国力与社会管理层人员知识水平之间的反差甚大，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水平和素质明显滞后。下决心尽快扭转这一现状，是当务之急。



##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黄卫平

所谓“全球化”现象，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活动空间正日益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版图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全方位的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它正以一种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逻辑和严峻现实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近来，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震荡、欧洲货币发行在即、一批超级跨国企业集团的崛起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等等，我国政界、学术界、企业界人士也开始以理性的目光注视并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中国将何以自处？

正是围绕这一主题，我国学术界此次在深圳大学聚会，研讨“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问题，深入探讨“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和深远影响”、“全球化趋势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课题，从而表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正在我国逐渐成为一个重大现实课题的趋势。

全球化问题研究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环保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课题。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是全球化现象的经济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是全球化现象的物质载体。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通讯手段和传播媒体的革命性突破，为全球化扫除了空间和时间的障碍，给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扩张、辐射提供了技术保障；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扩张又是全球化趋势的内在经济动力。正是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和现代信息技术迅速普及的冲击下，世界范围内在政治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都在发生并即将发生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化。虽然，对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给政治带来的影响，还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问题，<sup>[1]</sup>但人们有理由预言：正在发展着的数字化网络技术，建设双向互动的信息高速公路，实现各种媒体的大众传播形式，使全球各国各类信息源的全面贯通和横向互连成为可能，实际上正在从技术的层面冲击乃至摧毁传统的纵向等级层次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形成网络式的横向自主连接结构，从而在技术上支持了人的自主选择权利，为进一步高扬每个人的主体地位和更高层次地实现自由与民主的价值，提高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和大众传媒政治监督的力度，奠定了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基础，并使那种传统的仅由少数“政治精英”垄断信息，推行“愚民政策”的政治体制完全丧失其可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有必要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实际上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的双重效应，即机遇与挑战并存：其一是机遇，全球化过程将为发展中国家引进资本、吸收现代技术、发展外贸、推动经济市场化，并逐渐进入全球市场提供历史契机，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主动抓住机遇

的典范；其二是挑战，全球化过程也将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主权基础受到侵蚀，受到发达国家某种经济霸权的威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充满痛苦和血泪的过程，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其特定表现。因此在我国建设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全球化的现实特征和发展趋向，积极主动地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机遇，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全球化问题，认真研究，理性抉择，冷静应对。其中，深刻理解党的“十五大”对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全面贯彻九届人大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环节。

以最近那场史无前例、来势迅猛、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危机为例，其形成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有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原来东亚模式的“现代化”路径所特有的在政治上高度专制集权的制度文化条件下，发展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借助政府的扶持和推动，促进经济起飞，但同时也潜在地包含着官治金融、官商勾结、官员寻租、商人行贿乃至“裙带资本主义”的特色，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官场腐败严重，实际上内在地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原则，从而使经济发展中含有过多的“泡沫”，一旦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在充分开放的全球金融体制中，大量短期外国贷款在国际金融投机家的炒作中迅速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撤出，必然引起巨大的金融风波，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外债比例不合理，产业结构低级，银行坏账率高，政府不恰当地干预经济等问题，采取金融期货和现货工具，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经济手段沉重打击亚洲多国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实现重新分配东

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在这样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原来藉经济起飞在生活水平上略有改善而对政治腐败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有所提高的广大人民又陷入极大的经济困境，于是如印尼人民再也无法忍受极权专制、贪污腐败的苏哈托家族统治，经济危机迅速转化为政治危机。

我国虽然由于改革决策者的措施得当和金融业开放程度还有限，幸免于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但也同样潜在着导致危机的经济、政治因素。因此，除了必须谨慎对待金融市场的开放步骤，以更理性的精神对待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还必须及时进行适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此次亚洲金融风暴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实操作性目标的历史契机。

因此，在近来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精神，深入反思亚洲金融危机，迎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浪潮中，通俗型政论类书籍颇为畅销，充分反映了目前国人对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关注。由刘智峰主编的《第七次革命——1998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备忘录》就是其中之一，该著广泛搜集了建国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材料，提供了不少有关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背景分析，摘要选编了一些政界、学术界名流关于政治改革和机构改革的论述，有较大的信息量和较强的可读性。而该著的书名也别具一格，以“革命”来诠释政府机构改革，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时下关于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改良”抑或“革命”的某些议论。

特别令笔者感到兴趣的是，该著摘要援引一位学者对我最近发表的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所作的批评，那位学者对我提出的关于 1989 年以后，中国改革最高决策层采取了“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特征”的观点，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这种‘寓于论’、‘融于论’实际上是把政治体

制改革融化、湮没掉”，“好像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可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内自然而然地顺便解决”。〔2〕他主张“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那么就要以革命的态度和革命的举措来对待，就要有相当大的决心，甚至敢冒风险；否则，如果采取改良主义的态度，企图对原有政治体制作某些修补而消除其弊端，这实际上就是取消政治体制改革”。〔3〕最近，那位学者再次在《深圳特区报》撰文批评说：“没有任何根据说，我国最高决策层把所谓‘寓于论’、‘融于论’当作什么战略选择”，并认为用“融于论”概括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未免有点为实际存在的但并不合理的现象作无原则辩护了。”〔4〕

很显然，那位学者急切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用心可谓良苦，但其运思趋向似乎依然停留在那种从抽象的理念出发，不顾及现实操作性程序和社会基础工程，煽情地鼓噪“革命”的那个历史阶段。且不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革命”还是“改良”作语义学或政治学的区分，对于实际推进政治改革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我国的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不是先在理论上争论明白何谓“革命”、何谓“改良”？究竟是追求“革命”的目标、还是追求“改良”的目标？然后才开始推行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显然并不是中国改革的最高决策层先明确改革目标，然后制定具体的实施步骤，按部就班地逐步推进的过程，而是改革的决策层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 and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当然，改革的最高决策者对改革的发展方向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否明确宣布、何时宣布、宣布到何种程度，则需视改革进程中各种力量对比的客观状况和改革最高决策层的认识统一程度而定。正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经过先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商品经济”的存在空间，再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

进而又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直至十四大才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十五大进一步在所有制问题上再按市场化的内在逻辑突破一层……我想直至今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所包涵的广泛而深刻的内容还在不断地演化之中。与其说争论我国的改革是“改良”还是“革命”，不如说我国的改革更像由诸多具体“改良”积累而成的伟大“革命”。这也正是小平同志 1992 年春“南方谈话”“不争论”谋略的过人之处。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明晰的，每个阶段都只适宜提出当前可以操作的目标，以利于最大限度的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相信在 20 年前中国改革之初，就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为目标，只能造成改革决策层和整个社会的分裂，无助于现实而理性地推进实际上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发展。那种煽情地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敢冒风险”的观点，虽然痛快淋漓，却是十分不负责任的，须知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作试验，也不像商人在市场上竞争，也不同于以追求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旗帜的经济改革，它涉及深刻的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在中国这样的有十亿人口和几千万执政党党员的国度，最高决策层是切不可拿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几千万执政党党员的政治生命作赌注去“冒风险”的。因此，小平同志才在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的同时，再三强调“要审慎从事”，“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sup>[5]</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早在 1980 年关于《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在全面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纲领时，就指出：“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sup>[6]</sup>出于类似的原因，小平同志许多极具创意的思想、观点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阐发，如小平同志 1987 年曾经说过：“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sup>[7]</sup>再如小平同志在 1980 年就提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sup>[8]</sup>，1986 年小平同志又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sup>[9]</sup>。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甚至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观点都未得到真正的宣传，更妄论实践了。可以说，迄今为止，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主要内容还大多局限在行政体制改革层面，而尚未深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制的层面。但是，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定改革决策层实际已放弃了国家权力结构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海内外有不少舆论如此认为。

笔者以为，我国改革最高决策层在 90 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角逐中，为了既避免党内极左习惯势力的阻挠，又防止海内外敌对势力借题发挥；既保持政治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够渐进、理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战略选择——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sup>[10]</sup>但小平同志确立的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并未改变。我的这个判断，除了已有专文论述外，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无论目前中国执政者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做了什么，邓小平同志的前述观点都被收入于 1993 年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可以视为不仅是小平同志个人坚持的观点，而且也

是第三代中国领导核心的某种政治表态，它给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and 广阔的发展空间。笔者肯定前一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先行，融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特征，正是预期只要我国执政者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就必然有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政治需求，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压力和拉力下，政治改革将从“隐型”逐步走向“显型”的发展走向。其理由无非是只要“翻开现代史，人们找不到第三世界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先实现民主化然后进行经济改革的方式，成功地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的事例”〔11〕，这也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许多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极具创意的思想，但并不急于付诸实践，而是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改革战略的深意。笔者的这一判断，丝毫不意味着“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推到遥远的未来”和否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的事实，而是不能同意那种完全无视我国政治改革已经伴随经济改革的发展而取得许多重要成就的片面观点。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同志所述“有的外国人说，我们重视经济上的改革，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当然，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弱一些，滞后了一些，不承认这一点也是不实事求是的”。〔12〕

其实，对于发展中国的政治改革较经济改革相对滞后的现象，就是外国学者也有人指出：“西方意识形态错误地认为，政治改革必须先于经济改革，或者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相反，亚洲（包括中国）的权力主义者则错误地认为，经济自由化可以无限期地进行而无须政治自由化。亚洲的经验是，经济上的成功不可抗拒地导致政治改革，但在较小的国家里，政治改革将滞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政治改革滞后的时间可能会更长。”〔13〕至于“第三世界



最成功的市场民主制是由最初是独裁的、有时甚至是敌视民主的领导人建立的，这种结果是反常的。与此相对照的，某些最糟糕的专政、贫困和暴力活动却发生在不时由用意良好的民主领导人统治的国家里”〔14〕等现象就更耐人寻味了。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过去 10 年里，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中国取得的进展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改革之树在领导层中展开其枝杈，在人民中间则扎下深深的根基。经济改革的所有重要方面都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重大的政治改革也几乎是不可逆转的”〔15〕。

诚然，市场经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市场经济的推行并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笔者在充分肯定我国改革进程中一度实际推行的经济改革先行，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特征的同时，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十五大和九届人大精神为指南，藉全球化浪潮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挑战，从真正有利于推进政治制改革的实际步骤而言，与其不断消极地抱怨决策层做得不好，不如积极地激励其做得更好。值得探讨的是如何深刻理解和真正实现当前正在推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在政体改革中的地位和意义。如果以民主和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应该是大势所趋的话，关键是如何在操作的层面不断提高民主化、法治化的实现程度。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目前我国改革决策层正在实际操作的政府机构改革和不断论及的建设法治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廉政建设等方面，虽然阻力很大，但只要改革决策层决心坚定，措施得当，真正在实际中逐步推进，就蕴涵着重大的政治改革的内容。如建设法治国家落到实处就必然要涉及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现代化、法治化，涉及到如何真正在制度上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转变政府职

能，精简机构也不仅是实现政企分开，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党政分开，精简同样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庞大的执政党机构的前提，因为我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是执掌广义的公共行政权力的，在政企不分、党政不分的年代尤甚，当初提出党政分开之所以难以实现，是因为政企尚未分开的情况下，党政分开的结果只能是加强政企不分的政府的权威，而削弱职业党务工作者和政工人员的权力与利益，必然引起后者的强烈反弹，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难以操作。如果现在这次政府机构改革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在一个精简、高效的政府机构上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巨额财政的执政党机构，在逻辑与现实的意义上都将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的方向。而廉政建设的根本是权力制衡，加强和提高人大的权威，赋予司法独立的地位，扩大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范围，这些方面都可以逐步操作，渐进发展。至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则首先是党内民主程度要切实提高，必须把民主集中制解释为特定的民主制，而不是变形的集中制，或民主制加集中制，制定并真正执行党内民主程序，改变《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被束之高阁的局面，使党内民主成为社会民主的先导，使执政党真正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党转变为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民主法治政体中的执政党。

因此，人们有理由就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先后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革命”性意义寄予厚望。当我国在世纪之交，面对以信息技术为载体，以市场化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以知识创新为内核，以产业信息化为重要特征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只有果断抓住历史机遇，迅速作出理性抉择，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才能适应迅速变化、发展着的时代。

注 释

- [1] 参见刘文海著：《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2] 参见刘智峰主编：《第七次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 页。
- [3] 同上书第 45 页。
- [4] 王贵秀：《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见《深圳特区报》1998 年 6 月 9 日。
-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76-177 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43 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0 页。
- [8]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21 页。
- [9]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7 页。
- [10] 参见拙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 页。
- [11] [美] 威廉·奥弗霍尔特著：《中国的崛起》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5 页。
- [12] 刘智峰主编：《第七次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 页。
- [13] [美] 威廉·奥弗霍尔特著：《中国的崛起》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1 页。
- [14] 同上书第 78-79 页。
- [15] 同上书第 90 页。

## 全球化时代的政府领导危机

马敬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逐步纳入了一个高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代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它极大地改变着 20 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并通过巨大而畅通无阻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将现代化的产品及其影响力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地球连成一个关系紧密的“大社区”，从而使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

有幸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人们，在充分“享受着”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成果的同时，也时刻承受着现代化给人类造成的恐惧和不安。在人们的“成就感”占优势的时候，他们在地球的各个村落和城市中燃起篝火，庆祝他们征服地球、征服宇宙的伟大胜利；此时的政府领导者常以激动人心的言辞和掩饰不住的“族群荣誉感”来激励他的勇士们；当他们冷静下来，审阅另一部分科学家关于地球生态和人类内部争斗的报告时，面对满目疮痍、不堪重负的地球和危机四伏的人类组织，一种

无形的不安和恐慌笼罩在心头。这是大自然对地球人类的警示，一个灭顶之灾的早期信号，一个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前奏。它告诫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人类以往那种粗放式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地球与人类共生的需要，要求各国政府共同筹划自己的、地球生物的和地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组织各国政府、各种社会机构、社会团体行动起来，协调人类、生物、地球和宇宙间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类内部的协作机制，节制人类自身的过分欲求和恶性争斗，抑制人类对其他生物、对地球的过分利用与开发；减少各国之间、一国内部的各级政府之间、各类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及其内部的巨大内耗和浪费，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增强人类社会组织的内聚力，提高单位组织效能和人类整体组织效能。就是说，有组织的破坏，必须通过高度组织化的管理，才能使地球和人类得到拯救。

## 一、从战争废墟上走来的“大政府”

近现代市民社会的行政管理是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是：（1）法制化、职业化行政管理；（2）官僚组织的技术化、职务权限的明确化和指挥命令系统的一元化；（3）薪俸货币化和发达的货币经济；（4）行政事务量增质变和行政手段的集约化；（5）重视以文书为核心的行政能力和专门能力等等。

进入 20 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官僚化进程；在此前后获得新生的民族、民主国家

政府也面临着争取人民支持的严峻课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各国政府及其首脑们，都以重建国计民生、振兴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重塑政府形象为己任。当时的西方先进国家正面对着一片废墟和饱经战争创伤的穷苦大众；而那些刚刚挣脱法西斯的殖民者铁蹄的新兴民族、民主国家的人民，面对着更加凄惨的处境。无助的人们都以期待的目光观望着他们的政府，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全面的帮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福利国家政策使政府“无形的手”变成了“有形的手”，一个个近乎全能的“大政府”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国成长起来。而这种“巨型政府”一旦产生，就使一些人可以统治另一些人的制度具有某种令人尊敬的外表，因为它毕竟使社会有了固定的结构，从混乱中建立了秩序。在这一新秩序初始化阶段，那些长期受尽战乱之苦的贫民百姓对它报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并积极投入到由政府组织的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实际上战后的“大政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远不至于此，它几乎包揽了人们一生“从摇篮到坟墓”过程中的所有事务，并在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的同时，实现其对社会的全面管制。这种大政府是一种巨大的“万能政府”，其组织特征主要是：

第一，巨大的行政权力，广泛的社会职能。

第二，庞大的组织机构和紧张的内部关系。

## 二“大政府”与领导形象危机

随着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人类开发能力的急剧膨胀，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组织间的交往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便是管理组织变得越来越庞大，管理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我们这个日趋狭小的地球社会中，虽有装备齐全的管理组织、高效的官僚机构、百里挑一的文官队伍，复杂的管理制度和程序，但是，人们照样可以经常听到许许多多的人们，那些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以及那些生活在当今所谓“理想国”中的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谴责、声讨、抨击甚至反对他们的政府。不管你生活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对政府的非议似乎就像在一个农村社区不时传来的邻里谈笑声一样司空见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公民不抱怨他们自己的政府。

在当今世界，人们对“好政府”的期待已经失去了信心，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好政府”的标准是什么？一个绩效优良的政府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当然，“好政府”不是设计出来的，问题的实质不是设计一个尽善尽美的政府模式，为各国人民提供一个改进本国政府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样板，而是置身于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经济体制、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生活方式，都处在剧烈的变

革与发展之中，政府能力和领导形象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在一些领域和范围内，矛盾和冲突不断表面化、公开化，从而加剧了政府领导能力危机问题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政府领导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职能范围宽泛、界限模糊，降低了政府对社会的调控能力和领导能力，影响了政府权威的有效性和社会动员能力。

(2) 政府法制不健全，自我控制能力低，进而导致权力过分集中、机构人事失控、内部管理紊乱低效、外部形象恶化等等，影响了政府自身的领导能力和社会对政府的信任。

(3) 我国是一个潜在的人才资源大国，但在政府内部缺乏一种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和制度保证。

(4) 领导观念和行为中公私界限模糊，人情主义和非正式关系泛滥，贪污腐化蔓延，严重破坏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5) 国家和社会公职人员的法治观念和公仆意识淡薄，管理和服务水平较低，影响了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

总之，在当今世界，政府领导危机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时代特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领导危机的时代。严格说来，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危机不是领导者个人的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救世主”，而是人类组织管理能力的危机，人类自我领导能力的危机。

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政府领导危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异常复杂的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领导者是这个复杂社会中最为复杂的角色之一，他们置身的政府或组织，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组织



……因此，提高领导者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培养善于处理复杂事物的领导者，是目前尝试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危机，提高人类组织管理能力的最好途径之一。那么，善于处理复杂事物的人，应该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或能力？根据目前研究的结果，可以初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复杂事物”意识。哲学家们早就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

第二，培养对“复杂事物”的识别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时代的哲学家早就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这给我们识别复杂的客观事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线索，循着这一线索，借助于那些已被实践证明、并对处理“复杂事物”行之有效的现代科学方法。

第三，培养在“复杂事物”中合理选择的能力。

第四，控制“复杂事物”的能力。我们应该变革传统和管理哲学，确立与自然、与地球共生，与社会、与时代并齐驱，以及与同事、与人类共图未来的管理思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建立共生共存的良好伙伴关系。

第五，转化“复杂事物”的能力。正如哈林·克里夫兰在谈到“处理复杂事物的人们的锦绣前程”时所说的那样，“未来的行政首脑很容易被描绘为‘转变媒介’——加速转变就是他们的使命，而不论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终归是转变媒介。这决不是轻松的任务。行政首脑在复杂事物的丛林中摸索前进，一边走一边制定政策，他们很有理由感到沮丧自艾。但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就是做出别人难以做出的困难抉择。”

## 中国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

苏东斌

在一个已经开放了的大时代里，应该说，中国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中国，而且也是全人类的中国。这样，中国的发展也就不仅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色彩，而且还必须具有浓厚的世界性趋势。我以为，在这里，我们尤其应当关注两大问题。

### （一）

首先，应当澄清“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两个理论问题，以免造成思想混乱。

毫无疑问，一条中国现代化之路一定要显示出民族特色与反映出历史阶段性来，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说明它的民族性、地区性、国家性；我们指出“初级阶段”，也就是要表示它的时代性、后进性和渐进性，没有了这两点，当然也

就没有了中国现代化每一个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无论这种特色“特”到什么程度，也不管这种“发展阶段”进入了哪一个时期，现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质”。我们决不能以“中国特色”来拒绝由“本色”所带来的规范要求，更不能用“初级阶段”去否定本来应当实现的各种现代化进程。

第一，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努力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果实与营养，不仅反映了我们的胸怀，更反映了我们的聪明与智慧。因为从实践的意义上讲，更多的东西是“利与弊”，而不是“是与非”。许多东西并非都一定要兵戎相见，更多的则可以融汇贯通。相反，拒绝接受文明，则是野蛮与落后的象征。我们决不赞同当年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决不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蓝本，而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中积极参与国际大分工。

第二，我们在强调“初级阶段”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把“初级阶段”视为“最大的国情”，是为了批判和否定一切不符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尤其是不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理论与实践。但是“左”的思潮可能有两大表现，其一是“超阶段”，其二是“空想”。前者是把明天才能干的事今天就干完了，而后者则纯粹是永远不能也不应实现的空想。我们以往所犯的错误虽然也有“高指标”一类的“超阶段”问题，但是大多都具有“空想”性质，有不少是乌托邦幻觉的实践。

经过多年充分的酝酿，党的十五大重申了十三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著名论断。毫无疑问，这个论断对于清算“左”倾思潮已经并且继续起着伟大的政治作用。但是，我理解，这个论断的实质并不在于“发展阶段”本身问题上，

而在于特定的“内容属性”问题上。

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针对着社会主义中级、高级阶段而言，而后者又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而具体的要求。这样，如果说，我们过去犯的都仅仅是一种“超阶段”的错误，是“操之过急”，只是把明天应该做的事情却在昨天做完了，那岂不等于说，其一，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经济，消灭市场经济，要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等等本来都是十分正确的，只不过需要“下一步”去做，今天只是需要“退回去”。其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本来是一清二楚，只不过我们激进了一点。这样看来，就不简单地是一个概念之争，而是涉及到一个改革方向的大问题。如果我们的方向还是当生产力达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水平时，就要消灭商品经济等，那么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必要去建立新体制呢？那也就等于说，原来的旧体制本来就是中级、高级阶段所需要的体制。我们应当强调，对于旧体制的灾难，邓小平同志总结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 1958 年开始到 1978 年 20 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他深刻地分析道：“从 1957 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试想“强制性”人民公社”，吹牛的“大跃进”，灾难深重的“反右扩大化”及毁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我们操之过急搞得快了吗？难道说当我们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就开始重新演出一大套吗？所以我认为，传统体制弊端并不是什么“走快了”，而是“走弯了”，不是“超阶段”，而是“走错了”（这里的“弯和错”并不指总体目标而指若干手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实质在于制度创新。它的发展趋势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道路，也不是 80 年来社会主义实

践的一些传统模式。

如果说因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尚未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要求的水平，所以才不能实现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那么这里到底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究竟当社会产品达到什么水平我们才能够重新消灭市场经济，重新取消私有经济呢？所以，“初级阶段论”的本质不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划定的阶段内容，而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如果认识不到“初级阶段”论的实质不在于“阶段”而在于“新质”上，那么，一个今天扫荡“左”倾为目标的口号，又会为今后“左”倾崛起打下伏笔，所以，我们应当彻底批判现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可见，我们既不能把现实所发生的“一切”都解释为“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更不能把“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当做反对进取甚至反对改革的两块盾牌。

总之，如果以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透视华夏，如果用世界水平的眼光去观察中国，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说，我们在说明“中国特色”时，更应强调创造性吸收“人类文明一般”；在确认“初级阶段”时，更应强调体现时代步伐的“国际惯例”。

## （二）

其次，应当肯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体化过程。

要全面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是简单地去否定“一场运动”而是从根本上去否定“一种体制”。而要否定这种体制，

那就不仅要果断地完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性地大转移，而且必须从制度上去实现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全面现代化的革故鼎新。

春秋弹指十八度，今天，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总体上告别了贫困（虽然不可高估这一水准，因为尚有几千万绝对贫困人口），以民族发展来纵横比较，中国的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几千年自身历史的最高点，人们从微笑中看到了希望，从国威中祈盼着盛世。然而，历史的积淀，世界的制衡，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从来就没有那么轻松与潇洒。试想，为什么早在 1984 年党中央就提出要克服“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等主要弊端，至今动作仍旧收效甚微？为什么早在 1983 年党中央就提出的通过“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的目标却因腐败的蔓延而至今依然步履艰辛？

此时此刻，人们会理所当然地怀念起邓小平那高瞻远瞩的论断：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了人的障碍。”

第二，“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里，虽然邓小平仅仅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来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与作用，但也足以唤起了人们对他那“我们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同了。

社会从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是人们要集中研究与解决某个领域或某一方面的问题，才抽象与划分出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具体区别。同样，历史的发展也总是相对协调的，要实现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科技进步的社会发展三个

目标，只有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全面推向现代化。这不仅是因为要想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解放生产力，尤其要首先解放作为“生产要素”的人，而且，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在于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对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向往构成了人类的本性与天职。可见，政治与经济形成的因果链条的紧密程度与关系，不是任何理论上抽象所能割舍断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特别提一个恩格斯的特殊贡献。在《共产党宣言》发表近半个世纪后，他写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重编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收录了此文，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文中，他阐述了社会历史运动是社会生活各种因素的合力的重要思想，并以此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与检讨：“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和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作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我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难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只要人们认真观察就不难发现，关于社会发展合理因素作用的思想在恩格斯晚年得到了极为充分的阐述与说明。他总结道：“如果有人在这时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了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以往的那种经济繁荣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上的清廉的观点，以及那种长期不搞反贪肃污，经济建设仍然会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乌托邦幻觉，早已被人类真实发展史所证伪。

以古为鉴，泾渭自明。同样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事件，却使两国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对此，一位美国学者作了极精辟的总结：当日本人刚开始接触西方证明的优良技术时，他们想用这样的思想来聊以自慰，即既接受“西方科学”，又保持“东方伦理”。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也有类似的观点。但是日本人不久就懂得了在技术、制度、准则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它们往往是一个整体。正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坚决地抛弃了统治几百年的封建幕藩体制，迅速代之以君主立宪政治体制，这才既在心理上满足与维护了天皇名义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又在实际上确立近代民主政治的国家政权。

几乎与此同时，甲午一战，泱泱中华大国，却被弹丸岛国打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屈辱已极。当中国成为列强的俎上肉时，虽然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曾颁布过什么谕旨：由于几十年的积弊，一切政事到了应整顿的时候了。中国应取外国之长，补己之短，一意振兴，使国家富强。无论是思想先驱康有为、梁启超，还是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最终没有能够跳出洋务派大理论家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更何况即使这样的百日维新，也足以使得八旗绿营武将和科场发迹的文官们震惊失色了。因为他们要捍卫的是既得利益，并不在乎追求什么借助于西方科技造船制炮以外的任何东西了。即使是洋务派的官办工业或官督商办，官员们心驰神往的也并非企业的利润，而是中饱私囊。为此，只要维护社会的安定，使清帝国不再动摇，他们是决不愿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的。

再联想被毛泽东称为向西方学习第一人的洪秀全，他那套中国化的基督教义，也终因民主被封建同化，科学又异化为宗



教，所以人民大众革命初期的忠诚与崇敬也逐步演化为怀疑与欺骗。因为在太平天国那里，“中国化”就是“封建化”。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都屡屡印证：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关注它自身特殊的历史时间与空间，但是任何“中国特色”并不“特”在既定目标上，而仅仅能够“特”在具体道路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要办一场洋务运动（虽然我们充分肯定洋务运动在中国工业化中的奠基作用），而是必然要发生一种制度上的创新。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既不可能视同秦越，也不应当以李代桃。

史实之证，经典之述，无非是为了说明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单单是“经济设计师”。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单项的改革开放，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今天，时间已经接近本世纪末，20 来年的历史进程不仅表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深层次的攻坚阶段，而且也反映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运行与滞后状态。经济的市场化过程正与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的政治体制发生着矛盾与冲突，它已构成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阻力，是当前中国社会若干问题中的焦点所在。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中国改革的大棋盘上所 要冲杀攻克的一个重要堡垒。

显然，经济的现代化一定要呈现出物质一元化需求，而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则必然反映着世界不同国家精神多元特点。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全盘古化”，还是“全盘西化”，都意味着一种反潮流、一种反文明，同时，还要看到，比起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显得更为敏感，更为复杂，也更带风险性。所以它的必要前提就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从客观上讲，只能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循序渐进地实行民主化措施，只有程序化向前发展，不搞任何意义上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因

为在当今世界，民主与法制不可能靠运动去争取，更不会由暴力来完成，所以，应反对天怒人怨的痞子运动，反对国将不国的无政府主义。从主观上讲，追求自由的公民意识，必须包括理性自律。公民应拒绝任何廉价的自由许诺，警惕任何狂热的民主煽情，否则会把民族推向无序的动乱的深渊。

# 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

蔡 拓

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社会活生生的事实，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富挑战性的课题，它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现实与未来。本文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探究全球化的影响及其所提出的问题。

## 一、全球化 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

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显而易见，这一概括总体上讲还是一种现象描述，但也指出了最为重要的质的规定性，即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换言之，不管人们是赞同还是反对，全球化都会按其自身逻辑向前推进，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科学

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交通与通讯手段的历史性突破，就是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扩张、辐射。前者为全球化创造了打破空间和时间障碍的物质手段，后者为全球化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内在驱动力。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现代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全球化的规模日益扩大，速度空前加快，这正是今天国际社会普遍感受到全球化震撼的缘由。

全球化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的相互联系，导致了各国的相互依存。这种无法割断的联系，一方面创造了交流、创作、互补的条件，有利于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化问题，增加了生存与发展的脆弱性。

1. 国际关系的内容得到调整，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非军事化内容明显加强。

2. 国际关系行为体日趋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显著增强。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加强首先表现为数量增多，活动领域扩大。二战前，国际组织仅有 500 多个，而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 3 万个。跨国公司发展迅猛，其数量已达近 4 万家，控制着世界贸易的  $1/2$ ，世界总产值的  $2/5$ ，以及 75% 的技术转让和 90% 的生产技术。跨国公司虽主要从事经济活动，但由于它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加之利益的驱使，所以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上讲，必然广泛介入国际关系。

3. 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发生变化，国际冲突开始让位于国际合作。全球化和世界的相互依存改变着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传统思维，愈来愈多的人接受着这一共识：在我们共存的大千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千差万别，它们将长期并存于同一个地球，任何国家、民族也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独霸天

下。不同社会制度政治力量多元并存的基本事实要求人们学会相互尊重，学会协商对话，以处理相互间的各种问题。“一方所得必定为另一方所失”的国际交往法则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应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新观念、新法则。

## 二、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全球化、相互依存不仅深刻影响了当代国际关系，还引出诸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课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深刻的思考。而只有真正从理论上把握国际关系变动的真谛，才能驾驭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

### 1.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研究

第一，安全的单元多元化。在传统安全观中，安全的单元是国家，至于其他安全单元则较少被提及，起码不占主导地位。转变中的安全观则认为，安全主体已不再局限于国家，小至个人，大至全球，出现了个体安全、全球安全等等提法。从宏观上讲，新安全观的视野又转向比国家更大的共同体，认为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已使安全界限远远超越国家，必须从全球安全的高度通盘认识安全问题，协调安全关系。显而易见，现阶段重要的是在个体安全、国家安全、全球安全之间找到适宜的结合点。

第二，安全的要素多样化、综合化。除领土、人口、资源与政治主权外，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因素均对安全产生影响，从而成为安全的新要素。由此导致了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等新提法的问

世。这些提法未必被学术界一致认同，但它们所依据的事实却是令人深思的。安全要素多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在诸要素中何者更重要，则要依具体问题而定。简单地讲军事政治要素比经济、环境要素重要，或经济环境要素比军事政治要素重要都是不妥当的。

第三，安全手段的复合化。同传统安全观相比，安全手段的变化趋势是明显的，那就是军事手段作用的相对下降，使综合动用多种手段解决安全问题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第四，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受到重视。传统安全观坚持安全是相对的且可以分割，否认共同安全、绝对安全，因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每个国家安全利益的满足都需要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为前提。而新安全观则认为，各行为体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他行为体的安全、国际社会整体的安全，否则就无安全可言。立足于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学术界提出了“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与“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两个概念。

## 2. 国际协调与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regime）研究

伴随全球化的拓展，当代国际关系中非军事政治领域的问题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合作凸现，这一切使得协调国际关系显得更为必要，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可能。切实推进国际对话与合作，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以制度性安排整合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这就是国际协调与国际规则所关注的问题。

规则的组织安排主要体现为国际组织的建立与作用。从迄今为止的事实来看，有效的国际规则大都要以某个或某些国际组织为载体。

### 三、全球化与当代中国对外关系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在全球化大趋势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历史制约性下，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必须顺乎潮流，自觉进行调整。对于一个曾经是封闭的、意识形态主导对外关系的国家而言，改变和调整传统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无疑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别无他途。令人欣慰的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关系已迈出了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历史性步伐。

1. 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更加自觉地把我国现代化事业置于世界舞台。

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试图封闭起来，仅仅靠自身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力资源发展壮大起来，在今天已成为梦幻。所以改革开放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历史的选择，是长久的治国之策。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已达到极限，而是尚未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尚未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对外开放中的迟疑、摇摆，更加自觉地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交流与合作，仍然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特别是对外关系的主要议题。

2. 改变对抗性政治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确立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积极争取人类共同利益的对外战略。

全球化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告诫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不仅

有对抗、较量，而且有深刻的联系和共同的利益。即便是对抗与较量，也愈来愈需要采取文明的手段予以处理。全球化为寻求各国、各民族的共同点提供了可能，但全球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泯灭丰富的个性，这就要求在对外关系中牢固地树立求同存异、共处竞争意识。

3. 开展全方位外交，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建构与实施。

全球化与相互依存凸现了国际协调与国际规则。如同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付出更多代价，经历更多痛苦一样，在实现国际协调和建构国际规则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同样感受到大国制定、安排、控制规则的不公正，这又是一个无奈。但必须看到，以国际规则取代大国霸权毕竟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历史性进步。所以，中国应积极、主动地介入国际规则的建构与实施（包括国际规则的确立，国际组织的建立与改革）。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就其总体实力而言，在国际事务中还很难起主导作用。但中国又是一个公认的政治大国，这种特殊地位要求我们以平和的心态审视当代国际关系，同时又积极进取，全面介入国际规则的建构，努力发挥政治大国应发挥的作用。



# 全球化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汪信砚

当代世界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地表现为其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深入地研究全球化的进程和特点，准确地把握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特殊价值意蕴，从而形成一种关于全球化的自觉意识，对于规范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捍卫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并不是当代才有的事情，它至今已有了近 500 年的历史。近代以来的人们早已在承受着

全球化浪潮的拍打，但只有在当代人们才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震撼。

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世界性发展，其发端可远溯至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492 年哥伦布远航美洲、1498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以及 1519—1522 年麦哲伦完成的环球航行，就已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序幕。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世界交通运输业的面貌也迅速改观。轮船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世界上各大航线的航速；多条大运河的陆续开通，为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进入 20 世纪以后，全球范围内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人们之间全球性的社会交往也日益频繁。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战后素有“世界政府”之称的联合国的成立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变，使得人类永远告别了从前那种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社会状态，宣告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初步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亦即当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有了新的动向。一方面，二战以来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和平与发展凸现为时代的主题。为了维护和平、谋求发展，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展开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政治对话、文化交流和经济协作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另一方面，当代世界交通运输工具的飞速发展、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新通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人们之间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空前高效、快捷的媒介和手段。这两个方面因素的结合，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巨大动力，并使

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化。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英国王室事隔半年方了解到这一情况；1865年美国总统一林肯被暗杀，英国政府过了12周才获悉这一消息。然而，1969年7月12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等人驾驶阿波罗11号飞船在月球表面平安着陆，这一消息通过通讯卫星13秒钟便传遍了全世界。今天，人们借助于全球信息互联网，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能同时知晓一切。因此，与地球的村落化相适应，当代人类也实现了全球范围内信息接收与处理的共时化。正是这种地球的村落化和信息接收与处理的共时化，使得当代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以及信息、商品、资金、人员的流动越来越频繁、速度越来越快，从而使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种加速化的趋势。

第二，全球化的内容多样化。它不仅包括交通全球化、信息全球化，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竞争全球化、观念全球化等许许多多的方面。在当今世界上，生活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切身感受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各个地区、民族或国家的重大事变，从布衣平民的言谈举止到国家政要的演说和决策，都打上了全球化时代的印记。

第三，全球化的方式内在化。20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地域上的拓展以及世界交通运输网络在地球上的扩张。20世纪初，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方式开始向内在化亦即向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初步形成。

第四，全球化的效应双重化。一方面，当代的全球化空前地改善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它们又使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 二

当代的全球化已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其深层价值意蕴来看，这种影响集中地表现为它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

所谓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就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第一，在 20 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尚不具备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现实主体条件。第二，在 20 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也不具备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现实社会条件和动因。

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完全改变了上述情况，并因此而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这是经由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的。

首先，当代的全球化促成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从而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主体条件，并因此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可能。

其次，当代的全球化带来了各种全球问题，从而以否定的形式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内在的动因，并因此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现实。

### 三

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使其以否定的形式表现为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客观上又反过来向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提出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规范，这就是要求当代全球性社会中的人们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便解决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使人类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

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要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领域中始终坚持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以是否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评判人们的行为和活动合理与否、正当与否、正义与否的最高标准，当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出现矛盾时，必须使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服从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努力谋求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该转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立法、科技、教育和宣传等各个方面加大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力度，正确地处置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创造并追求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努力消除当代人与自然的对抗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协调发展。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应该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公平合理地调整国家和民族内部各地区、各集团、各阶层之间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强化世界和平与安

全的保障机制，建立适合于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共同繁荣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努力化解当代世界上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应该以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合理调整为基础，通过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和共同努力，在普遍地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的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高度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为全球化、现代化和高技术化的社会注入人性化、高情感化的内涵，努力克服当代社会中人的本质异化、精神迷失和片面发展状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相信在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中，只要人们能够坚持做到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类一定能够有效地消解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全球问题，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

# 论后现代的全球意识

王治河

## 一、何谓“后现代的全球意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随着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一种新的后现代的全球意识也日益被人们所接受。所谓“后现代的全球意识”是一种自觉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它是后现代思潮的产物。后现代全球意识强调，面对当今的严峻形势，应该从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努力形成人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实践。

## 二、后现代的全球意识是对现代夜郎主义的挑战

我们知道，夜郎主义是地道的东方产物，但“夜郎自大”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不仅东方有夜郎，西方也有夜郎王式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早在夜郎王作出那番发问之前，夜郎主义便产生了。夜郎王虽已作古 2000 多年了，但作为一种封闭性的、自大狂式的思想方式的夜郎主义却并没有随风而去。在东方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所谓“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以及“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夜郎主义的表现形态。这种思想方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它不仅在思想上妨碍着人们去客观地认识外部的世界，妨碍着人们正确地了解自身，使人类成为愚蠢的“井底之蛙”，而且在实践上，导致许多不必要的争斗和悲剧。所幸的是，抗拒这种思想方式的努力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在当代，后现代主义便是夜郎主义的致命克星。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也好，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也好，在拒斥夜郎主义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没有分歧的。后现代的全球意识便是在挑战现代夜郎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对现代夜郎主义的超越。

流行于现代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中心论”、“中心主义”，便是现代夜郎主义的表现形式。要树立新的后现代的全球意识，就必须超越和克服长期以来一直在现代人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中心意识”，就必须超越形形色色的“中心论”，其中特



别是“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

### 1. 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

西方中心论既是实现全球化的现实障碍，也是获得后现代全球意识的思想障碍。因此，对“西方中心论”的否弃便成为后现代全球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60年代后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西方自身的危机给了西方中心论以重大打击。日益繁荣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也消解了西方中心论从而给后现代全球意识以有力的支持。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认为，与西方思维相比，原始思维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它并非是低一档次的思维，它与西方思维是平行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派文化人类学则告诉人们：一种文化类型的优劣高下不应该以另外一种文化类型为标准或为参照系来判断，而应视它本身的实践价值而定。这意味着一向高高在上的西方文化的“女王”地位被罢黜了。正像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分析的那样，“我们看成是树干的西方历史已经变成整个森林的一部分。理性的胜利以及由于19世纪工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带来的斗争只是区域性的重要了。”从思想方法上看，“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将某种有限的、特殊的东西非法地夸大为无限的、普遍的东西，进而排斥其他有限、特殊的東西。

### 2. 对人类中心论的超越

与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相联系，后现代的全球意识反对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论。根据这种人类中心论，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并有权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掌握和控制自然，甚至随心所欲地塑造自然。人对自身的理解基本是囿于如何征服自然，超越自然，而不是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对此，韩国学者金泰昌有过一个很好的描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均认为

人是万物之灵，宇宙是为人类准备的。这种无论什么都要强调人类、人类、人类，只把人类的存在视为至高无上的人类自我存在的目的化、自我绝对化的观点，拒不承认人类之外的万物，于是便出现了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必须全面重新调整所有的价值都以人为中心而设定的旧的价值体系。<sup>[1]</sup>

从后现代的全球意识的角度看，“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摒弃”。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它还是我们人类毁灭性行为的祸根。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生物系统中，我们也并不是格外重要的。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但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人类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有特殊价值已导致了人类利益和所有物种的利益赖以生存的生态秩序的大规模的破坏。

### 三、后现代全球意识的理论主张

#### 1. 主张重新认识边缘的价值

后现代的全球意识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抨击作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思想基础的“中心意识”，是因为这种“中心意识”具有垄断性、封闭性和排他性。而后现代的全球意识则是开放的。它向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开放，这

包括既向西方开放，也向东方开放，既向现代主义开放，也向后现代主义开放，既向过去开放，也向未来开放。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取向”（a creative orientation）。

持整体论的科学家、过程哲学家、视觉艺术家、以及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它对话的对象。其中包括佛教文化传统、美国土著人的文化传统、女神精神传统、犹太教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中的智慧使我们的精神（心灵）从躁动不安到内在的平衡，从使人衰弱的放逐到拥抱地球共同体，从对他者的漠不关心到对他者积极的爱。斯普瑞奈克认为，这些智慧有助于我们“发展新的推进差异、主体性和与地球共同体联系的方式”。

后现代的全球意识强调，在人类历史上，新价值的创造性往往不是来源于中心而是来源于边缘，创造新价值的英雄（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孔子等），可以说决不是出自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不是在中心从事活动、教育的。因而，必须重新认识边缘的价值创造的潜在性和可能性。毫无疑问，文化、文明的中心，可以使已形成的价值学说更为精辟，但真正意义的价值学说的创造却是来自边缘。因此，不正确理解边缘的反抗意识，只从中心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能正确展望今后的世界史，也决不会符合时代和形势发展的要求。

## 2. 倡导一种全球伦理

该伦理的首要准则是：“若一事物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好，那它准是对的；反之必错。”与人类中心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相反，后现代全球意识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并预言以倡导人性与自然的“同一性”为指归的后现代世界观将帮助人们走向“完美的人性”。<sup>[2]</sup>

后现代全球意识认为，不仅所有的存在在结构上是通过宇宙联系之链而联系在一起，“而且所有的存在在内地是由与他人的关系构成的”。“代替将我们自己视作在人类社会中与其他孤立原子相冲撞、相结合的社会‘原子’，人被看作是处在一个联系的链条之中的。这一链条是由宇宙/地球/大陆/民族/生物区/社团/邻居/家庭/个人构成的。”

作为社会原子的人与自然是处于对立之中的。而作为关系的人，则与自然是统一的。我们是宇宙正在展现的过程的一部分，与星星、岩石、土壤、植物和动物有着内在的联系。

人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当人们思考地球共同体时，他们是正在思考自身的地球。

“人不是世间唯一的主体”自然也是主体。自然是自我扩展了的边界，宇宙是我们的场，我们的根据，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地球共同体的衍生物。用托马斯·柏瑞(Thomas Berry)的话说就是：地球是大系统，大教育者，大医治者，大组织者，大艺术家，大实验者，以及宇宙新奇性和连续性的大融合。

### 3. 主张克服二元对立思维

与全球伦理密切相关，后现代全球意识致力于克服现代社会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二元对立。

与二元论的现代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敌对的或漠不关心的异化关系不同，后现代人信奉有机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格里芬等人如此推崇倡导有机哲学的怀特海，将之视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重要奠基人的原因所在。所谓信奉有机论，意味着改变现代人的机械论世界观，改变现代人习惯占有的心态，现代人统治和占有的欲望在后现代被一种联合的快乐和顺其自然的愿望所代替。后现代全球意识在这里是想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

关系。体现在政治上就是重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后现代全球意识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将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将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待人接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认为它具有一种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侵害的一部分。这样，后现代的全球观便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形象，用 F. 费雷的话说就是，“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这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先驱海德格尔的有关思想不谋而合。海德格尔就曾一再强调人应该保护那块他从中获取食物并在其上从事建设的土地。人并不是自然的主人，人是自然的“托管人”，就如同原初意义上的农夫的“技能”并不是对土地的一种“挑衅”，而是一种捐献（播种），一种接受（收获），一种年复一年的保管员的职责一样。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后现代全球意识则摈弃现代激进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对“自我”的坚执往往是以歪曲、蔑视、贬低他人作为条件的，其结果是导致人我的对立（萨特的“他人是地狱”），而周围都是地狱又哪里有自我的自由可言？后现代主义将人不是看作一种实体的存在，而是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

存在，他永远是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的，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交汇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称人为“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因此之故，“主体间性”内在地成为“主体”、“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

后现代全球意识重建人与人的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重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要求重新发掘、重新发现、重新确认母系的、女性的价值。这方面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众多形式的后现代女权主义中。

#### 4. 对可持续发展的强调

后现代全球意识强调发展（不管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多维的、复杂的，包括了一系列过程和作用，并且每个过程都受到其他过程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无疑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同样，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认为，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能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确保对社会、经济、政治、工业增长的潜在力并没有对后代构成不利影响，那么，它就是可持续的。只有在思想上将地球看作人类共同的家园才能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为此要抛弃传统的“对抗模式”。巴基斯坦学者 A. 奎雷谢认为“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分花费在军事装备上并不能保证世界和平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改变这些世界性的话题的思考方式，寻求对话与解决的途径而不是使用武力”<sup>[3]</sup>。

#### 5 推重相互受益性的共生概念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摈弃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倡导“相互受益性”的“共生”与“共存”——这种新的“相互受益性的共生概念”是对达尔文的你死我活的生

存斗争概念的修正。我们知道，达尔文在著述《物种起源》时，念念不忘的是“生存斗争”概念。当时，他认为生存斗争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与同种的其他个体之间的生存斗争；第二种是与异种的不同个体之间的生存斗争；第三种是与生活的物质条件即环境之间的生存斗争。达尔文在其初期著作中重视第二和第三种类型的生存斗争，到了后期则发生变化，即认为第一种类型的生存斗争亦即生存竞争，是进化的主要因素。如同马克思也指出的那样，发生这种变化的背景，是当时存在着自由放任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的竞争带来了进步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思想。

日本学者石川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强调的是第一和第三这两种类型的生存斗争，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适者生存”理论中。在那里，几乎根本没有考虑异种生物个体间的相互作用。近年来，国外一些生态学学者对这一点有所认识，指出若不充分理解异种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就不能说明进化的整体状况，从而开始关注“共生”与“共同进化”现象。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吸取了生态学的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开始考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生”问题。然而，后现代思想家所讲的“共生”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所讲的“和平共处”。它在大讲尊重与自己不同的对方的立场的同时，仍然是讲差异的，讲斗争的。在他们看来，没有相互斗争，只有尊重对方的立场，从这种关系中是不会产生出共生的。后现代的全球意识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仅压迫和剥削劳动者阶级，而且也压迫和剥削自然界。因此对这种制度必须展开批判。相应地，那种被资产阶级所推重的关于社会生活就是为生存而竞争的观点，关于大量消费可以导致经济无限增长的观点，也是应该抛弃的。

后现代全球意识也坚决反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主张与第三世界人民友好相处，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正因为有相互对立，才能有互补性。

后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强调“共生”，是因为“共生”有助于多样性的保持。这与后现代主义对多样性的推重是一致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全球意识最推重的是创新。由于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我们都参与了的、正在进行的、悬而未决的历险，因此格外崇尚创造。用《后工业社会》一书的作者 M. 克罗齐埃的说法就是，在后现代时代，技术、经济、社会方面的“创新者成为英雄，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成为英雄”，同样，“不自卑地表现出更开放、更灵活和更宽容的人，也越来越成为英雄”。

#### 注 释

- [1] 韩 銮泰昌：《地球时代的新的价值论》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95 年第 9 期。
- [2] 参见大卫·格里芬编 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8 页。
- [3] [巴基斯坦] A. 奎雷谢：《对可持续性的认识》载于《LEAD 国际通讯》1996 年第 6 期。



# 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李惠斌

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变化，早在 150 年前( 1845 年 ) 就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思想家所预言并作了在今天看来其准确程度令人吃惊的阐述。重读这两位伟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表述的全球化思想，对于了解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 一、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得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大段话抄录如下：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 (……) 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普通化，而在贫困的情况下，就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

就是说，全部陈旧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出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它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现象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可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式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突然间’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sup>〔1〕</sup>《形态》中的上述这段话，比较全面的阐述了一种全球化理论或曰全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其内容可以主要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不可能是一种地域性的现象，它必定是全球各民族，至少是全球“占主导地位各民族”，“突然间同时发生的行动”，这是马克思一切理论的总结论和出发点，也是他的全球性理论的根本性结论，他的其他理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是这个总结论的注脚。

（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要达到上述目标，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因为，第一，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而这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前提的；第二，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就不可能有物质产品的充分涌流。相反，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搞共产主义，只能

使贫困普遍化，而在这种普遍贫困的情况下搞成的社会主义，人们还要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因而一切陈腐的东西又要卷土重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前提；第三，唯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才会出现交往的普遍化。而这种交往的普遍化是我们要说的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的第三个方面。

（三）全球化交往理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无疑是被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忽视了，那就是马克思对世界性普遍交往的非同一般的强调。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全球性的交往作为新时代产生的直接原因。这是因为，第一，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是狭隘的和区域性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变革必然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这种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决定了交往活动的重要性；第二，只有普遍的交往才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出广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狭隘地域性的个人”和“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谓“世界历史性的个人”，马克思自己解释说，“就是个人的存在直接同世界历史相联系。”<sup>[2]</sup>马克思强调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sup>[3]</sup>因而，第三，如果没有交往的普遍发展，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现象存在，处于一种“落后的、家庭式的、笼罩着神秘气氛”的状态，而这样一种共产主义必定会随着交往的扩大而瓦解。第四，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国家消亡的前提。国家消亡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导致国家不得不加强它的权力以应付因贫困和由此而造成的动乱而出现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因此，只有随着交往的普遍发展和生产的非国家性跨国

经营的高度发展，原有意义上的国家才能逐渐消亡。

当然，马克思的上述全球化理论，决不只是在上述一处偶而谈到的，相反，这种思想贯穿在马克思一生的著作中。《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正是这种全球化理论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马克思倾毕生精力写成的《资本论》正是力图通过揭示资本运动的整个过程这个世界性的经济事实，从而证明他的上述全球共产主义理论。

## 二、全球化理论与现时代

马克思的上述全球化理论对于分析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列宁曾经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修改了马克思的上述全球化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一国胜利论”，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在俄国成功地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继俄国之后，世界出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这种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建立的新的生产方式，曾经一定程度地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以国有化为主的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所说的“贫困的普遍化”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出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亲自设计和领导了中国的大规模改革，这无疑是对马克思关于地域性共产主义必然因为出现普遍贫困而失败的理论的一种

最简单的和最主要的概括。

但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给理论家们提出了许多挑战性的问题：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有没有可能？社会主义时代是不是因为苏东的剧变和中国的改革而结束了？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我们还有必要提一下另一些理论家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提出的另一组问题：“资本主义会不会结束？革命有没有可能？还有，最重要的，做为历史上革命主体的工业劳动阶级是否仍然发挥其功能？”<sup>[4]</sup>

我们把上述来自不同方面的问题分成两组，设前者为 A 组，后者为 B 组。提出 A 组问题的原因和问题本身是人们普遍熟悉的，只要对理论稍有兴趣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想到或听到这样的问题，著名的姓“资”、姓“社”问题就是这些问题的典型代表。B 组问题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 B 组问题多说几句。

二战以来，随着电脑的发展和普及，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和生产规模出现巨大的发展。电脑技术把世界缩小了，换句话说，电脑技术为全球性交往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从经济方面来看，社会的生产规模和经营早已跨越国界，而且范围越来越大，各种跨国性的经济实体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性货币体系的出现和市场一体化。从政治、文化方面看也是如此，各种世界性的政治、文化组织正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的许多职能正逐步被社会（全球性的）所取代。关于上述现象，西方学者作了大量论述，最著名的是所谓“世界体系理论”或“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教授从四个方面概述了这种理论：（一）生产过程全球化。德里克教授认为，高新技术在前所未有地增加

生产速度的同时也扩展了生产范围；另外，这些技术也使资本和生产前所未有地流动不定，从而使生产场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资本为获取最大的利益，力图避开社会和政府对资本活动的干预。（二）无中心化。生产过程全球化的结果是无中心化。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集团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宰和中心。跨国公司内部也是如此，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引发的控股比例的缩小，管理和经营的电脑化更加快了这一过程。（三）跨国公司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经济活动的跨国化意味着市场的国际化，国家对这种市场的干预越来越间接，显而易见，这种经济活动的中心不再是国家市场，而是跨国公司。（四）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的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的分散化的根源。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多中心的集合体，它一方面开拓了全球性的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又使整个生产和经营过程分散化了。

总之，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无中心化、分散化和经济活动中心的转移，构成了当今世界生产和流通的重大特征。这种现象也反映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艺术、哲学、审美、政治、伦理等），从而形成当今社会的重大特征。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着手研究这种现象，并把这个时代称为“后现代”。虽然关于“后现代”这一术语的解释千差万别，但基本内容是以传统的机械工业为特征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一个以信息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时代，或称消费时代。用西方左派理论家的话说，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个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列宁所描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也已结束，因此，现代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了现代之后。于是，一个中性词“后现代”（Postmodern）诞生了。这就是上述 B 组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世界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对这样的问题下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上发生了上述的变化，而且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感受到这些变化。

中国的伟大改革开放计划就是在这种世界性大变化的高潮时期出台的。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抉择。如果说数十年前苏联模式曾一定程度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传统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整个世界变化发展中的现实。发展滞后，这是每一个生活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都能感觉到的一个铁的事实。传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种生产关系方面的巨大革命在所难免。中国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建立一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摸索，终于由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点破了这样一个常识：人类几百年来生产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发展手段，不管姓“资”还是姓“社”，它都可以被拿来作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手段。况且，手段的性质因目的的不同而不同。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一把锤子，可以是一个凶器，也可以是一个得心应手、造福人类的工具，其性质完全由目的来决定。这就是说，必须在一个活动总体中来把握一个事物的性质。因此，撇开中国建设新型社会主义这个整体，孤立地谈某一局部（某一企业、某一区域）姓“资”还是姓“社”，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与上述提出 A 组问题的人不同，许多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改革和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是失败了，而是出现了新的生机。失败的是教条主义和传统模式。一

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正在实践的大胆探索中诞生。

### 三、全球化理论与未来社会发展

实际上，我们上面谈了两种全球化理论，一种是马克思的全球社会主义理论，一种是西方学者所提出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不幸的是，一提到社会主义，西方人就会下意识地想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专制社会主义，而东方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则首先想到的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而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一种新的形式。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正在呼唤一种新的、更进步的、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这就是说，改革是全世界范围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以适应高速发展的生产力。

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正伴随着东方人的觉醒而宣告终结。但是，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相反，社会主义将伴随它的不成熟形式的结束，而进入一个新的、生命力旺盛的新形式。多少年来，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只是局限于国家和“集体”，社会范畴淹没在国家的抽象之中。因此，这是一种没有“社会”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主义、政府主义。我们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或市民社会）开始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并试图寻求一种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模式。随着这种结构模式的形成，构成生产活动重点的将不再是国家，而是社会。国家职能将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而逐渐缩小，从而把大部分职能让位给社会，这里的所谓社会将不限于一个公司、一个集团或一级政府，而是范围不断扩大的、以每一个个人为基点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实体。也许这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西方一位左派学者曾经在一本有关晚期资本主义的书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见到了这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在这种社会里，真正的财富是来自“一切个人那发展了的生产力”，这种预见现在几乎是一字一句都实现了。这是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喜欢引用的一句话。这句话之言过其实，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同样勿庸置疑的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正在发生奇迹般的变化；生产力和交往的高度发展，正在一步步地实现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理论的预言。正像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样，传统的资本主义范畴已经涵盖不了日益发展的生产方式的现实。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姆斯先生甚至认为，后期资本主义已不能代表后工业社会了，后期资本主义只代表一个所有经济活动都开始工业化了的阶段之出现。<sup>[5]</sup>

资本主义之后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各种各样的理论家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在亿万中国人正在为“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刻，突然有人宣布：“‘现代’已经结束”；在少数理论家正在嗟叹中国经济领域的“和平演变”时，却有人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演变。从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来看这两个语言学上的悖论，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 注 释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 年莫斯科英文版第 5 卷第 49 页。
- [2] 同上。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 卷第 40 页。
- [4] 詹姆逊语 见利奥塔：《后现代状况》一书英文版序。
- [5] 参见罗青编著：《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第 147 页。

## 全球化的绿色忧思

薛晓源

90年代以来，一股浪潮奔腾而起，它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人们不得不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去审视、探究、反思它，人们姑且命名这股浪潮为全球化。

1. 全球化的一般特征及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撰写《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时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sup>〔1〕</sup>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话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全球化”这个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话语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商品的全球化的趋势将是不可避免

的。马克思、恩格斯尚处在资本主义发轫期——自由竞争时期，全球化的趋势还不明显；资本主义经过垄断时期的艰难挣扎之后，步履蹒跚地走入了后工业文明时期（丹尼尔·贝尔如是说），有人亦称之为“全球资本主义”；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兴起，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趋势在日甚一日地加强，借助卫星通讯、光纤技术、电脑多媒体等技术可以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有“天涯若比邻”的感觉，航天、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飞机运输业的普及，“咫尺天涯”已不再是人间的神话，在人们眼里，地球越变越小，已成为不同肤色的人栖居的村落。全球化问题真正凸现出来。全球化浪潮及其席卷而来的种种思潮，既令一些人为之振奋不已，也使相当一部分人感到坐立不安。如何看待全球化浪潮及其思潮？“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热闹非凡的争论中，隔靴搔痒者居多，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教授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论述，在我看来是搔到全球化蕴涵的一些痒处。德里克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特征：（1）新国际分工形成，生产过程全球化；（2）生产的无中心化，新的高技术的“汉撒联盟”开始出现，指出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3）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在生产过程非中心化的背后，生产权仍高度集中在公司；（4）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的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的分散化的根源；（5）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的渊源。<sup>[2]</sup>

全球化不论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还是作为一日常消费现象，都已是不争的事实：一般城市的小孩口嚼麦当劳汉堡包，一手拿着可口可乐饮料，在多媒体电脑上遨游全球

已经是家常便饭，好莱坞的大片同时在全球各地上映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

2. 全球化的生态学危机。进入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愈来愈明显地展露出来，空气、大气层、水的污染，森林、植被被大规模破坏，土壤沙漠化严重，化学废物遍地堆弃；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滥用，人类文明和自然的冲突以最强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据有关资料显示，20 世纪以前，科技成果的孕育和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一般为 40—50 年，20 世纪初，科技成果的孕育和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为 30—40 年，1921—1970 年，其转化的时间为 10 年，1970—1991 年的转化时间为 5 年，1991—1997 年为 2 年左右。科技成果运用、转化为生产力（全球化），一方面创造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辉煌，可以说，20 世纪任何一个 10 年所创造的生产力都超过人类以往生产力所创造财富的总和。另一方面，也前所未有地破坏了自然，很多技术以疯狂的形式在掠夺自然，地球正在失衡，很多动植物正在人类的虎视之下走向毁灭、灭绝。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全球畅销书《濒临失衡的地球》中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骇人听闻的悲惨图景：

“很多科学家认为，人类每一天都使得 100 种物种灭绝。”

“每个活着的人现在吸进的每一口气所含的氯原子都要比摩西或穆罕默德所吸的氯原子多 6 倍……而造成这种额外的氯的化学物质不到 60 年前刚刚开始具有商业用途。”

“自从发现臭氧洞以来，它差不多每年都在变深，现在所占面积差不多是美国本土 48 洲总面积的 3 倍。”

“在最近 40 年间，至少在冬季和初春，平流层中的臭氧层已经损耗了将近 1/10。臭氧层每减 1%，我们皮肤接触到的紫外线幅射量就要增加 2%，皮肤癌的患病率就要增加 4%。”

“17 亿以上的居民没有适当的安全饮水供应。30 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因此不得不冒污染水体的风险……由水污染的疾病每天平均导致 2.5 万人死亡。”

“北京地下水位则每年下降 6.5 英尺。”

“每秒钟有 1.5 公顷雨林消失，现存物种的自然灭绝率突然加速了上千倍，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洞，所有纬度上的臭氧层变薄，保证地球上可以生存的气候平衡可能受到破坏——这一切都表明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日益强烈的对撞。”<sup>[3]</sup>

面对阿尔·戈尔所列举的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话语，我们能言说什么呢？即使有话可以反驳这些数字和事实，我们又怎样去言说呢？

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与宗教人士在反思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悲剧之后，说了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奥斯威辛之后诗不复存在。”在当今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如此大的破坏之后，我们是否还有心情去吟咏陶渊明、李白的田园诗呢？

3. 全球化的忧与思。德国大思想家海德格尔在本世纪 30 年代就大声疾呼，地球正在被技术吞噬、被一堆堆钢铁缠绕，莱茵河的水不再自然流淌，我们要拯救地球。海德格尔吟咏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呼唤人类的良知，不要只从技术这一方式去标识世界的图景，呼唤天地人神四方世界安然相处、相融统一；在技术时代，人们应该重新认识、标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应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是一种守护与被守护的关系。海德格尔不停地吟咏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拯救。”

海德格尔的思路和言行对我们从生态学的角度反省全球化的进程无疑是富有启发作用的。我们认为既不能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以自然为对象，把自然界作为无机物，人可以靠自己

的意志任意妄为；也不能像某些自然神论者那样，把自然看成是神，人不能随意触动自然，更不能任意掠夺自然，人只能静待神的恩赐。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有自然神论的影子，这一点必须警惕。人类虽然不应该任意妄为，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呢？生态学呼唤一种大智慧，呼唤一种生态经济学，呼唤一种大的心胸和态势。我们认为，首先，人应该摆正自己在宇宙、地球上的位置。其次，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不光有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全球化，也应该有生态学的全球化，地球的被污染和失衡不应是以国度划界的，发达国家尽可以把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搬迁到发展中国家，把垃圾、化学废物廉价转移到第三世界，但是大气圈、水圈、自然风向的漂移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可以以国度人为限定的。生态学的发展再次证明，不光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整个地球及其自然环境也是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的。

因此，全球化及其进程是一柄双刃剑，福与祸、利与弊交融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及其进程是一柄悬挂在人类头上的达摩提克斯之剑，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掉下来，人类应该警钟长鸣，警惕这柄锋利无比的双刃剑，这也许就是荷尔德林吟咏的‘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拯救’的真谛所在！

##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2] 《战略与管理》1993年第1期第54—55页。

[3] [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 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何 萍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开放的时代。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也是当今世界开放的基础，规定着人类 21 世纪的走向，当然，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那么，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具有什么特点？说明这一问题，是我们分析、理解自己的时代，转换我们的思维方式，构造新的人类文明的起点。

## 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现在，人们使用的全球化概念，主要是指本世纪 70—80 年代以来，以全球问题出现和新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为标志的全球化运动。但是，人类历史的进程表明，这一时代的全球化运动只是人类迄今已经历的全球化运动一个突出表现，绝不是全球化的全部内容。全球化运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就



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变换自身的内容，70—8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只不过是整个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罢了。既然如此，我们无论是要研究全球化运动的全部内容，还是要更深刻地理解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和趋势，都必须把我们的研究视野扩展到全球化的整个历史进程，说明它的形成、历史演变和在现时代的特征。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容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从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全球化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全球化”就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开始了自身的发展历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宣告了人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发展的前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除了创造了一种不断发展的生产方式，摧毁了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之外，还使这种生产方式世界化，开始了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分析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的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

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1]</sup> 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开创了人类的全球化时代的同时，又强调资本主义狭隘的阶级性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因而必然引起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为新的人类文明形式所代替。马克思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2]</sup>

历史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全球化运动是在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中展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两次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结果引起了两个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变革性意义的事件：一是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科学技术革命更新了交通运输工具，发展了信息技术，使全球范围内交流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从而增进了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了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推进了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运动；同时，科学技术革命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球问题，这些全球问题既有诸如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活动、黑社会组织等社会病态现象，也有诸如人口老化、粮食危机、生态失衡、宇宙开发、海洋利用、和平与发展等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人类要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走出困境，就必须动员整个人类的集体力量，增强全球性的协调一致。由此可见，科学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正面和负面效应，从不同的方面加强了全球整体的意识和作用，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二是世界革命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由一国到多国发展，相继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

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对于改变人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两大阵营对峙，就意味着任何一方都无力吃掉另一方、消灭另一方，既然如此，为了共存，就只有相互承认、相互妥协和相互协调。这就意味着，全球化不再仅仅由资本主义来主导，社会主义也要参与主导全球化运动，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下，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也参加了主导全球化运动，比如，现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全球问题的解决展开对话，就表明了这些国家在主导全球化运动中的作用。与之相应的阶级与阶级、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是通过对话而达到彼此理解、相互协调的关系。这样，人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就由强制性的接受转向了相互间的协调和理解。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与世界革命的发展这两个事件“中断”了第一阶段的全球化运动，使全球化运动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终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运动。这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变革，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第二个时期。

分析全球化运动两个时期的兴起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运动的两个时期有着非常不同的内容和特点：第一个时期的全球化运动主要是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相联系的，可以说，资产阶级主导着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运动，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征即是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征。这就构成了全球化运动的单一化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人们常常把一些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但并不仅仅属于资产阶级，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全人类的东西，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

都归之于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把这些东西与资本主义的制度联系起来，视之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运作形式。与之不同，第二个时期的全球化运动是和各阶级、各国家、各民族的发展相联系的，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西方民族和东方民族共同主导着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运动。这就构成了全球化运动的多样化格局。全球化运动的多样化格局与全球化运动的单一化格局不同，它不是强调同一性存在，而是强调差异性存在，强调个体的利益和个性特征。在这一格局中，人们之间的关系、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不是通过同化而达到一致，而是要通过对话，达到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协调，从而形成一个彼此了解、和谐的统一体。这就建立起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新的联系方式，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建立这种新的联系方式提供了可能。

全球化运动的历史性变化和阶段性发展表明，全球化不是一幅静态的、现存的世界图景，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当代人类正在经历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历史运动。这就要求我们对全球化采取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 二、全球化的本质

所谓以动态的研究方式考察全球化，就是要把全球化当作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分析和考察。

全球化由单一化格局向多元化格局转化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展示了两种不同的

思维方式：即强调同一性存在和强调差异性存在的思维方式。强调同一性的存在方式是以认可全球化的单一化格局为基础的，强调差异性存在的思维方式是以认可全球化的多样化格局为基础。把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否定性的思维方式，就是以强调差异性存在的思维方式否定强调同一性存在的思维方式。这种否定的实质，就是把那些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从隐藏于阶级、民族、国家的形式中分离出来，把那些本来就具有非制度化的东西从已被制度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说明属于这些全人类的东西对于统一、协调各阶级、各民族、各国家关系的意义。这是对一般和个别的分离，又是对个别之间关系的重建。这种否定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从社会结构层面；二是从文化结构层面。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这两个层面的否定方式。

社会结构层面的否定，是就经济、政治的变革而言的。在这一层面上，人们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定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究竟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分别从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是两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经济运动方式？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问题。以往，人们常常把“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看作是两种不相溶的经济运作形式，认为“市场经济”是以单一的“市场”为经济组织形式和调节机制，即“市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则是以单一的“计划”为经济组织形式和调节机制，即“计划”=“计划经济”。从这一观念出发，“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被定义为从属于阶级的现象，分别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从而被视之成两种绝对对立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不可否认，“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创立的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这两种经济形式曾经对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创立的这两种经济形式并不是从属于阶级的，而是从属于全人类的，如果仅仅从阶级的观点理解这两种经济形式，必然会窒息其中的积极的、富有活性的内容。全球化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否定，就是要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种经济体制中的属于全人类的那些积极的、富有活性的内容从阶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市场”与“计划”有机的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合理的经济形式。这种否定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的。在理论上，自全球化进入第二个时期以来，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导下，人们越来越改变了“市场”与“计划”相对立的观念，认为“市场”与“计划”是两种彼此补充的经济运作形式：“市场”是从生产的结果方面进行资源配置，“计划”是从生产目的方面进行资源配置，阻止滥用资源，保持可持续发展。根据对“市场”和“计划”的重新定义，“市场”~~≠~~“市场经济”，“计划”~~≠~~“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可以有“计划”，“计划经济”可以有“市场”。这就使“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超越了阶级的目的和属性，变成了人类共有的经济运作和资源配置的手段，变成了独立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东西。这种超越不仅发生于理论上，也发生于实践中。在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中，资本主义就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越来越大；同样地，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也越来越重视市场的作用，努力把市场作为经济的调节机制。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否定，“市场”与“计划”由目的转变为手段，不再与阶级划等号，而是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运作形式，也就是当代人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形式。

在这里，“市场经济”概念不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运作机制，而是当代全人类共有的经济运作机制，它是属于全人类的，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经济运作机制。“市场经济”一旦具有了时代性、人类共有性，也就有了特定的含义，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特点：（1）“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干预下运作的，因而它包含着计划。“市场经济”不是“市场”，“市场”是受个人的私利驱动的，它与“计划”毫无共同之处，而“市场经济”则恰恰需要国家干预，只有国家干预和市场结合才能形成市场经济。市场越是发达，国家干预越是重要。国家的作用是每个个人、集团和地方集体都不能替代的。市场的原则是利润，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则是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2）“市场经济”是以个人、集体的相对独立自由决策为基础的，它承认个人、集体的经营自主权。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在根本上是否定个体和集体的存在价值的，是以同一为基础的，而市场经济则是以承认个体的存在价值为前提的，以社会的差异性存在为前提的。个体的存在，经济当事人的自由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所在。（3）与前者相联系，市场经济需要以法治作为自身得以合理、有效运作的杠杆。法治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保障当事人之间的平等、自由交易的权利。因此，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亦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这三层含义表明，市场经济既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人类共有的经济运作机制，又是协调个人之间、集体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手段和杠杆。当然，这并不排除不同的阶级、国家、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实际情况运用市场经济，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政治体制，从而形成多样化的市场经济

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应该说，现代市场经济恰恰是以承认多样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和前提的。

文化结构层面的否定，是就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变革而言的。在这一层面上，人们对近代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构成的价值体系，进行了多层面、多方面的批判和反思。近代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追求绝对性、确定性，总是想获得“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3〕。这一思维方式产生于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本来只是欧洲的思维方式，并且只是一定时代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在第一时期全球化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思维方式也被视之为统一的、最高的人类思维方式。这就是欧洲中心论形成的根源。但是，一旦全球化运动进入第二个时期，近代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就显露出它固有的弊端，从而形成了对近代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否定和批判。这种否定和批判着重表现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重新理解和说明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近代理性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而全球问题的出现则表明人不仅要征服自然，更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于是提出了生物圈的思想，要求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方面，近代理性主义强调历史发展规律单一性，把西欧社会发展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视为人类历史进步的唯一模式，以此来比较各民族的优劣，评价各民族历史进程的合理性。这实际上否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各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多元性，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反对以欧洲历史发展为人类的单一进化模式，强调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于是形成了反欧洲中



心论的思潮。反欧洲中心论不仅存在于东方民族，而且也存在于欧洲民族本身，当然，欧洲民族的反欧洲中心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近代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本质上是为了否定上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就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表现。现代思想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重新思考和说明，从根本上动摇了由近代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支持的价值体系，推动着人们开始重新探索和建构新的价值体系。当代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和当今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从文化的深层看，就是在重构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探索和建构，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自我更新，同时，又是当代人们能够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建立“市场经济”和与之相应的民主政治的文化根基。

全球化在社会结构层面和文化结构层面的否定性表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它给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机制注入了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能力，是人类文明的再生和发展。

### 三、改革开放与中国未来

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改革开放，走向未来。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曾经两度向西方开放。第一次发生于 19—20 世纪之交，第二次发生于本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这两次开放分别以全球化运动的两个时期为背景，又

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相联系，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内容和前景。

第一次开放以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为背景，并与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相联系，借鉴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这一次开放以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曾经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以第一时期的全球化运动为背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具体地说，我国建立的原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主要遵循的是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具有两个根本特点：其一，是单一化。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曾经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合理的社会主义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的典型模式。而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又是依照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以一个统一的、不变的标准建构起来的，它从根本上否定或忽略社会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复杂变化和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就是说，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本质上只强调同一性存在，否定差异性的存在。其二，是封闭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结构形式是计划经济体制+官僚政治体制。这种结构形式的基础是封建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于是，封建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保守和不开化，决定其结构形式必然是封闭式的。中国采用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只能遵循被视为典范的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自然经济的社会，与原苏联社会主义有着相似的经济基础。正是这样，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运用于中国，曾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模式固有的局限性，也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常常过于追求社会主义的形式，而忽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和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状况，因而脱离实际，封闭保守，容易犯“左”倾错误。随着时代的变革，中国社会的进步，原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再也不适应中国新的社会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但是，在中国，对原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又是以中国的再度开放为契机而展开的，于是，中国的第二次开放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性质和未来前景。

中国第二次开放以全球化运动的第二个时期为背景，又与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相结合，一方面要与现代文明的发展相一致，把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文明的现代发展之中，另一方面又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要沿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发展，两者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结合全球化运动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和 70—8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来理解，我们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其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应的法治社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第一时期全球化运动中形成的以自由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体制，而是第二次全球化运动中形成的以现代社会为基础的、为全人类所共有的经济体制。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市场经济体制为全人类所共有，是指它不为某一阶级所特有，不具有制度的性质，而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运作形式，具有工具的特征。作为一种工具，任何阶级、国家、民族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体

制，赋予它特殊的形式，又可以用它来进行交流。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遵循社会主义的经济目的而运行，具有自身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国用于改造原有的自然经济基础，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建立联系的手段，具有时代的共性。因此，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社会运行机制，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认为，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不只是一种现行的社会运行机制，而且是一个过程，是一种不断改革开放的运动，它不断地汲取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最新的生产方式充实自身，又不断地通过改革而走向未来。

其二，重建中国文化。全球化运动第二个时期形成的反欧洲中心论思潮，本质上是要求肯定各民族文化的价值，承认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合理性，以文化的多元发展代替文化的一元统治。这无疑是各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契机，也是世界新文化的创造与再生。中国的第二次开放，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这种新的文化创造之中。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开展文化批判与创造的任务是双重的：一重是批判本世纪以来统治中国人的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统治最初是与 30 年代的东西文化论战相联系的，以后又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意识形态化而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深层，形成当代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化和意识形态化，着重体现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之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就其理论体系而言，是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思想表达，而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本身就是依据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得马克思

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成为欧洲中心论的一种理论形态；就其理论应用而言，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本身就是为了遵循同一的思维方式，并在客观上不断强化人们关于历史发展单一化格局的观念。因此，不论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还是就其理论应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都在实际地向我们灌输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就在其中被深深地禁锢在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之中，更具体地说，禁锢在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中。正是这样，我们要解放思想，创造新的中国文化，首先就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开展文化批判和文化创造的第一重任务。开发文化批判和文化创造的第二重任务，是要转变由采取原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所积淀的价值信念。原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反映的是小农意识，而小农意识本身就是非民主的意识，因此，尽管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赋予了公民以民主权利，却无法培养出公民的民主意识，这种体制下的公民意识在更大程度上是依赖性和对权利的崇拜，却缺少自主性、独立性，缺乏个体性和民主性，这些便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价值信念。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民主政治体制，就是要把公民的民主权利转变为公民的自觉的民主意识，把依赖的心理转变为自主、自立的心理，这便是中国人的价值信念的更新。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更新中国人的价值信念，一方面启发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再创造，另一方面又把新文化的创造植入现代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之中。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启发中华民族文化的再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化，推动了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进程；把新文化的创造植入现代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之中，则是向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开放，使中华

民族的文化能够在与当今世界文化的交融中实现自我更新。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提到了时代的高度，构成了中国新文化创造的基础和内容，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就是在这种再创造中证明自身的价值和内在合理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与之相应的法治社会、重建中国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一事实证明，“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远离当今世界的体系，而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与当今世界融为一体的体系，它使中国社会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走出僵化的体制，形成一种富有活性的内在转化机制，又通过向当今世界开放，而获得了一种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国正通过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一个新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从而以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民族，进入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走向未来。

##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2]同上书第294页。

[3]德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34页。

## 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与讨论

谭君久

主持人：当我们日益走近 21 世纪的时候，“全球化”问题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实际上是一个多学科的问题，但“全球化”究竟何所指，它的含义是什么，似乎还有很大的争议。

哲学家：所谓“全球化”，我想指的是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同时，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整个地球所面临的也就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寻求通过协调和以合作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

历史学家：从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之所谓“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实际上，这个过程从地理大发现的时候就开始了。美洲的发现，标志着两半球文明之间的隔绝的结束，地球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过程应该说是在本世纪尤其是二战后到来的，这当然是与日益便捷、快

速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分不开的。

科学家：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说，全球化以信息社会的到来为前提。具体地说，二战后，能进行洲际飞行、载客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的航空器的使用普遍化，与大大改进了的其他交通工具共同构成了全球性的交通网络，而通讯卫星的使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直接促成了全球通讯和信息网络的建立，使世界连为一体，成为一个网络化的世界。只是这时，我们才可以说人类已经全球化了。这就是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当然，作为一个过程，全球化并不会就此结束。

经济学家：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表现在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联系，如国际贸易、市场准入、外汇市场、跨国投资、国家之间的科技交流和合作以及诸多的地区经济合作共同体，等等，这些现象都还在继续发展。历史跨进近代工业社会以后，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世界市场的出现和世界经济的产生。人们注意到，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发展中国家需要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市场。只有落后国家的经济也发展了，发达国家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最近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关注。这就说明，“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的发展或问题，都会对全球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也离不开世界市场。

哲学家：但是，全球化并不仅仅就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所包含的内容显然要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常常听到“地球村”这个词，从比较表层的意义上



看，这是指地球变得小了，不同地域、不同国度的人群之间的交换和交往变得频繁而方便了，但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意味着由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产生了可以被称为“地球共同体”而不仅仅是国家共同体或者地区共同体的全人类文明。过去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尤其在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们所接受的信息，只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天地，因此，人们的社会化过程都不能不打上民族的印记。而今天，养育我们的水土早已突破了“一方”的狭小范围，甚至已经超出了民族的、国家的界限。不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来自世界各地的物产和制造品，而且，你只需要按一下电钮，就可以从屏幕上看到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只要轻轻点一下鼠标，就可以到国际互联网上漫游。这样，人们所接受的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在内的各处信息都全球化了，人的社会化过程也就全球化了，这就产生了所谓“地球人”或者说“全球人”的问题。

历史学家：的确，今天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往往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解决的，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例如，国际犯罪、毒品走私、爱滋病的蔓延、核武器扩散、全球温室效应和环境的恶化，等等。

主持人：照此看来，全球化是历史发展到世纪之交的必然趋势，我们又该怎样适应这个趋势呢？

科学家：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首先是机遇。现在，新理论、新技术在国家之间传播的速度加快了，某种新的理论、技术一产生，很快就为不同国家的人们所共享。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计算机芯片迅速地不断地更新换代，电脑软件也不断升级，但新一代的产品从问世到由美国传到我国的时间一般不到半年左右。因此，由于世界范围的

交往，我们有可能学习和吸收各国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同时也宣传和介绍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并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为推动全球化过程朝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发展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例如，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参加的“阿尔法空间站”计划，就是人类为共同探索反物质的伟大行动，是全球化的一个生动事例。这个计划确实可以被看成是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其实，这类事件已经是层出不穷，譬如，超导技术、克隆技术、南极洲探险，各国科学家和各国政府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它们表明，尽管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和冲突，但人类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地球的关系上，毕竟共同的利益多于分歧。因此，我们对全球化应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经济学家：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消除竞争。新理论、新技术为人类所共享，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坐享其成，更并不意味着别人会主动无偿奉送。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化意味着国力竞争的范围和规模全球化了。这给我们提出的挑战是：你必须积极地、自然地参与全球竞争。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竞争的全球化，世界的网络化既然是不逆转的，我们中华民族作为地球大家庭的一员，唯一的选择就是主动地、自觉地适应这个趋势，积极地参与这个过程。竞争是需要交流的，好比体育运动，一支球队必须经常参加国际间的比赛，与其他国家的优秀球队交流、切磋技艺，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本国的球员可以到国外去打球，本国的球队也可以引进外国的球员和教练。几百年来的历史证明，在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大背景下，只有坚持开放，更新观念，改革不适应这个趋势的旧体制，学会按国际惯例和国际社会的规则办事，把自己融入国际社会，才能接受

挑战，实现民族的振兴和发展，否则就会被动，就会被国际社会淘汰，被开除“球籍”。有人对与国际惯例接轨有一种疑虑，担心这样会不会损害国家的主权。其实，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接受国际惯例，而在于你怎样去接受。我们并不只是被动地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或者让别人来对我们指手划脚，因为我们在按国际惯例办事的同时也要成为制定国际规则的参与者。但是，你首先得参与，而不是自我排斥。

主持人(对哲学家)您刚才说到“地球人”，似乎是说产生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文化。

哲学家：对了。我所说的人的社会化过程全球化了，正是意味着形成了一种“地球文化”。人的社会化过程总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完成的，今天，人们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超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一个地球人从他诞生的那天起，他就处在来自全球的文化信息的包围之中，在享受着同时也接受着属于整个地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使得他首先成为一个地球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巴西人等等。当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依然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持了它们的特性，但它们又进行了部分的融合，成为地球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地球文化就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尽管人们仍然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性，尽管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体，但是，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特性：既有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也面临着威胁人类生存的种种全球性问题。

主持人：这种全球文化的产生，是不是意味着将会产生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和价值观呢？

哲学家：我以为，这种文化不仅是将会产生，而是已经存在了。人类是一个整体，当然存在共同的利害、共同的价值判断。

科学家：人类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一个物种，首先面对的是这个世界，它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它与世界、与自然界、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我前面说到各国政府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如果不承认全人类的共同的利害、共同的价值判断，这种合作就不可能成为事实。

主持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民族利益、主权国家的利益就可以被忽视了呢？

哲学家：承认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不同民族和主权国家的存在。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不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价值判断总会有区别的，尤其是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我们只是说，人类的共同利益，应该是高于这些差异和矛盾的。但是，首先是由于自然环境的隔离形成了不同地域的人群，然后是自然经济的分割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还要看到，这种文化隔离在相当程度上是过去的统治阶级造成的，他们出于自己的狭隘的需要和目的，有意制造和夸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加深不满和对立，扩大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鸿沟，造成民族的狂妄自大、顾影自怜和自我封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现在谈论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社会制度的人类共同文化和价值观，本身就承认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存在，然后再去超越它。全球化的发展在告诉甚或是警告人们，没有了地球，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都会归于毁灭。为了整个地球的生存和发展，所有的地球人都必须接受和创造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正义观。

在这个问题上要进一步克服思想上的僵化。

历史学家：谈到思想“僵化”，人们通常以为似乎只是中国在一段时间里的现象，其实，僵化说到底是一种冷战思维，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在冷战时期，思想上的僵化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中国有过，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过，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过。这就是说，不仅东方有，西方也有。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历史学家：在近代以前，任何帝国的扩张，攻城掠地，多是以占领土地、虏获人口、抢掠财宝为目的，并不以推行某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目标。中世纪曾经发生的欧洲基督徒的十字军东征和阿拉伯穆斯林的“圣战”，虽然也以一种宗教信仰为号召而发动对异教徒的征伐，也没有造成冷战时期那样的把整个世界都卷了进来的两大阵营对垒的格局。冷战就是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冷战都是全球化过程的负面表现。

主持人：您能否着重谈谈世界范围的僵化问题。

历史学家：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尤其是二战后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就形成了 40 年的冷战局面，这与 20 世纪的全球性思想僵化是分不开的。冷战的起源应追溯到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各国对俄国的干涉。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恐慌，把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和发展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美国在 20 年代和 50 年代先后两次出现“红色恐惧”的浪潮（RED SCARE, RED FEAR）就是鲜明的例子，麦卡锡主义则是把这种恐惧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后的约 60 年时间里，不少共产党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和在相当程度上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所

陶醉,有的并且把“输出革命”、“解放世界 2/3 的人民”当做了自己的当前使命。斯大林逝世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又出现了对“和平演变”和“帝国主义颠覆”的恐惧,这种恐惧被推到极点,在中国就终于发展为“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精神背景之一就是准备和帝、修、反一起来打仗。

哲学家：问题是：当今，冷战结束了，冷战思维却依然存在。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以后，西方国家的一些习惯于冷战思维的人头脑发热，保守主义思潮一度极端发展，在国内要大砍社会福利，取消工会的权利，有的新保守政治派别几乎到了发疯的地步。在国外，他们又要寻找新的对抗和遏制的对象，似乎这个世界非得有对抗不可。面对这种形势，有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曾严肃地思索，假如世界没有了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种思索是不无道理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我们这里的一部分人中间，这种思维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苏联、东欧的剧变面前，他们显得惊慌失措，甚至要像 60 年代所做过的那样重新组织和发动一场论战，幸好是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提醒我们要冷静面对世界，韬光养晦，为我们拨正了航向，使改革开放的事业得以继续前进。

历史学家：在苏联、东欧的事件发生后，我们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就是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如今，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要想国内政治稳定，这个世界就得稳定。我们必须坚持高举全球友好外交的旗帜，完全摆脱了同时与“帝修反”为敌、用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冷战思维，为争取一个全球的和平环境，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生活的改善。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立足，首先要学会共处。我国一国两制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况且能够并存共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一

个地球上共处呢？

经济学家：也许世界就是这样，需要有两种或者更多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并存，而不要去追求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在竞争中比较，在竞争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地各自完善其自身，克服自己的弊病，最后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进步。每一种社会模式（包括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与生产力的发展、全人类的物质生活，都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会有各自的弊病。有不同的制度和模式存在，你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弊病。

历史学家：从历史的经验看也确实如此。在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得比较充分，那段时间里，美国就有不少人移居苏联。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及其在一段时间里的成功，资本主义各国才感觉到了改革的压力，于是 30 年代大萧条后才有了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革。这场改革以承认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利、建设“福利国家”为特征，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改良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为目标。对于这场改革，无论我们怎样看待它，它毕竟使得古典的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使血腥的资本主义变得比较文明了，应该说这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成熟，也意味着人类的或多或少的进步。

经济学家：反过来，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浪潮。这场改革浪潮其实是自 70 年代就开始了的，尽管这场改革在一些国家导致了我們也许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西方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增长，促使社会主义各国或先或后对斯大林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审视过去形成的传统体制的弊端。我们都知道，1974 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特别大会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这正是促使他形成改革开放主张的一次重要经历。

哲学家：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全球化的世界应该是也只能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不仅中华民族，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世界大同”的思想，今天看来，所谓大同世界，并非就是全球统一到一个模式，大同并不意味着同一，所谓思想一律、舆论一律、制度一律，而恰恰需要宽容，需要对异己的思想、主义、制度、风格、形式、生活方式……总之，对一切自己所不赞成、不喜欢的东西的宽容，同只能存在于不同之中，欲大同则必存大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五彩缤纷的，你非要同一，或者曰非得“求大同”，只能“存小异”，结果往往是纷争四起，战乱不已。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我们需要发展一种兼收并容精神，一种中庸之道。唯有这样，我们在迅速变化、激烈动荡的世界面前，才能做到从容不迫，沉着应对。

主持人：这个结论很有哲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隔膜总是存在的，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沟通，只有沟通才能增进了解，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减少对抗。这样，才能有全人类的共同进步。总之，今天的讨论很有意思，谢谢诸位。



## 全球化、制度开放与民族复兴

杨朝仁 韩志伟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确立以来，世界历史就日渐成为一种不断走向全球化的历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进程。全球化进程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了世界的轨道，为我们审视和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两大占主导地位的制度体系。在不断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两种不同制度体系的关系实现了由交锋向交往的转化。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命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客观上都要求对这一制度体系实行深层的改革。

## 一、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

“全球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各民族国家的交往日趋频繁，世界各地之间通过各种形式的相互影响和冲突而不断走向稳定和大同的历史过程。从历史的表象来说，全球化进程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巨型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南北双方在资源需求和贸易上的相互依赖等等；社会学领域的大众快餐文化的传播和泛滥，工业文明和都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普遍恶化，不断的社会结构分层带来的冲突加剧和贫富悬殊加大等等；政治学领域的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渗透和控制，国际组织功能的实施及其国际干预的不断扩大，“集体安全”名义下的各种对主权国家的强制性行动等等。从各种可以归结为全球化的现象来看，“全球化”决不单纯是人类各种辉煌业绩的纪录，它是一个进步性与矛盾性并存、诸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并存，多种价值观念的较量与兼容过程并存的历程。

全球化历程虽然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要方面，但从其动力机制和现实基础来看，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寻找，从市场经济的秘密中寻找；而全球化历程的现实可能性则应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巨大进步中寻找。

历史地追溯“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不仅对于“世界历史”（作为社会有机整体的世界的历史）的形成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而且对于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同样是决定性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全球化历程的真实起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为核心内容的生产方式，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秘密。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必须不断开拓世界市场，就必须冲破民族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封锁，就必须使得不同地区的生产、经营、流通和消费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加以重新整合和改造，使之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50 年前就已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正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过去那种地方性的和民族性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互相领带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日益增多的巨型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实体和全球性经济组织的出现，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加快。在当今，这些经济巨人的力量，正通过“生产的国际化”或“新型的国际分工”得到急剧的扩张，其影响力已跨出了国土疆界而达到惊人的程度。有些巨型跨国公司的资产和年销售额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些巨型经济组织中，国土和疆界都不能构成生产和销售界限，相反，生产、消费中各种资源的流动，却将不同的国度和疆界联系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还要求各主权国家在交往中遵循共同的准则，采用同样的商业语言，并让渡部分主权，交由共同的组织进行统筹和协调。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无论其历史文化传统如何，无论其处在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中，都不可能

持久地游离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外，最终都将会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

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飞跃，促进了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当代科学技术主要是在两大领域内推进了全球化进程：其一，通讯业和信息传播业。由于电报、电话，尤其是通讯卫星、数字化通讯等先进通讯技术的发明和广泛的使用，电讯机构已能够提供全球性的电讯服务，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使处于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可能交流思想和情感。信息传播业的发展，尤其是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播业的发展，使那些即使身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有可能出现“全球化效应”，因为生活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居民都有可能通过电视等传播媒体成为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并能够分享不同国度和民族的精神文化产品。国际互联网的建立，更使得人们可能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进行深入的“全息性”的交流。此外，电子信息技术还为现代全球金融业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得不同的国家在经济活动上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联。其二，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和设施。本世纪以来，大型喷气式飞机、高速铁路等交通运输工具和设施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距离，使世界各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生产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已成为现实。正如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所说的那样：“纵观现代化历史，首先在经济上推动美国前进的两大发明为电报（后来是电话）和铁路，而使地球变成全球经济村的两项重大发明是喷气式飞机和通讯卫星。”

因此，在当今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尽管不同的力量和关系、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混乱与秩序并存，我们仍然强烈

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活的空间在不断变小，生活的内容在不断丰富，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在推进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过程中，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体制的确立是基础、是前提；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关键，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条件。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生产方式的确立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使得全球化进程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具有了现实性。

## 二、制度开放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大主导性地位的制度体系。无论是从客观的历史进程来看，还是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与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进程有着极为深刻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不仅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且主导着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使得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在这种格局背景下，全球化进程对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能够如何能够寻求发展的机遇，壮大自己的事业？这是每一位关注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从全球化的思维视角去思考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首先意味着要实现一次思维方式上的转换。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我们不能恪守对于社会主义的狭隘的“自我中心式”的理解，无论这种理解是源自对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信仰还是源

自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朴素情感；我们同样不可以拘泥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解中，用“借鉴”与“抵制”、“吸收”与“批判”相结合等模式化的思辨方法，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复杂关系简单化。与全球化历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综合逻辑，这种逻辑将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亚层次的制度文化实体，理解为构成“全球”这一文化巨系统中的“要素”，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正是这些制度因素的相互激荡、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过程。在全球文明这一巨系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每一制度体系要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它本身就应该是“开放式”和“吸纳式”的，而不是“封闭式”和“排他式”的。制度的开放性既是全球化进程的客观要求，也是制度文化自身得以发展的生机所在。

首先，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客观上要求制度间的关系由交锋向交往转化，社会主义要在制度层面上实行深层开放。

全球化的历程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曲折。全球化的历程虽然是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进程，但它本身并不是完全合乎理性的过程。本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全球化历程中最大的矛盾和冲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这种冷战采取了“制度性冲突”的外观。在这种“制度性的冲突”中，“世界主要分水岭的两边，都表现出某种传教士式的狂热。两种意识形态都为双方宣传的使命提供了理论基础……苏联和美国都相信，理性、意识形态、道义、历史以及法律规范都在自己的一方。双方都是布道者，都同样受到理想主义的驱使”。为了推行各自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理想，交锋的双方不仅仅开足了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而且进行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在苏联，则同时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种种制度

规范，推行僵化的制度模式，用排斥甚至敌视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及其创造的文明成果。可以说，冷战的顶峰时期，也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在原苏联遭到最严重的扭曲的时期。

原苏联的解体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外背景。但是，从全球化的宏观视角反思这场历史性的事件，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两点启示：第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客观上要求制度间的关系由交锋转向交往。冷战时期的经验表明，两种制度体系之间的非理性竞争，最终只会导致全球性的灾难。在这种“制度性冲突”发展到“核威胁”的水平时，制度交锋旅游构成了人类的悲剧。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不仅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而且也反映了全球化进程的客观要求。和平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发展的前提，社会主义更应成为维护和平与发展的保障。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既已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也就应成为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第二，社会主义要在制度层面上实行深层次的开放。社会主义制度的曲折经历表明：制度的建立并不会自动地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自我封闭则更会束缚、窒息生产力的发展。制度与生产力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制度的确立可以是随意性的，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它正反映了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历史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短暂的历史更清楚地表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调整，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分配形式的多样化，政治生活中民主意识的觉醒和科学决策意识的增强，使社会主义重新获得了生机，社会主义制度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实行深层次的全方位的开放，去掉惧外、排外心理，深入地理解和不抱成见地吸收发达国家的一切发达之处及发达的制度原因。

其次，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将对传统的制度意识构成挑战，并要求对围绕传统的制度文化而建立的种种价值观念进行重审。

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制度文化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体现在理论上或道义上，而是体现在功能的优势上。从理论上讲，通过计划来自觉地配置生产资料比通过市场来自发地配置生产资料，更符合人类的理性要求，财产的平均占有比私人占有也更符合人类的道义诉求。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基础的，这种社会制度的建立是能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对于历史进程的“功能主义”的解释，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现今世界的社会主义制度，恰恰都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国家中，通过夺取政权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建立起来后，社会主义国家又将主要的注意力放置在捍卫制度的纯洁性上，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和竞争中，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功能优势。因此，我们应屏弃那种从性质、形式和结构上看都是单一和纯粹的制度文化，用“功能主义”的观念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得失。

以封闭性为实质内容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纯洁性”，是社会主义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它在貌似先进实则封闭、僵化的生产关系中，确立起了许多约束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观念，比如，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单一的分配方式，绝对的公平观念等等，这些观念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教条主义理解，没有认识到当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在缺乏马克思所设定的物质文化前提下进行的这一基本事实，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去



实行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原则，因此使得社会主义再次由科学回到了空想。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如果错把那些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生产方式、经营手段、管理策略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属品而加以抵制，并把那些近现代世界文明确立起来的、与现代生产经营方式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加以否定，就必定会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空间，使社会主义脱离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文明的主潮流。

在全球化进程中，对传统制度意识的挑战和价值观念的重审不只是表现在经济领域内，而且也会涉及到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内的制度性开放，最终必定会要求政治领域内的制度性开放，尽管政治制度的开放无疑要比经济制度的开放困难得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渐加速，各民族国家在致力于其政治的发展时，就必须维护、遵守和促进那些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考验的共同的、政治性的价值标准，如：民主、平等和人权等等。全球化进程是不断地将这些价值标准整合到各民族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过程。

第三、全球化过程要求我们拓展思考中华民族命运的思想维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突破了“制度论”思维模式的限制。

全球化把中国的社会发展纳入到了世界发展的轨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制约着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的发展路向和发展成就又具有极大的全球意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伐日益加快，随着全球化问题的日渐突显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需求日益迫切，随着“全球性文明”的曙光初照，对于我们来说，制度性已远远不能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来讨论。如何抓住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成为我们思考制度问题的落脚点。

全球化进程拓展了我们思索中华民族命运的思想维度。中华民族是在世界文明中创造了丰功伟绩的民族，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却遭受了无数的苦难和蹂躏。1840年以来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求亡图存”的历史，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在长期的革命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从自己的苦难命运和奋斗历程中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结论，并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命运与社会制度两者之间，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是不断地改革现有制度的弊端，使之有利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而实现民族复兴之梦？还是牺牲民族的利益去捍卫制度的纯洁性和理想性？这是我们必须深长思量的问题。全球化进程之所以拓展了我们思想维度，不仅在于全球化进程为我们开启了一种宽阔的国际视野，而且在于全球化进程再次给我们强化了危机意识，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与世界现代文明的巨大差距。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只能通过对于制度的深层改革和开放，才能加入到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流之中，才能真正寻找到一条既保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同世界文明相呼应的发展路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收获的一项伟大的理论成果。站在全球化进程的视角来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突破了“制度论”思维模式的局限，因为这一理论体系的重心没有局限在如何去修复和弥补一种制度的缺陷这一问题上，而是旋转在探索出一条切实能引导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发展理论，一种关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尚不发达的大国如何走

向现代化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理论。因此，“发展是硬道理”，构成了这一理论的主题，“发展”因而也构成了这一理论体系中的最高价值标准。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发展是第一位的，发展不仅是我们的各项改革的总体目标，而且也是评判各项改革的根本标准，各项制度的改革同样要以“发展”作为检验标准。

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为每一民族国家探索自己的生存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思想坐标系。在这一新思想坐标系中，民族国家的制度背景，是决定着它的生存与发展的多项因素中的一项，是一种具有可塑性的变量。制度的深层开放，是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只有将制度问题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制度问题才具有积极的意义。也许，这才是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制度观”。

#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王连喜

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今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全球化就是这一变化趋势的主要表现之一。对此，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自觉地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历史进程，从急剧变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测定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位置和方向，直接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走势的联系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 全球化与世界历史进程

20 世纪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的“自觉转型”及其转

型的步伐加快和强化了全球化进程；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与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亦步亦趋的，这种进程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和趋势。窥一斑而知全豹。熟知和体悟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和发展趋势，就可以大致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趋势和规律。

全球化概念的模糊性决定了全球化不是一个具体、明确的现象，它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全球化概念的特征是多维度的，正是这一多维特征才使全球化进程所涉及的领域广多，并且正在从实践领域向精神领域扩展，逐步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新背景、新坐标和新视角。一般认为，全球化的历史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化过程而得以逐渐形成的；全球化理论则是与 16、17 世纪以来人类历史的进步紧密相关的。全球化萌芽于 15 世纪早期到 18 世纪中叶的欧洲；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则是本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产物，其背景是通讯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经济活动的跨国组织、国家行为的理性开放主义、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涌现及其作用的日益加强，从而导致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人类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共同性行动、“西方中心论”的动摇、“全球村”观念的确立等。进入 80 年代以后，尤其是 90 年代的全球化理论开始用更多的精力关注文明之间的关系，这表明人类对自己所处的不断变动的世界更加直接和全面地关心。

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可以从世界范围内全球化概念的解说中、理论发展的脉络中得知。不同的政治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对此有不同的陈述，首先是信息通讯网络的全球化。从信息通讯角度看，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可以不受自

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交流。“全球村”（globalvillage）理论就是对信息全球化的描述。其次是经济的全球化。从经济的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特别是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内配置。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劳动市场和资源的全球化、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商品和消费模式的全球化、交通运输的全球化、财政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核心是资本的全球化。它的推动力来源于西方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第三，由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其反思而确立的生态社会主义观念等。此意义上的全球化，被描述为人类在共同的问题下，所达成的关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共识。第四，资本主义全球化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沃勒斯坦、德里克等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中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过程。在全球化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或全球走向资本主义。第五，从文化、文明的角度看，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人类各种文化、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异质构成的多样性统一体，这是未来文明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在此，文化、文明的各民族特质是任何时候也抹杀不了的。最后，从制度的层面看，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推广和扩散。如市场经济通则和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就属此类。如果从世纪之交的世界社会主义宏观力量和走势看，社会主义的复兴是可以预见的；当然，未来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单一模式。总之，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它既突出地表现在经济、政治领域，也反映在文明、文化领域；既是物质层次的，也是精神层次的；既是人类社会系统中各元要素的同

构，也是同构中单元要素质的确证。因此，全球化是一个跨学科的、需要各门学科共同参与研究和学科之间有机结合的国际性问题。

当代世界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主要有：(1) 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世界在多元中共存，在同一中分异。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程或发展的初始阶段，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更多的是在多元化发展中，通过彼此的撞击与磨合，才逐渐形成了互相适应、互相理解、互相提高、互相依存的动态格局。人们也正是通过对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互相适应、互相趋同，通过对一系列矛盾的协调和消解才发现了全球化这一事实。(2) 从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看，“全球化”不等于“全球性”；全球化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着全球化倾向。全球性是一个目标概念，而全球化是过程概念，由此可见，目前的世界并没有进入“全球性的世界”，而是处于这一全球性世界的发展过程之中。正如现代化一样，人类从近代就开始谈论现代化问题，但直到今天，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又有多少？世界的普遍现代化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3) 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多种文化、文明共存和竞争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是一个多元的异质的共同体，资本主义只是文明的一种，而非唯一的文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由于其他文明的崛起受到挑战，未来的全球化可能应该是全球多种文明共存。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文明已经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的文明平起平坐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文明。(4) 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人们思考全球性问题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成为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新背景。换言之，全球化是一个跨学科的命题，具体科学的解释不足以囊括全球化的全貌。但作为一

种思维方式，可以多系统、多视角、多层次、广范围地考察和思考复杂多变的纷繁世界，考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趋势和特征，从而进一步影响和改变人类运动的方式，特别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进而推动世界全球化进程，推动世界历史进程。(5) 全球化是现代化的特有现象。进入 20 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内涵不断丰富，表现为新兴产业的崛起更迭及从经济层面向政治文化层面的全面发展。经济的现代化也要求政治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同时现代化的外延也在扩展，这就是全球化的过程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显然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孜孜以求的目标。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表现为全球的现代化；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在更高的层次表现为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的历史趋势。

全球化（从孤立时代到多中心时代，再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逐渐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的社会心理等方面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双重影响。全球化时代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整体实力的壮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及所产生的世界历史意义，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 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势

西方有些左派认为，当今世界不可争辩的全球化事实表明，马克思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现实的两个条件——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高度发展——日益成熟，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那种理想的社会状况正在变为现实，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形势正在向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和接近，虽然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使作为制度、运动和学说的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这是关于全球化理论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一种积极解释。上述观点很具有代表性，而这一结论的得出基本是对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社会主义宏观力量的总体分析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社会历史的演进决不是一条没有曲折的直线。社会发展中暂时、局部地偏离前进、上升的总趋势，逆转和倒退现象的短暂出现，“低谷”的逼近和“低潮”的显现，都是不足为奇的。正如列宁所说的：“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sup>〔1〕</sup>全球化浪潮，特别是所谓资本主义全球化倾向的出现并没有销蚀或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法则。从全球角度看，如果说单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扩张来摆脱危机、缓和矛盾，那么，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向外扩张是有最终极限的，这也是社会主义必然还要产生的最终根据。也就是说，全球化进程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非本质的东西，纵使有部分质变（如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允许的范围内所进行的某些改革等），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变。随着国际资本扩张极限的临近和资本主义各国财产所有权社会化的扩散，社会主义以其历史逻辑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孕育、萌发。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那么，世纪之交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社会主义整体力量怎样？这种力量能不能足以改变世界的格局，从而使社会主义在

## 21 世纪走向复兴？

我们从运动状况和理论创新两个方面来分析，因为苏东剧变虽然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严重曲折，使社会主义实力大打折扣甚至像某些人士所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走到“低谷”而复兴渺茫，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制度仍然岿然不动，“一球两制”的世界格局仍然实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及示范效应不容低估。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看，组织上不断分化组合与“低潮”前的复苏相并存，是苏东剧变以来的基本特征。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形象和组织实力，主要体现在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新社会运动（从事者）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独立左翼（人士）、托派及其他极左派，特别是前三个政党。共产党在其执政和非执政国家里的力量表现是不完全相同的。目前仍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正以其经济成就向世界证明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同时通过对自身实践的理论总结，丰富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占世界 1/6 土地和 1/5 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近 20 年的发展成就是惊人的。古巴和朝鲜的共产党也都顶住了压力，正在探索改革之路，形势有所好转。在非共产党执政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里，组织力量的发展成效不如理论创新的成效大，即其实力不是体现在政权等物质力量方面，而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创新及其影响方面。但欧洲的社会主义却声势大振，欧洲社会党的势力浩大如日中天。如今的欧洲已经遍地是粉红色的。在欧盟 15 个成员国中，除了德国、西班牙是右派掌权外，其他 13 国都是左翼社会党执政。在英、葡、希腊，社会党独揽大权，在法、爱、比、卢、芬、瑞典、丹、奥、意，社会党都是与共产党或中间派联合执政。欧洲的

这些党派都聚集在一个广泛的组织“欧洲社会党”之下。欧洲的社会党不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是一个跨欧洲的政党。它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 626 个议席中占 214 个，是第一大党。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中重新探索重建社会主义之路。它们的组织在恢复和重建以后不断壮大，许多已发展成为在群众中有深厚基础并对国家政局有重大影响的党。这些地区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等从 1992 年以来在议会选举中相继东山再起，重新上台执政。在整个欧洲，俄共和法共组织实力最强，近两年来通过制定新纲领或发表新宣言而阐发的一些新观点，在整个左翼力量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现时代的发展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意义。亚非拉地区的共产党人正在继续探索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声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亚非拉国家大都是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执掌政权，虽然它们是不稳定的或摇摆的社会主义力量，但对于平衡世界政治格局，避免全球政治钟摆的过分右摆，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有迹象表明，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并没有滞后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拉丁美洲反而成为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最活跃的地区。此外，从最广泛的“大左翼”的角度看，在西方发达国家近 20 年具有强劲发展势头的新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及第三世界反经济帝国主义等，也构成社会主义的力量，它们的运动遍及世界，但组织力量的地域有限。以上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具有生机与活力，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在漫漫起步，社会主义力量在经过调整之后进入稳中有升的态势，虽然仍不排除有发生大的变数的可能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低潮孕育着高潮，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低潮将预示着马克思思

主义的新发展，预示着社会主义的新胜利。”<sup>〔2〕</sup>

对于苏东剧变以后所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端倪，西方政治家纷纷发表评论，并表现出少有的激情。布热津斯基描写道：原苏东国家“快速私有化所造成的社会困难和经济困难，非常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政治上的动荡不安”，“生产和消费大幅度下跌，极度的通货膨胀和日益增多的失业人数”使得“为数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憋不住要对极少数的新贵富豪发泄怨愤”。那里的人们有关反思，开始对“民族口号不在着迷”而怀念过去有保障的安全时代。正是这种怀旧情绪使这些国家的许多选民在议会选举中把他们的票投到了那些由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所以出现在一些国家前共产党或左派力量重新崛起的新景象。因此，这些政治家们惊呼“共产党卷土重来”了、“新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了、“马克思主义又回来了”……我们认为，苏东共产党或左派力量的“东山再起”之征象，虽不能断言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已复苏，但多难的曲折磨练，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在对比和反思中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真正价值所在。“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

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创新和影响看，有两个特点必须注意：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低潮，反倒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二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在指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开辟出一条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勃兴与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因运动低落而导致的社会主义整体力量的亏损。在对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思中，独立左派人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社会运动及经过思想解放的共产党人为此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独立左派人士对社会主义理论反思的主要观点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寻求克服资本主义对人的发展所造成的异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揭露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端；根据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和现实社会关系，设计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这些从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条件出发来反思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无疑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力量。新社会运动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反思的突出特点，是把理论关注焦点移向全人类所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试图在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存在的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与全球化进程或世界历史进程在本质上的契合。新社会运动从一个侧面也思考或回答了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问题，给未来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增添了积极内容。以俄共和法共为代表，共产党类型的社会主义政党近几年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后的理论反思，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一些思想观点还具有一定的世界历史意义。俄共明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按劳动数量、质量和成果分配生活资料的无阶级社会，一个在科学计划和管理下，达到具有高度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益的社会，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和发达的精神文明、鼓励个人的创造积极性和劳动者自治联合的社会。这种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必须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在保持全球生态平衡的情况下，通过根本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使科学进步向人道主义方向发展，不断提高地球上所有居民的福利水平。这是世纪之交的动荡局势逼迫人们必须对人类未来发展作出的必然选择。显然，从挫折中沉

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从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艰难处境中寻找出路，对当下的社会主义运动更具指导意义，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也积累了新的生长点，埋下了新种子。

法共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共产主义”实现的思想。法共认为，“新共产主义”是一种更加文明和更加人道的社会。“新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由变革和运动组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从“现存秩序”中产生，通过不断发现现存社会的成果、需求和潜力来否定和取消剥削、异化和阶级统治。同时，“新共产主义”又是反对“现存社会”的，因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充满了倒退、对抗、异化和“为金钱而金钱”的逻辑。法共认为，“新共产主义”实现的阶级基础是多样化的，而不再是原来结构和特征的工人阶级，凡是拒绝资本主义的人都可以联合起来。这种多样性的联合首先是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左翼进步组织体现出来，让联合起来的数以千计的男女主要通过投票选举对社会的演变和政权的更迭作出抉择，进而实现一种相对稳定的建立在公民干预基础上的“左翼力量变革联盟”。“新共产主义”观念是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双双失败而提出来的与过去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从而表现出法共对共产主义革新之路探索的独特性，但从这种独具特色的共产主义观念可以了解到当今社会主义学说的共同性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关切度。

从成功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注入鲜活活力的邓小平理论看，世界社会主义依然充满希望。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球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个扎根于中国国情的世纪性课题，又是一个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世界历史”性课题；既是具有民族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又是具有特定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既折射出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的不倒，社会主义在中国找到了新的成长点，又可以窥见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既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又为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或社会主义的普遍胜利提供了物质和精神条件。正如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将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表现在理论上逐步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在地球上确立以来，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问题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子，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背景下，把许多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来固守，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如何对待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面临的首要的问题。与苏东各国不同，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甄别传统社会主义的功与过、社会主义制度与模式的关系、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的认识，初步搞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

平，从而使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也使世界上其他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政党坐下来认真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理论必将通过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整个世界特别是在坚守社会主义阵营并开始出现复兴端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于邓小平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国外传媒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1992年12月7日埃菲社发表年终专稿写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挽救已经解体的苏联的中央集权主义所面临几乎不可避免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而向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回答。”俄罗斯学者、莫斯科大学教授布坚科博士在《真理报》（1995年8月30日）上撰文指出：“对那些面临相近任务的国家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可以想见，邓小平理论与实践，必将推动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建设实践模式上初步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全球范围看，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既是当今世界的一种特殊发展现象，更是一种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打下深刻的世界历史基础的、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的普遍发展现象。

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独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这种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模式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经验：一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思想，如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



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新概括；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观点；关于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关于对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新概括、对世界主要矛盾的新认识、对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新思路等。二是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新做法，如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新做法；关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体制改革的新举措；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新经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外交新战略和新策略等。三是具有国际借鉴意义的新构想，如关于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关于用“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伟大构想；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新判断等。因此可以说，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逐步找到的既能解决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问题又能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在当今世界上新的、较为成功的发展现象，而且这种发展现象对于地区以及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扩散与推动作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关注，对于当今的世界经济政治新格局的最终形成会产生越来越积极重要的渗透力，特别是对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发展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背景。

第三，把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与全球的普遍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及社会主义旗帜的不倒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使改革开放时

代中国的发展具有了地区性和世界性意义，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纪元的开辟注入了新活力和新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固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但这种扎根于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个性中，禀赋有世界社会主义共同性的特质，正如邓小平理论拥有了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更深层本质一样，因而对世界社会主义有很强的针对性、普适性和指导性。所以，邓小平同志坚信：我们的路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并且他一再告诫我们：必须确立“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sup>〔3〕</sup>的信念。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关系时说，经过扎扎实实的建设和改革发展，中国发展起来了，经济进入了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sup>〔4〕</sup>。他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sup>〔5〕</sup>“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永远站得住”，这一坚定信念的保持决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是因为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初步搞清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力军和旗帜，开辟了新时期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乃至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指出了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径。

总之，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无疑将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总结 20 世纪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无疑将把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使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新经验、新范式和新形式，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更为广泛辉煌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sup>〔6〕</sup> 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更加耀眼、更加辉煌！

## 注 释

〔1〕《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8 卷第 6 页。

〔2〕《论加强党的理论建设》载于《求是》1994 年第 4 期。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46 页。

〔4〕同上书第 225 页。

〔5〕同上书第 320—321 页。

〔6〕江流等：《20—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载于《科学社会主义》1995 年第 3 期第 24 页。

## 从欧盟看全球化过程中 国家主权和职能的转移现象

付小随

全球化是人们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渗透乃至体现出一体化趋势这样一个事实的引申性描述。这就是说，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但经济的发展必然要给国际政治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其内容之一就是国家主权和职能的转移。这种转移在主动和被动两种形态下逐渐增加使国际政治和相关国家的内部管理产生了一些新的特征。欧盟就是国家主权和职能转移的产物，对这一现象而言具有最为明显的代表意义。

—

全球化的先行步骤是区域集团化，而欧盟则是区域集团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可以认为欧盟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欧盟的前身是成立于 1951 年 4 月 18 日的欧洲煤钢共同

体，以及在 1957 年 3 月的《罗马条约》基础上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3 个共同体于 1967 年合并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也由最初的 6 个增加到 15 个。1991 年 12 月 11 日，欧共同体国家首脑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欧共同体第 46 届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欧洲联盟正式成立。由于欧洲联盟在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方面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步伐，将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因而使它成为区域集团化程度最高的存在形态。

欧盟在区域集团化和全球化方面位居世界前列，首先是由欧洲国家在生存和发展方面的特殊内在需求所促成的。欧洲特别是西欧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17—19 世纪更是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是 20 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世界大战，使欧洲国家普遍大伤元气，列强沦为二流国家，整个欧洲也被两个超级大国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从此欧洲就成了被支配和被监护的对象，丧失了在世界经济尤其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独立行动权甚至发言权。而且，欧洲人不可能将改变这一局面的希望寄托于任何一个单独的欧洲国家，因为在两强面前它们无论从国土、人口还是政治、经济实力来看都显得过于弱小。在这种情况下，萌生于 18 世纪思想家脑际之中的欧洲联合的观念开始浮出水面，并经过了法、德等国主要政治家的极力促成，逐渐付诸行动，变为现实。所以，欧洲联盟的动因主要是政治，而实施的步骤则先从经济开始，走的是一条比较现实的道路。

其次，更重要的一点是，欧盟 90 年代初以来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进行和成员国之间合作水平的急速提高，反映着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国际经济竞争加剧的趋势下，同一地区的

国家以联合为应对之策的必然选择。由于资本、生产过程和技术创新的国际化特征越来越显著，不加入一种合作机制的弱小国家就必然难以追上时代的步伐。尽管欧洲国家的科学技术基础雄厚，水平一直较高，但单个国家的力量仍然是非常有限的，联合才是它们的最佳选择。欧洲尤里卡计划的启动、推广和扩大是欧盟国家共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同时，苏联的解体、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调整带来了契机和动力。欧盟国家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机遇，将欧洲联合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从而使其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

## —

欧洲通过欧盟实现高度的一体化，对于成员国来讲，其必须承受的代价就是国家主权和管理职能向外部的转移。联合的水平越高，转移得就越多。尽管转移的过程充满曲折和复杂的矛盾，但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联盟内各国经济方面的主权和管理职能已经和仍在发生大量的转移。早在欧洲共同体时期，成员国之间就通过建立关税同盟，取消了商品流通的国界，海关监管职能公共化；通过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将国内经济的调控职能部分公共化；通过建立统一货币体系和“科技共同体”，使汇率、结算、储备及尖端科技开发的组织管理职能部分公共化。而联盟成立以后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正式形成，使联盟内部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实现了自由流动，“经济国界”基本消失，成员国互相之间的海关职能完全公共化。从 1999 年起，欧盟将实行单一

货币，由将设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履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职能。同时，公共财政政策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也开始运行。这样，成员国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国家主权和管理职能就逐步转移到超国家性质的联盟机构身上。

其次，联盟内各国的外交和政治方面的主权和管理职能也已经和仍在发生大量转移。欧洲国家联合的最初动机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联盟正式成立之前，各国已经建立了政治合作机制，但水平相对较低。《马约》的签订使政治合作由“外插式”转变到“内嵌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达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和深刻的程度。通常国家间的政治联盟主要体现在对外事务方面，而欧盟国家的政治联盟则是向“内政”方向全面展开，使各国的内部事务管理职能和主权大量向联盟机构转移：原外交事务上的一般合作被提升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基本实现了在国际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确定了可以通过欧洲理事会达成共同立场，采取“联合行动”；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拓展到司法和民政事务方面，并建立欧洲公民资格，赋予其选举权，在任何成员国内居住和来往的权利、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等，取消成员国护照，通行欧洲居民身份证；组成联盟的议事和办事机构，除了将欧洲理事会作为最高政治机构外，还建立了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这样，成员国各自原来完整的政治方面的国家主权和职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超国家的联盟机构之中。

欧盟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职能向联盟机构的转移既有体现全球化趋势的一般因素，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因素。这个特殊因素就是，它不是为了建立松散的经济或政治联合体，以依托这个联合体保持本国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欧洲联合的高远目标是整个欧洲的统一，经过政治邦联的形式，最终走向联邦，建立

“多民族的欧洲合众国”。这样的合众国将和最早在欧洲形成而在当今世界普及的民族国家有新的不同特点。为此，各国国家主权和职能的转移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性质。当然，即使从欧盟国家的这种特殊情况考虑，它也仍然是全球化这一基本趋势在欧洲的特有表现形式而已。

### 三

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家主权和职能的转移已并非欧洲国家所独有。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已以其他形式开始有所表现，从而成为与全球化相伴随的一种经济—政治景观。

其一是世界性、区域性的经济组织正在建立与一些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在这些关系中，由于实力单薄的国家对强大的国际组织存在着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的依赖性，从而给国际组织介入国家职能提供了机会。不仅如此，许多国际组织已经成长为国际政治行业主体，进入到国际政治的运行轨道，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籍此对国家主权和职能带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作为，以及世界银行等，都是这一类影响的很明显的表现。区域性经济组织除欧盟的特殊性质之外，如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里约集团等，基本上都是以使成员国的部分经济管理职能公共化的形式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转移。转移的前提是不威胁到国家主权的独立存在和行使。这种转移可以看作是国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取



主动权所付出的一种代价。

其二是跨国公司的经济扩张活动造成部分东道国国家主权的被动转移。当今世界跨国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影响和左右世界经济政治过程的实力强大的独特国际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在促进借贷和资本的国际化、推动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通过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高新技术的垄断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部门，影响东道国的政策，削弱了东道国的经济主导权。有些跨国公司甚至通过收买和培植代理人的方法插手东道国的政局，更有少数跨国公司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直接控制东道国的部分土地，在当地行使国家统治职能。对于有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吸收跨国公司的投资，引进技术和贷款，发展自己的经济，有时不得不满足某些跨国公司的要求，在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出让部分国家主权。这种国家主权和职能的转移可以看作是国家为发展经济而付出的一种代价。

#### 四

在全球化过程中，以欧盟国家为独特代表的国家主权和职能的转移现象，可以给我们带来几个方面的提示。

其一，对国家主权概念的理解，应该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经济方面。传统国家主权概念比较偏重于政治和外交，强调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这是民族国家产生尤其是后来的民族国家独立过程中形成的主权概念的特点。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随着“经济安全”概念的提出，国家主权概念中经

济因素的含量将不断增大。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派出国防部长科恩专程访问有关各国，便是一种体现。经济一体化伴随着信息化、网络化，资本市场开放以后的金融自由化，必将使人们对主权的看法更趋复杂。

其二，全球化和国家主权是存在矛盾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更多地介入国家主权，国家则以维护主权方面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为目的和跨国公司及国际组织达成某种交易，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两者之间矛盾的调解应采取什么方式最为合适，今后的发展还会出现什么新情况，这对于发展中国家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其三，对现实操作有思考意义的一点是，国家的对外关系将增加内容并显现新的特点。西方学者提出了三维新外交观点，认为传统的国家间的外交将被国家与国家间、国家与公司间、公司与公司间的外交所取代。事实上，这一理解仍嫌不足，应该增加“第四维外交”的概念，即国家、公司与国际组织间的外交。对于“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欧盟及其他一些重要国际组织来说，这种外交已成现实。如欧盟新近制定对中国关系的新策略，最近举行的中、日、韩、东盟四方对话及中国与东盟双方对话等，就是如此。今后这样的外交内容将在国家对外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其四，传统民族国家概念也将得到修正。由于国家主权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现实中已经体现出了可分割性，这已经破坏了最初的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概念。而欧盟在走向联邦的过程中，国家主权更是大量转移，这对于成员国相互间而言，彼此都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完整国家了。而有可能形成的新的欧洲合众国，也肯定与目前业已运作的联邦国家有许多不同之处。对此，国家学说应当有新的内容出现以适应这一情况。

# 从国情出发 与国际接轨

##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唐代望

### 一、公共行政与国际接轨涵盖行政观念、 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

我们认为，“与国际接轨”的本义是指人类社会应遵守的一些合乎各国共同利益的办事规则、程序和行为标准，互相联接、统一，以利于进步事业的共同发展。最早用于国际商品及技术贸易这一特殊领域，因为我国建立与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必须对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许多与国际市场不相符合的体制、法则进行改革，以达到与国际市场及国际贸易的标准、惯例相衔接的目标。本文把“与国际接轨”的内涵延伸到行政管理领域，这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人为的扩大，而是适应国际潮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国经济已步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众所周知，我国政府职能的重点就是管理经济。经济与行政密不可分，经济是行政的基础，又是行政的延长，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服从并服务于经济管理体制，二者互相适应，才能互相促进，巩固经济基础，强化上层建筑。如果经济管理体制改了，行政管理体制依旧，就要延缓甚至妨碍经济的发展，影响改革的进程、民族的兴旺和国家政权的巩固，直到影响国际地位的提高。因此，我们是从经济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和行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出发，探讨公共行政与国际接轨这一命题。

我国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决心改变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我国经济改革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与国外市场经济体制接轨。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已搞了几百年，积累了许多合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合乎市场规律的成功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科学成果，就能加快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少走弯路，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也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改革，既要坚持社会主义行政管理行之有效的制度，又要采用国际上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必要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符合经济国际化的潮流。因此，公共行政与国际接轨是大势所趋，改革所求，我们应从国情出发，按需接轨，主要是与现代行政观念、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接轨。

我国改革开放 17 年来，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行政管理新观念，比如民主、平等、竞争、择优、效率及功绩制、法制管理原则等，为实现我国行政管理科学化、现代化、法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仅仅是开始，还

需继续学习和借鉴国外一些科学管理思想，从中吸收有益的成份。如西方提倡的行政成本论、政府掌舵论、市长经理论、行政经营论、伦理企业（政府）等，这些理论观点告诉人们，行政管理要计算成本，严格按预算收支，不能“实报实销”。有社会、经济效益就干，相反就不干，政府管理社会是担任舵手指航，而不是充当船夫划船；市长应懂经营管理，善于聚财、理财、用财，把政府看成是一个企业，只不过不是经济企业而是伦理企业。这些观点虽有偏颇，但在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中起过积极作用，有其合理的、进步的因素。如果我们认真借鉴引用这些观念，改变现在政府重管理轻经营，重控制轻服务的状况，增强各级政府领导的责任感，正确运用职权，对行政经费和各项投资精打细算，就可以大大避免或减少财政超支，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和效能。

国际惯例是指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中，因长期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一些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它包括多数国家或地区在彼此实施中的特定事项和互相交往过程中的一些先例，经过长期反复使用后，逐渐形成的某种通用的习惯做法，共同承认其约束力，并在国际上普遍流行，从而对促进各国政府之间的往来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制约作用。国际惯例属于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不同于国际公约或法规，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事人双方在进行某项活动中明确规定适用某项惯例或规则，才受该项惯例或规则的约束，而国际条约或法规对缔约国具有明显的法律约束力。国际惯例如各国之间协议的格式、签署和交换程序，外交的礼仪、言辞和行为规范，政府谈判的准备工作、采取的形式、进行的方式、结果的公布及实施等，除公共行政活动要遵循国际惯例以外，还要遵循各行政职能部门之间交往的国际惯例，如在国际经贸活动

中有国际法协会的《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美国九大商业团体的《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正本》、国际商会的《1980年贸易条件解释国际规则》对14种国际贸易条件都进行了解释，这些国际惯例影响较大，各国必须照办。

所谓国际标准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有着共同遵守的国际标准，包括行政道德标准、行政行为标准、行政决策优化标准、行政效率标准、行政功能评价标准等。这些标准虽因国情不同有些差异，但也不乏其共同性，比如各国对公务员的考核都推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考核内容包括德、能、勤、绩，方法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考核结果分等次作为公务员奖惩、升降的依据。因此，在行政管理中积极推行合乎科学管理的国际标准，有助于行政管理现代化和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

## 二、我国行政法制、行政体制和行政机制 一部分应与国际接轨

公共行政与国际接轨既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又是深入扩大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经过10多年的改革，我国行政法制、行政体制和行政机制已有一部分与国际接轨。

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管理的根本标志，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法治为主导的社会，与国际上现代法制观念、规范、程序接轨。

我们的法制观已从强调义务本位转为权利本位。过去在法规中，较多地强调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对上级的忠诚，对领导的服从，人们误认为法制只是约束自己行为的东西，而不是维

护自身权益的护身符。改革以来，我国许多法律在强调公民的义务的同时又强调公民的权利，《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规定公务员义务与权利对等，公务员“非因法定事由和非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行政处分”，依照规定享有“辞职”权等，公务员在法定范围内享受价值选择，行为自由和获得应有的利益，用法律约束自己又保护自己，树立法律至上、依法办事的观念。

从法制内容看，我们继承和吸收反映社会管理及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外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使我国的法制与世界法律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法制规范的重点由规范民众的社会行为转向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和市场竞争规则上，过去政府干预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充当全能角色，常用政策治国取代法律治国，缺乏切实保护人民控制政府行为和自身利益的法律规范。改革后，我国颁布的《行政诉讼法》、《企业法》和《国家赔偿法》等，规范政府干什么，不干什么，怎么干是对的，怎么干是错的及其法律责任，规定政府有所为又有所不为。通过法律规范政府行为趋向，政府充当公共利益服务员，改革发展指导员，国民经济监测员，市场竞争裁判员，资源开发护理员、财政金融调控员，精神文明导航员，社会秩序警卫员，从而保障政府依法行政，市场公平竞争。

在执法程序上，我国正在由非合理化向合理化转变。过去由于行政与司法不分，在执行中缺乏应有的程序，当事人基本上没有对法律援引和解释的权利，招供有时不是认定的过程而是逼供信的过程，我国为了从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过渡，保证各项法制协调运行，正在抓紧法规的配套建设，建立价值中立、操作性强的程序，司法官审判案件要受证据限制，要经过法庭与律师的论辩，这样既可防止冤假错案重演，保护敢于扶

正压邪的人，又可限制官员专横，防止执法犯法事件再现，以维护法律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人事体制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199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标志我国人事管理从国情出发，同国际接轨。在人事管理体制上，我国融合品位与职位分类两种体制的优点，兼容并蓄，同时又从我国长期推行品位分类制度出发，在职位分类中分15级，反映我国职位分类是在品位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公务员考试主管机构及其职责既坚持国际独立、统一的原则，又考虑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实情，防止用人与治事脱节，规定公务员录用考试工作分别由国务院人事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管理。在工资制度中，我们既采取了国际通用的平衡比较原则、物价补偿原则、试用工资原则等，又从我国实情出发，实行按劳分配、定期增资等原则，确定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形式是职级工资制和地区津贴制。我国还采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公务员实行自愿提前退休与强制退休两种方式和养老保险“多元化”的方针，但在退休的年龄、条件和待遇上又体现我国的特点。凡此等等，都说明我国人事制度改革既保持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又与现代人事管理的体制、原则、方法接轨，符合全世界人事管理发展的大趋势。

为了适应多种经济成份发展的要求，我国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既借鉴西方“先纳税后保障”的做法，做到“权力和义务对等”，变保障主体一元化为多元化，走以自我保障为主，国家援助、集体扶持、群众互助结合的路子。同时又从我国国情出发，既不走发达国家高福利的路子，也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只保少数人，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不稳定的局面，坚持保障水平和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地区之间有



别，社会保险与事业保险分开，依法统一管理社会保障机构等原则。在城市，打破了社会保障单位化的局面，改革社会保障费用全部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的局面，建立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保障费用的新机制。在农村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为目标，以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为依托，根据不同的地区和类别，建立不同的保障机制。对覆盖面大的养老、合作医疗等保障费用，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必要的扶持。在贫困地区以“救助型”为主，强化家庭保障，适当发展福利事业。在解决温饱的地区以“福利型”为主，积极兴办敬老院和乡镇企业，开展养老保险。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以“保险型”为主，加快乡镇经济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普遍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我国这种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赏，对维护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各种行政机制改革都要依靠静态和动态机制的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实施。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机制与国际接轨，主要是指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逐步向国际规则靠拢的行政管理结构、职能及其运行的范围、准则和方式等。1994年以来，我国对几大体制进行改革，重点就是建立健全行政运行机制，以便与国际通行。

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建立中央银行体系，实行政策银行与专业银行分开，成立商业银行和国家发展银行。

金融业是国民经济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关键行业，我国改革金融体制，对金融服务贸易采取双向交流的形式，既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适度发展，又走出国门发展金融服务业，先后

颁布《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和《银行法》等，既坚定不移又有限度地推行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原则，明确了有关外汇资产负债的 12 个比例，基本上形成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体系，其核心内容有：一是参照“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 80% 风险资产与资本比率来制定我国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风险资本率。把资本与风险资产挂钩，从资产的质量上制约金融机构风险资产。同时又规定了资本与资产的比率，从资产规模上制约金融机构无限扩大其信用。二是明确资产素质管理的重要性。资产素质管理是目前各国中央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提高外汇资产素质，加速外汇资金的周转和使用效益是金融管理当局和金融机构的共同目标。三是对金融机构外汇资产的流动性进行限定。国际上一般要求金融机构有 20%—30% 的可随时变现的流动资产，银行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是生存和正常运作的前提。这些规定标志着我国外汇业务管理模式正向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靠拢。

借鉴国际经验和国际财税制度的一般原则是我国财税制度发展的内容之一。我国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实行新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执行资本保全原则和会计稳健原则，调整了成本、费用开支范围，推行制造成本法、缩短折旧年限以及允许企业实行加速折旧方法，长期负债利息进入成本等。这样规范企业财务会计行为，增强了企业的自主财力，使企业眼睛向内，降低生产成本而获利，有利于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我国的财务会计核算口径和核算资料符合国际惯例，使中国企业的成本或盈利水平在国际上具有可比性。我国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可概括为：“公平税负，强化征管，规范税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重点是推行分税制，

统一税种、税率，中央与地方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确定合理化比例分征、分税。分权、分税、分征机构是税制改革的核心，改革中央与地方的税收体系和建立以增值税为主的产品税、营业税三税并立、多层次调节的新的流转税体系，这样增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顺应市场体制的客观要求，符合国际税收改革的潮流。

我国对外经贸体制按照国际及我国对外的承诺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贸企业承担的无偿和有偿的外汇上缴任务。具体措施是统一管理全国对外经贸，统一承担国际义务，完善进出口宏观调控机制和出口退税体制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外贸企业，放开进出口商品经营，取消指令性计划。

我国还对外经贸体制进行改革，主要是逐步减弱计划、许可证、进出口审查等行政手段，取消 500 多种许可证商品，取消 20% 的无偿上交外汇，减少国家计划的平价外汇，调整现行减免税政策，降低关税，下调人民币官方汇价，促进出口增长。我国政府为了帮助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还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实施认证制度，对产品质量进行评价、监督和管理，国家技术监督局根据国内外有关规定于 1994 年 6 月提出我国全面推行合格评定（认证）制度的几条原则：实行统一管理，充分发挥各部门和地方的积极性，与国际接轨，引入竞争机制，认证机构以其公正性、科学性及其有效性提供优质服务，取得信誉。

我国不仅在体制改革上重视与国际接轨，而且在具体制度改革上也是如此。

随着全球贸易战、科技战激烈展开，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合作的重要基础。我国用了几年的时间走

完了不少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初步建立了中国与国际版权保护的法律体系。1983年3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85年4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7年11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1年6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同年6月4日实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1994年7月5日公布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等等。从立法上与国际版权保护接轨，采取世界上多数国家所实施的知识产权保护规范。比如，我国修改专利法，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对药品、化学物质的产品实施专利保护，发明专利保护期限由过去1年延至20年，增加专利人的进口权，以专利授权后的行政撤销代替授权前的异议程序等。修正商标法，保护服务商标、集体商标和驰名商标，确认其工业产权，强化保护力度，缩短商标注册流程，实行商标代理制，对商标侵权和假冒商标注册的行为加重行政的处罚和刑罚。

我国为了和大多数国家共同维护知识产权，于1980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4年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85年成立版权局，1990年参与缔结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92年10月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1995年7月我国积极支持在日内瓦举行的知识产权会议统一全球商标制度的协议。

综上所述，我国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在一些重要的领域里，已接通国际轨道，为再造中国辉煌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 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科学和民主<sup>\*</sup>

——20 世纪使人类摆脱人身依附、  
思想依附的三大瑰宝

蔡德诚

## “开题”前言

市场经济在 20 世纪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的民主化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从深层次分析，可以使我们觉醒，倘若市场、科学、民主不能三位一体地协同发展，良性互动，将使市场运作不透明，科学屈尊于权力，“民主”附庸于特权；这种情况下，纵把市场、科学、民主喊得震天响，喊得再有“亚洲龙虎模式”特色、“东亚文明”特色，最终仍不免把自己引入深重的危机中去。实践告诉我们，

<sup>\*</sup> 本文首次发表时题为《透明的市场、刚直的科学、平权的民主》。

时间和历史总是客观、公正的，它们只遵循规律，从不迁就任何“一厢情愿”。

## 一场世纪性的大实践大对比和大选择

20 世纪是人类发展史应该大书特书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人类社会冲突之烈，变化之快，发展之迅疾，前所未有，令人目不暇接，更常使人“思难适变”。有多少事，令人百思不解，又有多少事使人豁然开朗。对一切以思索、求索人间真谛为人生最大乐事的人来说，能生活在这个百年之间，真可谓是万世难得的幸运际遇。

20 世纪种种大变化、大发展中，最令人叹为观止、令人难以逆料的，莫过于人类以空前的规模、空前的代价，所进行的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两种社会体制、两类社会形态的社会大实践、大对比，和最后亿万人民毅然决然的再选择。这种大实践、大对比、大选择所展现出来的最直截了当的事实和结果是：

以马克思理想作为国家目标的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民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大半个世纪的奋斗、磨难，乃至种种牺牲后，猛然发现，不论从哪个方面，哪个标准看，几十年下来，在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实际上都偏离了甚至远离了马克思原本的理想、原本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近一个世纪来，那些十多个发达国家、地区的近十亿人民在许多方面却在实际上大大趋向、大大接近了马克思的理想目标。

那么，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理想目标”具体是指什么

呢？

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他倾己一生，做了那么多的研究、思考和求索，写了那么多的宏篇巨著，但他对人类社会的理想却是极其鲜明、极其简洁的。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可以归纳为三个目标和三个检验标准。

这三个目标是：

- 一、生产力极大的发展、物质极大的丰富；
- 二、在上述基础上的社会普遍公平、公正；
- 三、在社会每一个成员个性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全人类的解放。

这三个检验标准是：

- 看，是否消灭了工农差别；
- 是否消灭了城乡差别；
- 是否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我相信，对上述三大目标和三大标准的归纳和表述，是任何一个熟悉、了解、敬仰马克思理论和理想的人都会完全赞同，不存疑义的。

在 20 世纪的大实践、大对比后，按照上述三大目标、三大标准来衡量来检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恰恰是那些只把马克思当作学者、思想家来尊敬的北美、北欧、西欧，大洋洲乃至日本等国家及他们的亿万人民，倒是大大趋向、大大接近了上述三大目标和三大标准。我想，一切尊重实际，尊重现实，尊重科学，尊重理性的人，都会心服口服地承认和面对这个世界现实的。难怪我们一些一生诚挚追求理想社会的老革命、老同志、老领导，在北欧国家深入城乡，对普通居民家庭作随机调查访问后，不禁怅然长叹：看来人家是真正接近了

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我们这一辈子好像是白干了！

但是，任何理想、理性的执着追求者，是不会止于叹息的。叹息之后必然是不可遏制的深思——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怎么会是这样的相反发展的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大课题。我想，这可能是 20 世纪留给我们的要给予最大思考的大问题之一。我想，这也正是促成近二三十年来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民一场大改革、大选择的最基本的动因之一。

以下，谨奉献我的一些思考，并诚恳地向一切真诚的智者、识者请教。

我以为，在辩思、辩识上述巨大历史反差这个不争的事实时，我们首先应该摒弃多年来那种“唯我独革”、“唯我先进”、“唯我是社会主义”以及“风景这边独好”等一切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先验说法。因为很显然，二战后的 50 年，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物质文明，经济基础达到最高水平的阶段。而推动这种发展的主力和主体，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发达社会。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原理，我们只能得出结论：由最先进、最高水平的经济基础所衍生出、所折射出的上层建筑也应该是最先进、最高水平的；最先进、最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基础上衍生出、折射出的精神文明，也应该是最先进、最高水平的，至少从社会的主流来说是如此。我想，上述结论对任何一个讲科学，讲理性，讲求实，讲唯物辩证的人来讲，都会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诚诚恳恳承认的。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没有任何基础、任何可能可以自夸自诩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精神层面如何如何优于别人，胜过别人。在历史面前，在现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认认真真、诚诚恳恳思考问题，研究问



题。我们必须深切地认识到，人家趋近、接近马克思的理想目标，从根本上说，那也是这些国家、这些地区的亿万人民大众几十年、近百年劳动创造的结果，是他们努力捍卫自身权利，努力理性调节、理性处理种种社会矛盾和种种发展障碍的结果，是科学界、知识界各方专家学者有效介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结果。实际上那也是人家近十亿人民运用自身不断扩大的权利，不断影响不断左右当权当局，使之尊重各方人民意愿，尊重各界人民利益的结果。应该说，这一切对真正持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历史的动力”这一科学史观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毫不费解的。

## 历史和现实的真正启示——一切要以人为核心

马克思的三大目标，说到底其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人间普遍的需求和幸福，是为了发挥一切人的潜能潜力，是为了一切人的真正解放。“为了人，为了全社会的一切人”，始终是马克思三大目标，三大标准的核心魂魄。

20世纪大规模社会实践的结果，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当初的三大目标、三大标准是科学的，经过大规模社会实践检验后证明，这个伟大的科学预见正越来越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他关于社会主义因素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涌现的预言，也是一种深邃的科学预见。他确实无愧为一个伟大的经济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勿庸讳言，几十年来，不论在什么地区，什么国度，不论以什么形式，什么口号，以什么为藉口搞“阶级斗争为纲”

的，其要害就在于——不是为人，更不是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实质上却是为了“权”，为了某些人的“权位”，甚至要以“某一个人划线”，为了一个人的“权位”，并且要求人人都要成为“驯服的工具”。即使这种斗争一次次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了祸害了百万、千万乃至亿万人，仍然要“千万不要忘记”，仍然要“天天讲，月月讲”，要“七八年搞一次”。不言而喻，这种“长达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从事情的本原上，就背离了马克思的三大目标、三大标准。因此，历史的后果也是铁面无情的。

经过大选择、大改革后的再实践、再对比证明，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则是符合马克思的三大目标、三大标准的。近 20 年的历史鲜明地展现了这个论断。

## 个性的发展 必须以摆脱人身的依附和 思想的依附为前提

如上所述，解决人类社会种种难题必须“以人为核心”——即要始终以每一个社会人的实际需求、普遍权益为核心。一切应该以此“划线”，为着眼点，为落脚点。很显然，上述三大目标中，马克思讲的“每一个社会成员个性的全面发展”，不是孤立的，割裂的，不是指在生产力发展后，物质丰富后才讲个性发展的，也不是在社会公正公平后才求个性发展

的，而是三者互为条件，同步发展，交错促进的。

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成员普遍的个性自由发展，对三大理想目标的实现，更具有某种带动性、促进性的决定性作用。

何以作这样的判断？对个性的发展予以尊重，予以自由，果真会有如此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 20 世纪普遍涌现的几个对比现象中得出这个肯定的答案。

## 摆脱人身依附 是解放一切生产力的首要核心要素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但后者却释放和创造了与前二者有天壤之别的空前生产力。其根本的缘由，乃是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使人们逐步地摆脱了人身的依附，首先是摆脱了人身的生存依附。作为一个工人，不论是工业工，或是农业工，他当然要受雇主的选择、雇佣，也时时可能被雇主解雇、“炒鱿鱼”。但这种雇佣、被解雇关系越来越演化为具有双向选择性，劳动者也变得可以选择老板，选择雇佣地区、部门，选择岗位。不合心，不满意也可以主动“炒”老板的“鱿鱼”。靠自身的劳动找生活，不依附老板，不依附土地，不依附社会帮派势力，凭自己的劳动技能和本领，“东方不亮西方亮”。随着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这种双向自由选择也导致了劳动者个人经济地位、经济基础的普遍确立。一旦有了可以自主自立的经济地位、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摆脱对

他人的人身依附也就有了实际的保障。一个摆脱了人身依附的人，他的劳动首先是自己，劳动的创造首先归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必然会主动、自发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如果社会上每一个劳动者普遍都获得了这种人身独立性、自立性和相应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社会生产力当然会像裂变反应、连锁反应一样爆发出来。20世纪人类的大实践表明，正是那种可自主选择的劳动，那种可公平竞争的机会，以及公开、透明的市场运作机制，对社会全民的经济独立，人身独立起着根本性的保障作用。由此可见，可以保障个性独立，保障个性发展，可以导致个人能量主动释放的个人经济基础和市场机制，恰是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明的最重要的基石。经过20世纪大实践，大对比，人类社会重新、普遍地选择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其真谛奥妙也恰在于此。因此，我们在20世纪末叶，在小平同志倡导下毅然决然选择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确实是明智及时的，这一划时代的选择，真可谓是在经历了多少苦难和挫折之后，不幸中之大幸。

## 摆脱思想依附 是促成现代科学技术 现代生产力迅疾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20世纪里，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能把科学技术、把现代生产力推动、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为什么他们总能囊括诺贝尔科学奖的绝大多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他们除了普遍实现了摆脱人身依附外，还很早就使

社会广大公众解脱、摆脱了思想、精神的依附！（这里当然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依附关系，非指宗教信仰上的某种精神依附）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人类从神权、王权下的一次大解放。这次解放对冲破种种人身依附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文艺复兴实际上也是人们从思想、精神上挣脱依附的一次历史性大启蒙。随后，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商品经济社会迅疾兴起。到 19 世纪末，在普遍解脱了人身依附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感到有需要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精神独立，开始日益感到进一步挣脱、解脱思想依附的迫切需要，思想独立、思想自由的诉求变得日益迫切。由此，以维护个人思想自由表达，个人意志自由选择为核心内容的“人权”要求变得日益高涨起来。20 世纪的社会实践表明，“人权”概念和“人权”诉求，是人身解脱依附之后，进而获得思想解脱依附的基石，也是普遍实现“民是主，官是仆，主可择仆，主可制仆，主可逐仆”的民主体制的法律基础，也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具普遍意义、普遍价值的最高准则之一。最近，我国政府正式确认了这个准则，并准备逐步签署有关的全部国际公约。这无疑又是一个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明智之举，值得高兴，值得庆幸。至此，全国上下，全国各界都有义务、有权利切实推动之，努力贯彻之。

这里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 20 世纪里，上述以维护思想自由，解脱思想依附为特征的“人权”运动，也大大触发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大发扬，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大大促进了广大公众民主意识、民主要求的广泛觉醒。这实际上也 20 世纪人类进步史册中最辉煌的一页！

## 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是解脱思想依附， 激发人类创造创新潜力的力量源泉

提到科学，提到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时下已成为一种时髦，有时调子唱得“高得不能再高”了。但 20 世纪人类实践馈赠给我们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很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科学，作为人类一代代探知外在客观、探知各种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作为一个后人不断补充、不断修正乃至推翻前人认识的不断进取的过程，在 20 世纪得到了空前的推动和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悟性和理性。依据我个人的体会和感悟，我认为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具体构成，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大要素，即：

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

以上五大要素，实际上是任何一个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中“须臾不可离”，“缺一不可”，“缺一难为继”的基本要素，基本准则。相信我国一切严肃、严谨的自然科学家都会有此切身体验的。我也相信，我们的许多真正具有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社会科学家，在这几点上，多年来更是有拂之不去的难言之隐、切肤之痛的。真正掌握并身体力行这五条要素的人，或者说，真正获得了这五条权利的人，才算是真正解脱了

思想依附、精神依附的人。必须看到，人，人类，作为高级动物，高级生灵，其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会思维，会理性思维，会通过语言表达思维，通过行动实践思维。而这种理性思维中，又以创造性思维、突破性思维、发展性思维为人类的最大优势所在。人类自身，人类社会恰恰是依靠了这种创造性、突破性、发展性思维才达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水平的。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打击、压制、限制这种思维，实际上就是打击、压制、限制了人类的——人人都普遍具有的——这个最大优势。其结果，只会造成破坏性、迫害性的后果，从而大大阻碍了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智睿、理性的发展。20世纪人类社会大实践、大对比，最后促成重新大选择所反映出的最深刻最实质性的焦点也恰在于此。人类社会中一切落伍的地区、落伍的民族、落伍的国家、落伍的领域，莫不是有意无意地限制、压制了人的自由思想，造成广泛的思想依附的结果。因此，以科学的思想启示人，以科学的精神激励人，以“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这五大科学要素武装人，从根本上解脱、解除任何思想依附，是20世纪留给人类最为珍贵的瑰宝之一。当今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之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他们的诺贝尔奖人才之辈出，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悟到我们的不足，悟到我们长期来的病根所在。否则，我们即便有十几亿人口的“数量优势”，但十几亿人中人人都具有的最大的潜在优势——即创造性、突破性、发展性思维，仍会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被置于受压受限的状态，那么继续落伍，更加落伍，这是必然的。20世纪的实践证明，由此导致的历史的裁决是不由分说的。

## 民主 是人身依附 思想依附解脱之后 必然的历史性诉求

广大社会公众一旦摆脱了人身依附、思想依附，不仅经济自立，进而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由此爆发出的生产力，爆发出现代科技创造性、创新性潜力必然导致社会的巨变。在这种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随之而来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发展中，普遍的民主诉求，包括知情权、参政权、选举权、监督权、意愿表达权等诉求的高涨，以及要求相应的法律化、制度化保障，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了。

20 世纪的实践也充分表明，为了保障所有人的人身、思想、意志的自由和相应的权益、地位，就必须随时防止和破解一切利益、权力垄断集团的形成和存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不论在什么领域，在什么范围，一旦形成了某种盘根错节的利益性、权力性的垄断集团、世袭集团，那么这类集团必定是会侵害社会广大公众利益、公众权益的。因为任何这种集团，在任何时候，它们首先要捍卫的是集团自身、集团内部的利益，特别是当它们与广大公众出现利害、权益冲突时，则更是如此。

20 世纪世界性的大规模的民主实践也证明，民主有两个层面，两个核心内涵：一个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思想、意志、权益以及意愿选择的公开表达、公开实践的权利；一个是各种个人权益之间、各阶层利益之间的相互理性妥协、理性谐同、理性互动，亦即一种相互宽容、相互兼融、相互谦纳的良性社会



互动。20 世纪的实践告诉我们，民主既是人人手中都应拥有的保障个人意志，保障个人权益的“权利盾牌”，民主又是保障不得侵犯他人，保障尊重所有人权益的一种理性制度安排和法律安排。因此，民主决不是“聚众闹事”，不是“大轰大嗡”，不是“势众压人”，更不是会使“天下大乱”的“洪水猛兽”。一句话，民主对广大公众，对一切讲科学，讲理性，讲良知，讲社会公平公正的人，是十分可亲、十分可爱的，而决不是可怕的。

## 题末寄语

“市场”、“科学”、“民主”，是 20 世纪人类社会大实践、大对比、大选择后，留给人们的并得到全球公认、共择的人类瑰宝。也是人类由 20 世纪迈向 21 世纪更高文明发展的前进基石。也更是我国从“20 世纪此岸”迈向“21 世纪彼岸”的“过河石”。让我们继续邓小平同志开创的现代化事业，迈开新的历史性步伐，看准这几块石头，摸准这几块石头，“过河”，“过河”，坚决地“过河”！历史已不给我们任何退路了，只有坚决地、义无反顾地摸准“市场”、“科学”、“民主”的石头过河，过河！中华民族才会有真正的光明前途！

一切善良的、理智的人们，一切禀赋着历史良知的人们，让我们共同怀着宽容、理解，怀着兼融、谦纳的共识和良性互动，共同携手，上下配合，有准备、有部署、有步骤地跨出历史的新步伐，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去迎接中华民族更光辉的前程！

# 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历史审视

杨龙芳

世界历史正处于转变之际，这个时刻是 20 世纪向 21 世纪转换，也是人类从第二个千年向第三个千年过渡。在百年之交和千年之交的双重交汇点上，全球化作为“百年问题”或“千年问题”的重要论题，是世界各国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是中国理论界最热门的学术研究热点。本文以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为主题，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全球化概念的学术规范化；第二，全球化学术思潮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第三，全球化学术思潮与美国国家全球意识的关系。

## 一、全球化概念的学术规范化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开始在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得到普遍使用，并逐渐规范化。到 80

年代，全球化概念演变成一个概括未来时代特征的基本概念。

英语中的“globalization”，意即“全球化”或“全球性”，它是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的。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俄罗斯著名的全球性问题专家阿·恩·丘马科夫经过考证后指出，在“词源学上，‘全球性的’这一术语源自拉丁语‘地球’。”<sup>[1]</sup>

到本世纪 60 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术语开始在重建的社会科学中得到普遍使用。

在国际经济学中，全球化概念是从“一体化”转变而来的。早在 50 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rgration）理论。1951 年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 Tinbergen）出版《论经济政策》一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对世界经济一体化问题作了初步分析。<sup>[2]</sup>1954 年丁伯根又出版了《国际经济一体化》，这一著作进一步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作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理论分析。丁伯根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是取消经济交流壁垒的“消极统一”，而是在保证参加国福利和利益增长的高起点上谋求经济政策协调的“积极统一”，进而达到政治上的统一，形成和平维持主权国家间关系的结构。丁伯根说，“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障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清除，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sup>[3]</sup>1957 年美国经济学家林德特（P. Lindert）和金德尔伯格（C. Kindleberger）出版《国际经济学》一书，他俩认为，经济一体化“是指宏观经济基础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它是“通过共同的商

品市场，共同的生产要素，或两者的结合，以达到价格的均等”。<sup>[4]</sup>巴拉萨（B. 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更广泛的解释，认为“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sup>[5]</sup>

70年代的国际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了“经济一体化”的概念，特别是通过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更加突出了经济的全球化特征。美国经济学家库珀（R. Cooper）在1968年明确指出：各国经济以“物品”交流的增大为媒介而连结得更加紧密，以此大大加强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经济因素的连带性，各国不可能独立地通过宏观经济调节实现各国的经济目标。<sup>[6]</sup>库珀于1972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题为《贸易政策即外交政策》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库珀的研究结论是战后世界体制经济和政治相分离的独立机制和制度在70年代又双轨交叉了。<sup>[7]</sup>英国的经济学家斯特兰奇（Strange）在1972年的《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杂志发表《1971年美元危机》的文章，阐述了同库珀相似的结论。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逊（H. G. Johnson）在谈到跨国公司时指出：“我们已超越对外贸易走向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公司的基本决策是把整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看作是它们的活动范围。”<sup>[8]</sup>国内的生产活动完全与全球战略结为一体，并服从于全球战略。跨国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动，商品交易和市场争夺，把各个国家连结起来，冲击着国家的主权。正如美国学者惠特曼（M. V. N. Whitman）所说：“就对民族经济主权具有巨大威胁和在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方面来说，没有一种经济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sup>[9]</sup>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罗斯库兰斯（Rosecrance）在1986年出版的《贸易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提

出“领土体系”向“贸易体系”转换的理论。国际体系以产业革命为界限从原有的以领土、军事为主体的领土体系转向以贸易经济为主体的贸易体系。在贸易体系中，国家是处在“内压”和“外压”相互作用的依存关系之中，国家是“调整国家”（Mediativestate），对内起“买办”的作用，对外起“翻译”作用。<sup>[10]</sup>

到了 80 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体制崩溃。在英国《经济学杂志》创刊 100 周年纪念周刊上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梅森大学教授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撰文指出：“20 世纪最大意识形态之战的结束将使今后的经济学更富有成果。预期在后社会主义世纪（the post-socialist century）里，两极式的辩论会减少，规范化的讨论会恢复起来。也就是说，少一点坚持‘客观性’，多一点建议。”布坎南正确地指出了国际经济学概念规范化是一个大趋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格迪·什巴格亚蒂（Jagdish Bhagwati）指出正在发展中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要求经济学放弃在封闭经济假设下建立模型的方法。“将来商品、资本和劳动的国际流动将成为经济研究中的前沿性核心问题。”<sup>[11]</sup>这就预示着国际经济学中“无国界”的一体化概念会以新的形式而发展。

到了 90 年代，国际经济学家们都注意到全球市场，埃沃里特·M. 艾尔里奇（Everett M. Ehrlich）认为，“全球市场——这一无国界的经济——就在我们身边，并且是一个在我们周围的信息革命现象。但对于企业、资本市场和政府而言，这些压力导致的一体化程度各不相同。而且，这一变形始料未及的方面正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的方式。简而言之，划时代的信息技术已‘拆散’或‘非一体化’了我们的企业，使它们能作全球性活动，而不必达到全球性规模。”<sup>[12]</sup>

国际政治学中的“全球化”概念是从“相互依存”概念演化而来的。传统的国际政治学认为国际政治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管理体制体现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军事协调和军事竞赛。1959年丁·赫茨在一篇文章中预言领土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政治单位会衰落，因为国家不可能保护其国民免遭核武器的打击。国家一旦不能履行保护国民的社会职责，它就必然成为过时的东西。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有“国家科学权威”之称，他在1966年也断言：“主权之船已有漏洞”。<sup>[13]</sup>这个断言是发向传统国际政治学的挑战信号。国际政治学开始用“相互依存”取代“主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O·基欧汉(R.O. Keohane)和约瑟夫·S·奈(J.S. Nye)在1977年出版《权力与相互依存》，这部著作集相互依存理论之大成。他们认为相互依存的最一般定义是彼此相互依赖，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存是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中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情形，这些相互影响往往是国际交往所产生的结果，例如货币、商品、人员以及信息等跨国界的交流。相互依存有两个方面：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涉及在某种政策框架内所作出反应的程度，即某国发生变化导致另一国有代价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代价有多大；脆弱性被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所强加的代价而受损失的程度，甚至包括政策变化后的情况。<sup>[14]</sup>敏感性和脆弱性都会有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性质。罗伯特·O·基欧汉和约瑟夫·S·奈所阐述的“相互依存”的含义，在国际政治学中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

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sup>[15]</sup>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G. Modelski)说得更明白：“整个地球上日益增多的问题再不能靠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民族中心主义概念方法加以解决，这对于所有社会科学都是如此，而且所有社会科学都要改变民族中心主义的方向，但是最迫切需要这种改变的莫过于在政治科学领域，因为政治科学基本上仍然是国家的科学，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仍未摆脱梅特湿和俾斯麦的传统外交常规的影响。”<sup>[16]</sup>两年后，莫德尔斯基在《世界政治学原理》中进一步预言说：“当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正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政治共同体’的性质。的确，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最好的共同体’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sup>[17]</sup>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丁·罗西瑙(J. Rosenau)在1990年出版的《世界政治学中的动乱》中指出，喷气飞机、计算机、地球卫星以及许多其他的发明和技术巨大地缩短了地理的和社会的距离，比以往更迅速和安全地跨越空间和时间传输着人员、商品和观念，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事务发生的规模。“一句话，正是技术促进了地区、民族和国际共同性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性空前的。”罗西瑙还指出，这种相互依赖性意味着民族国家不再是世界事务的主要单元，它必须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共享世界舞台。

全球化的概念除了通过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进行规范外，国际文化学对它的规范化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国际文化学中的全球化概念是同关于“世界文化”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并在80年代晚期作为一个批评概念而出现。<sup>[18]</sup>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马歇

尔·麦克卢汉 (McLuhan) 在 1960 年出版的《传播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全球村”概念是这种观点的反映。麦克卢汉认为,地球村犹如一个村庄,它既统一又存在矛盾,并经历过种种误解和敌对。世界各国文化在“全球化市场”的基础上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国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上,也表现在媒介技术上。全球文化不是世界各国文化的大杂烩,而是正在趋向并逐渐形成世界统一化的“国际文化”或“地球文化”。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地球文化”理论的杰出代表、文化人类学专家 M. 米顿于 1978 年出版《地球时代的文化理论——文化与承诺》。米顿把人类文化的历史分成三种形态:过去取向型、现代取向型和未来取向型。地球文化是未来取向型的文化,它是以年轻人为主导的文化,通过文化方面的国际交流,全球青年的观念与意识也将不断国际化和地球化。到了 9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罗兰·罗伯逊 (Roland Robertson) 进一步发展了国际文化中全球化概念。世界各国文化既保留自己独有的特性,又是全球意识支配的世界文化单元。换句话说,全球化社会首先是一个多元社会化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sup>[19]</sup>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概念的学术规范化过程不是某一社会科学单纯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综合意识影响的结果。全球化作为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它强调本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正如英国学者 J. 米特尔曼在《全球化的挑战:在边际上的生存》一文中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sup>[20]</sup>



## 二、全球化学术思潮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作为当今重要的理论思潮，同 7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为全球化学术思潮的指导思想是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趋同为核心的国际社会发展理论和以人权为中心的新人道主义观。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Convergence）是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Sorokin）1960 年在《美国与苏联相互趋同为混合的社会类型》一文中第一次使用的概念，并作了“最有影响的陈述”。1964 年索罗金出版其代表作《当代的基本趋势》，提出“趋同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社会主义有一些独特的长处和优越性；第二个原则是资本主义有其难以避免的一些弱点和劣势，第三个原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会取优避短，合二为一，演化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文化类型。第三个原则是“趋同三原则”的核心。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发展了索罗金的思想。1961 年丁伯根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章《共产主义经济与自由经济是样板式趋同吗？》，借用生物学中的“趋同”用语，提出了“富有想像力的、创新的”趋同理论。生物学中的“趋同”表示不同的物体由于适应相同环境要求而显示出近似的形式，功能和行为方式。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也存在着向对方发展的相互趋同现象。丁伯根后来把福利经济学看成是“普遍而有用的‘分析工具’”，对趋同作了新的分析。1964 年丁伯根同社会民主党人 H. 林耐曼和丁·P. 普朗克合作，发表了名为《东西方经济制度的趋同》，集“趋同论”思

想之大成。丁伯根在 80 年代中期出版《生产、收入和福利——寻求最优社会秩序》一书，虽放弃了他从前的假设，但仍全心关注趋同论。他声称“对两种社会制度的最优选择含有趋同的趋势”；两种社会秩序正在趋同’。<sup>[21]</sup>

趋同论在三个方面对全球化学术思潮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假设国际经济将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索罗金早在 1960 年就指出“工业社会基本类型的形貌，很显然是这些社会工业化的各种不同的历史经验所选择出来的因素之混合物……在晚近的例子中，在北美、苏联、日本等国，我们可以发现‘齐一化’的趋势。”<sup>[22]</sup>四年后，索罗金又进一步论述了国际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方向。他说：“正在产生的社会和变化的主要形式，也许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可以称之为一体化的特殊形式，这一形式将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形式。”<sup>[23]</sup>英国肯特大学教授库马出版《社会的巨变——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有两种形式：刚性趋同形式和柔性趋同形式。刚性形式指“所有社会皆注定是要变成工业化的——而工业化的世界性趋同过程将导致一种划一性的工业类型”，它是命定的和必然的。而柔性形式指“一旦工业化过程在特定社会里进行之后，它所发展出来的结构形貌，势必将类似于其他一切的工业化状态”，<sup>[24]</sup>它是近似的和趋进的。美国社会学家克拉克·科尔（Clark Cole）在同他人合写的著作《工业主义与工业人》一文中也说道：在我们的时代，“是工业化骄傲地在地球上踱步，因为它正在改造旧的传统社会的几乎一切情况，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即全面工业化的时代，东方和西方都在走向这个时代”。<sup>[25]</sup>

第二，假设两种不同制度国家存在相同的国家发展方针。

趋同论往往从制度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相似性和协调性。丹尼斯·贝尔指出“趋同的思想基于这样的前提：确立社会性质的只有一个主要的体制”〔26〕。根据这个前提，趋同论认为计划和市场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共有的特征。但早期新自由主义和晚期新自由主义在这点上是有区别的。前者重在强调计划和市场“共存”关系和计划的“重心”作用，而后者重在强调市场的“基础”地位和“重心”作用。早期新自由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是加尔布雷斯，他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两部分构成。计划体系是有组织的大企业控制经济，实行“计划生产”和“计划销售”，并采用“操纵价格”。加尔布雷斯还认为“计划必须取代市场”，“计划体系是新工业国的特征”，并指出“在西方经济中，企业就是基本的计划单位”。〔27〕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者经济政策上的计划趋同，意味着“两者都开始抛弃市场，存在着可计量的向相同的计划经济形式发展的趋同”〔28〕。丁伯根也指出：“不可能存在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所有经济模式都是两者的混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在追求最优结合的市场加计划的模式，在这一点上，它们是趋同发展的。”〔29〕后期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是弗里德曼，他指出：“基本的结论或许根本就找不出一一种令人满意的东西来代表自由市场的充分运用，可是并不能因此就说没有必要放弃完全自由的市场制度……就我们目前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缺少一个完全纯粹的制度。每一种制度都有多少带有混合的性质，一方面具有行政命令的成份，另一方面又主要都依靠自愿合作，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要使行政命令的成份减到最低限度并极力扩大市场作用到一定程度，以达到除生产效率以外我们所追求的目

的。”<sup>[30]</sup>

第三，工艺技术全球化。趋同论特别重视技术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强调“现代技术的逻辑”。美国经济学家 B. 沃德：“按照趋同现象的假说，工业技术、都市和富裕产生了压力，迫使建立相同的，有组织地作出经济和政治决定的制度。”<sup>[31]</sup>关于“现代技术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是加尔布雷斯在 1966 年同刘易斯的谈话中作了具体而完整的回答。加尔布雷斯说“技术的本质，支持技术的大团体，大公司的本质，以及技术需要的计划本质，具有自身的规则，这种规则在所有工业社会中引起一种巨大的、不可逆转的趋同现象”。这将促成一种既受计划又受市场影响的不易区分的混合体，这是一种融计划与市场之优点的经济体制。它是在技术发展决定的这个社会，高度的科学观念和高技术专门化的要求，再也无法使知识分子顺从统治者，它们必然引起知识分子的探索精神，并由此产生一种衡量知识分子自由程度的标准。”<sup>[32]</sup>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指导精神就是以人权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它对全球化思潮起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在谈到自由主义思潮时，捷克斯洛伐克剧变后的新总理哈维尔说得很明白，“潮流变了，改变潮流的思想正是欧洲人（以及美国人）古老的人权思想。”<sup>[33]</sup>

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早在 17 世纪就指出，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不可侵犯的，更是不可剥夺的。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把自由、平等和公正宣布为全人类的价值信念，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对现实社会批判的价值取向，特别是重新对 30 年代大衰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相互交织）进行历史审视的价值取向，社会大多数人意识到“纯粹的资本主义与纯粹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理想，中间的道路才是理想”。<sup>[34]</sup>

但最关键的是寻求新的价值观，并十分自然地回到人道主义怀抱之中。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回忆说：“在 20 年代中那些由于人道主义而反对贫困和失业的文明人士，过去虽然本能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现在认为‘凯恩斯主义加改良的资本主义加福利国家’是完全可行的。”<sup>[35]</sup>这种对人文主义的关注集中体现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总宣言重新完整提出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

战后欧洲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是有局限的，主要体现为对“自由”价值的认同的不确定性，认为它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丁伯根说：“正如完全自由是不可能一样，完全的国家控制也几乎从没有存在过。”<sup>[36]</sup>但回归欧洲的自由传统的倾向却是异常强烈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本着理论语言的错误会导致人类错误行动永久化的深刻认识，刻意追求西方传统的自由价值观念。1944 年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的道路》，致力于研究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关系，重新唤起人们对自由和人权的重视。他说：“我们这代人忘记了私有制不反对财产的所有者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保证，而且对那些没有财产的人的自由也是最重要的保证。仅仅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是在许多相互独立的人之间分配的，才无论是谁都没有对他人的绝对权力，而且我们自己才能自己决定明天。我们自己才能自己决定明天我们干什么。如果一切生产资料都掌握在某些人的手里，那么其拥有者就是徒有其名的‘国家’，或者就是独裁者，他将得到对他人的不受限制的权力。”<sup>[37]</sup>经济自由本身就是普遍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自由是自由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基础，并受到这种经济的支持，因为它在这种经济的框架内可以得到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

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进一步论证了哈耶克的思想，指出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极为紧密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在民主制度的条件下，经济自由是实现政治自由的手段，市场经济是普遍的自由的充分保证，并为表述所有其余的全人类价值提供了相应的范式，它不受民族、国家、个人区别的限制。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和人权价值观念的弘扬，不仅恢复了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而且结束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冲突。西里尔·A. 泽鲍特指出：“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极端，在一个多世纪的难以平息的冲突以后，已相互投降了。”<sup>[38]</sup>新自由主义把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看成是全球经济的前提。德国自由民主党技术与能源委员会委员、罗马俱乐部成员亨莱利·普色特（Heneri Pousset）指出“新的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基础，即给全人类以真理正义、真正的互助和自由”。<sup>[39]</sup>全球经济市场化需要全球性的伦理价值的认同，这个伦理价值是一种美德，简化成格言，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一古老的自由思想原则应成为新世界社会的准则。<sup>[40]</sup>1993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起草的《人的发展报告》宣称“发展的目的是拓宽人们的选择”。新自由主义从人文主义出发，提出了人文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是一种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普色特给这个模式下了个最基本的定义：“人类的政治、经济、金融和信仰团体等各方面的邻居人必须从权势角逐中解脱出来，承担起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光荣、有效和人道的使命。”这“既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战略，也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人文主义战略观”。<sup>[41]</sup>

人文主义经济模式有两个特征：

第一，全球经济是一个世界经济整体，或者说世界性经济

统一体，它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所有的国家都包括在这个世界经济整体之内。世界经济整体是十分复杂的，它是由“大经济区”组合而成。世界经济整体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复杂的，需要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才能确保整个人类的生存。

第二，全球经济是一个“联邦制式世界经济体制”，即“联邦经济国家同盟”（Federal Economy United States）。这个体制的核心是合理利用并改革现有的附属于联合国的世界经济组织，但也需要某些“集中制”的因素。80年代初的联合国世界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指出“急需促进建立一个统一的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体制”，形成“一个集中的国际组织网络来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的世界经济计划能力”。

### 三、全球化学术思潮与美国国家 全球意识的关系

全球化同以美国为源头的信息化或信息革命是分不开的，而全球化学术思潮又是同7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全球意识中的信息网络理论和大西洋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是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思想来源。

美国素有国民主义的普遍主义（nationalistic universalism）意识，著名政治学家艾玛松对这种主义评述道：“美国是照亮整个世界，给人类指明进步道路的灯塔。”<sup>[42]</sup>到70年代，美国国家的这种灯塔意识，首先表现在信息网络理论，它是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重要思想渊源。

70年代后期，美国率先开始信息革命，转向以先进的信

息通讯设备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并不断地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对不发达国家的出口能力。伴随着这种“产业革命”的信息革命，美国经济学家 F. 卢宁琿提出了“信息经纪业”的名称，作为对依照合同提供服务的个人或组织的总称。F. 卢宁琿把信息经济人定义为设法利用可利用的一切信息源按需回答问题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个人或组织，这说明 F. 卢宁琿的信息经济重在突出信息革命的“社会革命”特征。<sup>[43]</sup>到 90 年代信息革命更加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在政府文件中接受“信息革命”、“信息经纪业”诸提法，并提出信息网络理论。1993 年 3 月 21 日国际远程通讯联盟（ITU）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世界开发会议。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会上发表题为“高度发达的信息通讯系统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的著名演讲，首倡“信息高速公路理论”。日本著名经济学者公文俊平称这篇演讲为“戈尔第一理念”。<sup>[44]</sup>1993 年末戈尔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发表了构筑国内信息社会基础设施网（NII）的五项原则。1994 年 3 月世界远程通讯联盟召开世界会议，原封不动地采纳了戈尔的五项原则，作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网（GII）的基础原则。1994 年 10 月，戈尔又发表《全球信息系统将促进发展》一文，完善了他的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设想。这个设想把整个地球看作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脑，而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则是它的中枢神经网络，通过建设各国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连通起来进行循环运作，全球每个角落都可以同时共同分享全球信息，并且实现瞬时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戈尔的理论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制定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即“全美信息高速公路计划”（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美国政府不仅全力实施这项计划，而且把戈尔的理论看成是美国的新价



值，介绍到许多重大国际会议上去讨论，从而使信息网络理论在瞬间成为风靡全球的理论。1993年12月，欧共体委员会颁布了德洛尔白皮书，1994年欧洲联盟庄严地发表了《信息社会宣言》，日本政府也发表了《面向信息产业的新创造》。

美国国家意识中的大西洋主义观念逐渐泛化，为全球化学术思潮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基础。

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使美国的全球意识中带有浓厚的大西洋主义。罗斯福早在1941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到美国谋求实现“四大人类基本自由的世界”的美国全球意识。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敬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年8月9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重申四大自由原则，并将它们作为美国大西洋主义的良好起点。<sup>[45]</sup>这四大自由后来又被包含在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宣言里。

多依彻在二战后把罗斯福的大西洋主义构想理论化为“大西洋共同体”理论。多依彻首先区分了“政治统一”和“价值统一”的差异。价值统一是“由人组成群体，传播流通渠道和系统的网络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中间则被人烟稀少或几乎无人居住的领土相隔”。市民能就很多方面问题交流信息，并能共享大众传播所产生的基本价值，而政治统一是建立国家一级和国家的共同体。价值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先导，而政治统一是价值统一的归宿。多依彻进而提出两种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ies）：合并型安全共同体和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前者指原本相互独立的各政治单位组成一个有统一政府的单一安全共同体；后者指一个由若干仍保持法律独立性并相互分离的政府组成的安全共同体。据此，多依彻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

美国——加拿大——欧洲为核心的“大西洋共同体”概括为“多元安全保障共同体”，并强调“大西洋共同体”中的国家应有相互一致性的价值观、独特的生活方式、有福同享的社会认识、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牢不可破的社会传播纽带、人员流动和交流传播的多样化。<sup>[46]</sup>

到 70 年代，特别是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中的“个人和心理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可以说是美国文明及其法制体系的危机，美国社会需要“新的理想和更远的目标”。尼克松为了反对美国内部的新孤立主义浪潮，使美国进一步国际化，调整美国国家全球意识，他不是否认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而是发展大西洋主义，更多注意与关心欧洲，调整伙伴关系，主动适应“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尼克松出于共同防御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思想，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强调日本必须成为“大西洋”共同体的一个基本成员，参与“大西洋问题的解决”，<sup>[47]</sup>从而发展了美国的大西洋主义构想。尼克松在完善大西洋主义思想时，开始强调美国人权对于全球的普遍意义，并指责大西洋共同体中不注重人的尊严的政权。70 年代末的卡特政权“不但希望伸张人权成为全世界未来的潮流”，并要求“美国站在这个运动的浪尖上”<sup>[48]</sup>。卡特政权的全球意识，以美国的道义价值观和历史感为出发点，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基本信条”、“核心”和“灵魂”。卡特出于“建设性的全球介入”<sup>[49]</sup>态度，制定了“新世界秩序战略”，为美国国家大西洋主义全球意识注入许多新因素，使大西洋主义演变成为新大西洋主义。这个战略要求通过协商关系的不断制度化，加强大西洋共同体内的政治合作，进而促进形成稳定与开放的金融和贸易制度，建立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与新兴地区性“有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

关系网络，扩大对大西洋共同体的依靠。<sup>[50]</sup>“鼓励所有国家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共同努力解决诸如核战争的威胁，种族仇恨，军备竞赛，环境污染，饥饿和疾病等艰巨的全球性问题”<sup>[51]</sup>。卡特大西洋主义的人权至上价值，保证了“美国必将再次使自己成为人类希望和未来波浪的传送人”。同时卡特政府把人权问题看成是“国际社会优先处理的问题”，并“把人权问题作为世界各国政府讨论的关键问题”<sup>[52]</sup>，这实际上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原则作为全球化的价值标准。

到 80 年代末，布什提出了泛大西洋主义，而它又是对新大西洋主义的超越。1989 年 12 月 4 日布什在向北约盟国首脑通报美苏首脑会议情况时提出了新大西洋主义，作为美国处理欧洲和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新原则与政策设想。12 月 12 日贝克在柏林新闻个人俱乐部发表讲话时对新大西洋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布什政权的新大西洋主义，是一种新的结构，主要是适应东欧政局的剧烈变动以及西欧联合进程的加速。1991 年 6 月 18 日，贝克又在阿斯彭学会柏林分会上将新大西洋主义演变成泛大西洋共同体构想，主张建立一个从温哥华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西洋共同体，即一个包括中欧、东欧和苏联的泛大西洋共同体。布什在 1992 年 9 月 10 日颁布的《美国复兴计划》重新规划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充实了泛大西洋主义构想。这个构想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布什政府认为，美国作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享有世界上最大的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并完全有力量同其他想进入这一市场的国家讨价还价，开展竞争。

第二，美国要求改善全球贸易体制，需要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并在我们的半球上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线路网络”，以使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出口的超级大国”。

第三，布什政府还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讯、联络手段的发达，打破了原来概念上的国界，形成了全球经济。美国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开发市场上消除结构性竞争的障碍，为美国公司开发贸易和投资机会”。

第四，布什政府还特别指出，美国是自由理想“最大胆、最明确的体现”，需要把美国的价值观变成人类“共同的原则和价值观”，使美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灯塔”。

克林顿接受了布什的美国国家全球意识，把泛大西洋主义转变成美国的对外指导实践，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确立一个令人信服的形象”。克林顿政府致力于使美国企业和公司进入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鼓励全球民主革命，支持国外的民主和人权运动；帮助它建立民主机构、政党和自由的大众媒介；制定保护财产和权利的法律、公正的司法制度。大大地加强了美国全球意识对世界各国市场化和民主化历史走向的影响。

#### 注 释

- [1][俄]阿·恩·丘马科夫：《全球性问题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98页。
- [2]J. Tinbergen: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52.
- [3]J. Tinberg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msterdam. 1954.
- [4]P. 林德特、C. 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194页。

- [5] B. Balassa: *The Theory &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62, p. 101.
- [6] R. Cooper: *The Economic of Interdependence*, N. Y: Mcgraw-Hill 1968.
- [7] R. Cooper: *Trade Policy is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72, pp. 18 - 36.
- [8] H. 约翰逊:《70年代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所面临的国际经济问题》,1970年版伦敦。
- [9] M.V.N. 惠特曼:《对相互依赖的反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1979年版第 203页。
- [10] R.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N. Y: Basic Books, 1986, pp. 222 - 225.
- [11] [英]《经济学家》主编:《21世纪的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21页。
- [12] 埃沃里特·M. 艾尔里奇:《无国界世界的评述》载于《商业法》杂志 1997年第 1期。
- [13] S. Hoffma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In S. Hoffmann ed. *Conditions of World Order*. Simon Schuster, 1966.
- [14] [美] 罗伯特·O. 基欧汉、约瑟夫·S. 奈:《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 [15] [美] 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尔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47—148页。
- [16] George Modelski: *The Promise of Geocentric Politics*, in: *World Politics*, XXII. NO. 4, July 1970, p. 663.

- [17] 乔·莫德斯基：《世界政治学原理》，1972年版第56页。
- [18] 陶东风编译：《全球化》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95页。
- [19] Roa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London Newbury Park /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2.
- [20] [英] 米特尔曼：《全球化的挑战 在边际上的生存》载于英《第三世界季刊》1994年第3期。
- [21] Tinbergen: *Production Income and Welfare*. England: Wetzsherf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183.
- [22] [英] 库马：《社会的剧变》台湾志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 [23] Sorokin: *Modern Basic Trends, America*; Newheaven Publishing House, 1964. p. 78.
- [24] [英] 库马：《社会的剧变》台湾志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 [25] Clark Cole: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America, 1963. pp. 55 - 56
- [26]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来临》第129页 译者将“趋同”译为“聚合”。
- [27] Calbraith: *New Industrial State*, Fourth ed, Boston: Marflin Publishing House, 1967, p. 10, p. 115 .p. 111.
- [28] Ibid. .p. 394.
- [29] Tinbergen: Is the Example of Connergence for Communist Economy and Free Economy? in: *Soviet Union Research*, April 1961. pp. 333—343.
- [30] 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 [31] 转引 [美] 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29 页。
- [32] 《加尔布雷斯眼中的世界》,《纽约时代周刊》1966 年 12 月 18 日。
- [3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冷战后的美国与世界》 时事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页。
- [34] Macmillan: Middle Road,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ing House, 1939, pp. 7-11.
- [35] 转引自傅骊元:《“福利国家”剖析》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 页。
- [36] [荷] 丁伯根:《经济政策 原理与设计》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25 页。
- [37] 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1944. p. 107.
- [38] Zepot: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and Co-existence*, New York Publishing House, 1964. p. 146.
- [39] H. 普色特:《公元 2000 年后的全球经济对策》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7 页。
- [40] 同上书 第 11 页。
- [41] 同上书 第 61 页。
- [42]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3. p. 4.
- [43] [荷] 丁·范哈尔姆:《欧洲信息经纪业》 载于《信息服务与利用》1994 年第 14 期。
- [44] [日] 公文俊平:《东亚产业化与信息革命》(这篇文章是公文俊平提交给 1994 年 9 月 6 日在郑州召开的中日韩青年未来意识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 [45] 《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文件 1941—1949 年》第 1 页。

- [46]Karl. W. Deutsch, S. A. Burrel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47][法]阿尔弗雷多·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2 页。
- [48][美]卡特:《忠于信仰》第 169 页。
- [49][美]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 1977—1981 年》,1983 年版第 63 页。
- [50]同上书。
- [51]转引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394 页。
- [52]美国国务卿贝克 1989 年 1 月的声明。



# 试论经济全球化对 发展中国家行政管理的影响

汪永成

行政作为政府的功能和活动，是一种“生态现象”或“生态系统”，它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反作用于环境。长久以来，决定和影响一国行政系统的主要变量是本国的社会经济环境，行政系统服务和调控的领域也主要限定在一国疆域之内。外在的国际因素对一国行政系统而言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变量。经济市场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浪潮是民族国家行政环境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必将对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下同）的行政管理产生广泛而深刻、持久而复杂的影响，必将重构行政系统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状态和格局。本文拟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发展中国家行政管理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 一、经济全球化要求强化政府的地位与作用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按照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帕累托状态，因而，“干预最少，政府最好”。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的作用将日渐衰微，对一国市场经济而言如此，对整个世界市场经济而言也是同理，因而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的“终结”。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和主张。我们在讨论经济全球化时，在谈论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从而增进了总体福利之时，不应忽略以下基本事实：从全球角度看，全球资源是以政治上的民族国家形式来界定其产权的。每个民族国家的政府拥有合法的资源产权，也就是说，美国不会允许日本的资本随意地配置其国家的资源，这是“民族国家时代最核心的问题”<sup>〔1〕</sup>。世界上的物质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因而资源总是“稀缺的”。由此决定了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长久存在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表明各国利益依存度的提高，但另一方面民族生存和发展竞争也更激烈。外部性（如战争、世界经济动荡、免费搭车）、分配不公等世界性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也是客观存在的。世界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竞争具有无政府性和“有规则、无裁判”的特点，“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对各个行为实体都能加以限制和约束的最高权威或强制中心，无论什么规则或协议都缺乏有效强制实施的工具”<sup>〔2〕</sup>。因而，

对世界性“市场失灵”的治理、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的制定和维护不能指望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权威性的“公共机构”，因而“关键性的市场的外部性都是靠军事手段等强权手段解决的，世界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由那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所控制，这是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性质决定的<sup>〔3〕</sup>。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损失（成本）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强国受益最多，其他国家受益不多或根本得不到什么好处。如果考虑到这样几点，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符合逻辑的结论是：行政作为“国家的组织活动”，经济全球化强化了政府地位与作用。

（1）行政系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有力工具。经济全球化是在某种既存的秩序下展开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西方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涵义。这一战略的要旨是，以技术和资本的全面优势，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实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产权的目的<sup>〔4〕</sup>。因而“在西方学术界全球化这一概念被用来表示这种由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过程而不断向各地区扩张、扩展的过程”<sup>〔5〕</sup>。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基于国际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实力的不对称和国际市场经济规则与制度安排的不公正，即使是自由贸易其本质是不对称、不均衡的，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优势以及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总是千方百计地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面对着经济全球化“强者为王，先者为君”的这一特点和事实，没有一个有力的、灵活的行政系统，国家的利益、民族的权益就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和实现。

（2）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实现及其分配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

政府能力。在世界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不仅要受市场规律和价格机制的支配，还取决于民族国家政府的能力和机遇。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民族国家的政府如同国内市场上的经济主体一样，也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宏观经济主体，它也要寻求最大限度地获利，同时减少本国人民的成本，而且这种成本——效益的计算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范畴，还必须考虑其他的社会代价。因此，一个国家政府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其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机遇的能力、获得利益的大小，决定着其现代化程度的快慢和实现效率的高低。

(3) 经济全球化中，各民族国家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具有动态性，其发挥更加注重技术、人力技能及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的比较优势更具有人为性。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这个理论不断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经典，也常常成为西方的学者、政治家开给发展中国家求取富强的药方。理论上讲，民族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产业是“经济”的，但是任何一国的优势均是一种“潜在”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和人为性。行政系统作为一国资源的组织者和动员者，如果它不具有对潜在比较优势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开发能力，潜在比较优势往往会变成比较劣势。

(4) 在各国经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自发性”，政府可能也可以采取“无为而治”的姿态让经济自发成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政府只有充分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才能在激烈竞争中求得持续和发展。经济全球化将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裹胁”进入世界市场中，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是不同的，它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垂直型国际分工，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

的商品是高附加值的，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拿初级产品、低附加值的产品与之交换。如果发展中国家安于这种分工状况，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摆脱不了依附、从属、小伙伴的地位，也将永无出头之日。后现代化国家要走向振兴之路，只有千方百计地从“垂直”国际分工中摆脱出来，实施“赶超战略”，挤进水平国际分工，挤占高附加值的商品市场方有一条生路。为此，必须实施适当的贸易保护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能达成这一点，民族国家的政府干预将变得义不容辞，而政府干预要实现上述目的，没有一个强力政府（而听任自由主义的自流发展）是根本办不到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强力政府”，决不是那种旧式的专制政府，而是“一种由文化精英组成的、按民主集中制产生的，既开明又权威且具民族气节的新型政府”<sup>〔6〕</sup>。

总之，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意味着民族国家行政管理作用的淡化，恰恰相反，国际经济相对依赖性的增加、竞争——斗争的日趋激烈、世界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强权逻辑”的存在，对民族国家的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突出了行政管理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日本学者正村公宏深刻提出：全球化“与其说是削弱了经济性国家主权，还不如说是加强了各国政府的责任，即在充分理解本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手段，有效地行使经济性国家主权”<sup>〔7〕</sup>。

## 二、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府职能是行政系统在社会经济中所承担的职责，转变与更新政府职能是行政系统适应环境变化的基本方式。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1) 经济全球化客观要求政府职能增添新的内容，扩大内涵。经济全球化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在相对封闭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虽然因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对“市场失灵”进行治理：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克服外部性、确立市场规则、提供社会保障等<sup>[8]</sup>。全球经济的市场经济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市场失灵出现了新的内容——世界市场失灵（The World Market Failure），这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有相应的新的发展：首先，民族国家政府不仅要致力于治理本国范围内的市场失灵，而且还要致力于治理世界市场失灵，如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克服全球性外部性等。虽然履行职能方式不同。例如，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承担全球性环境保护职能、人口控制职能、反恐怖职能、打击毒品犯罪和利用国际互联网络犯罪等职能。其次，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府来讲，不仅要致力于克服市场失灵，而且还需要积极地推行行政改革，实施赶超战略，对本国经济发挥积极的导向职能、驱动职能。再次，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不仅要克服一般的市场失灵，而且要通过“政府替代”克服“市场缺损”。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之一是本国“市场缺损”——市场主体不发育、缺少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市场体

系不完善、市场机制残缺等，因此全球化浪潮中的政府必须“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法律手段，替代一部分尚不发育的、残缺的或运行失效的市场机制……”<sup>[9]</sup>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迅速地发育和扩张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帮助经济的各部分首先站起来，然后学会走路，再放手让他们自己走”<sup>[10]</sup>。

(2) 经济全球化客观要求强化某些政府职能。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强化政府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职责。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是和谐与冲突的统一。追求和谐需要人类“集体行动”。事实上，全球化进程伴生了许许多多危及民族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经济渗透、经济封锁、禁运、经济制裁、经济间谍战、贸易战、关税战、附有条件的经济援助、运用“金钱政治”影响他国政策之制定。以日本对美的经济渗透为例，为保护日本投资，日本财产所有者建立了遍及全美的政治影响网络。帕特·乔特对此忧心忡忡地说“日本在美国的广泛介入已经使得美国的贸易政策常常是根据日本的利益，而不是根据美国的利益制定的”<sup>[11]</sup>。而世界资源的相对有限性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各国在合作中必然伴随着冲突。各国都试图通过增强自身实力而增加他国对自己的依赖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支出。因此“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虽然合作不仅是可能的，并且合作空间不能说小，但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sup>[12]</sup>。美国总统克林顿说：“我们将把我国的经济安全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sup>[13]</sup>超级大国的美国政府尚且如此，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自不待言。

其次，经济全球化客观要求强化民族国家维护本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能。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经济中，一国的政治、经济的稳定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使得维护本国经

济、政治稳定的情况得以复杂化。正如保罗·肯尼亚所说：“当今的全球性金融和通讯革命比以前更加广泛深入，将造成不稳定……现在很难说我们更加复杂的政府控制能否应付金融动荡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每天 24 小时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易，而交易额已超过了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额。然而，更大的变化发生在通讯领域……它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穿越国界，使人可以听到和看到外国人是如此以不同方式行事的。它也使富国和穷国之间比 50 年前更了解它们之间的差距，刺激人们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这些变化使社会甚至整个国家都越来越难以控制本身的命运。<sup>〔14〕</sup>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只要在计算机上敲几个键，成百上亿美元的资金就可以转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造成全球性的大恐慌”完全可能的话，就不得不承认保罗·肯尼迪之言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危及民族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的因素不只是“全球性的金融和通讯革命”。例如，实力超过许多民族国家的跨国公司完全可以通过行贿支持某些政党候选人或以金钱资助政变的方式左右东道国的政治进程和经济政策走向。美国联合水果公司曾在 1954 年推翻危地马拉阿贝兹政府中担当重要角色；英国石油公司在 1953 年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电报公司在 1973 年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中施加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跨国投资机构的投机活动促成了东南亚金融风暴；货币贬值一落千丈，政府倒台，社会动荡……这种现实及其可能性对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稳定的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强化政府维持本国稳定的职能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 三、经济全球化要求提高政府行为的艺术性

一般而言，市场经济对政府行为的要求是非常“精细”的，以政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和协调配合来讲，政府必须在准确充分理解紧缩性、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特点、功能、政策工具、时滞因素等的基础上，准确把握经济运行的“脉搏”，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紧模式、双松模式、紧财政—松货币模式、松财政—紧货币模式，以及适度从紧、适度从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模式中作出灵活、艺术的选择。

“如果有关的两个单位、两个集团或国家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抑或意识到这种相互依存的限度，它们就会相应地修正自己的行为。”<sup>[15]</sup>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各国的相互依存，改变了政府行为的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政府的行为和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金融政策的影响往往是全球性的。因而经济的全球化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以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政策的决策行为为例来说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关系，他们既是互利的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东道国和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彼此的优势，实现互利合作，另一方面东道国与跨国公司存在着目标上的冲突：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获取更高的垄断利润；而东道国政府吸收外资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关系意味着：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是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的统一，“并非所有的钱都是好钱”，因而东道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兴利除弊”；第二、一国政策

对跨国公司的限制和管理是有限度的，它直接受到其他国家政府对待跨国公司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对跨国公司而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相对封闭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决策目标是多元的，政府要追求经济稳定、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充分就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矛盾等非常复杂的关系，但我们可以把这些目标概括为两个基本目标：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在政府制定跨国公司政策时，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政府在追求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时，还要追求主权目标，这无疑加大了政策目标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就效率、公平、主权而言，过于看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强调效率的首要原则，不可避免地会给东道国带来主权的丧失，以及社会分配的不平衡；反之，如果一味追求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自我的道德标准，必然造成发展机遇的丧失。总目标之间的矛盾性在各个具体目标之间（平衡国际收支、就业、增加投资、促进出口、技术转移、提高管理水平）也表现得很复杂。如何在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体系中寻求最优或次优的平衡对政府政策的灵活性、公开性、效率性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要求政府的制定经济政策行为具有高度的预见性、准确性和技巧性。

#### 四、经济全球化“削弱”了政府权力

政府的公共权力是政府履行其职责的前提。经济全球化通过向上转移和向下转移对政府权力的配置格局产生影响。民族国家政府权力的向上转移是指政府权力向超国家一级（如欧洲

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组织)所做的有形和无形的转移;民族国家政府权力的向下转移则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向地方政府、集团、区域组织甚至经济组织(如公司、企业)的转移。“当第三次浪潮汹涌澎湃地横扫全球的时候,民族国家这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关键的政治单位,正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sup>[16]</sup>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不仅导致政府权力无形之中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组织机构中去,例如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动使各国政府对货币价值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小,也不同程度影响着民族国家政府的货币政策自主权,这样,原本由一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独有的权力,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导致政府权力无形中向下转移,例如,某些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日益不受母国约束,不以母国利益为准绳,它们的权力越来越大。经济自由化背景下的国际自由贸易协议、联盟包含着政府权力向上转移的因素,而经济自由化要求的减少中央对地方政府、行政机关对公司企业的干预和管制,又导致政府权力的向下转移。民族国家政府权力配置格局的这种变化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涵义。就政治意义来讲,这种权力配置格局的变化,“将出现各种拥护地方、地区、国家和全球各层次权力大转移的集团。这种‘层次政治’可能把拥护者分成阵线分明的四个集团:‘全球派’、‘国家派’、‘地区派’和‘地方派’。每个集团都将狂热地维护自己想像中的独立性(还有经济利益),也都将寻求盟友。”<sup>[17]</sup>这会使得民族国家的行政系统(尤其是中央行政系统)变为“较小也有较少权威的单位”<sup>[18]</sup>,从而影响到行政系统的一体化、有效性、认同感以及行政系统对社会及自身的整合,并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行政发展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 五、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自主性 提出了新的考验

这一点是同政府权力的配置格局发生变迁紧密相关的。政府的自主性程度会对政府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产生重要影响。因为政府超越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政府能否制定出一种稳定的、长远的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计划与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在相对封闭的行政环境中，政府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政府在与受其支配、控制或调节的各种经济组织（主要是国内民族资本）的联系中，如何确保自主地制定、实施各种决策和政策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种环境中政府的自主性主要反映了政府能否超脱地处理自己与国内民族资本的“两者同盟”关系。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中，各种利益集团都会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从而使资源的配置和分配对自己有利，这时的政府自主性反映为政府是否拥有承受、化解这些压力的能力，其实质是政府的自律问题。经济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政府的自主性发生了复杂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结构调整、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使政府处理两者同盟关系的难度加大，而且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外国的资本、技术或跨国公司力量的制约。这样，政府的自主性就会由能否正确地处理“两者同盟”关系（政府与国内民族资本）变为能否正确地处理“三者同盟”关系（政府、国内民族资本、外国资本）。这对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府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资本、外国资本和政府三者的利益有一致的一面，但更有对立和矛盾：追求全球利

益的跨国公司试图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产品市场或产品的生产、加工地；发展中国家的民间大企业主要着眼于自身利益，试图控制国内市场；而政府一方面要对外保护民族资本的利益而限制跨国公司的行为，对内则往往从资源配置优化、公平与效率、竞争与规模经济的角度管制民间大企业的过度集中。在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中，政府的地位及其对其他两者的协调和控制能力面临巨大挑战。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政府自主性的虚弱使得政府表面上拥有权威，但实际上受到不同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官僚们拥有很大权威，他们或者是代表某些个别民族资本的利益，或者是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因而实质上使政府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代表整个民族或国家利益进行自主决策和施政的能力。并且由于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处于强有力的控制地位，使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

总之，经济全球化使机遇与挑战、利与弊、得与失交织在一起，它对民族国家行政系统的影响不是零碎的、简单的、短期的，而是全面的、复杂的和长远的。民族国家的行政系统必须作出应对，作出抉择。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就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就会有一定的政治国家。”<sup>[19]</sup>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到全球化和市场化的阶段和形态时，行政系统作为“政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通过自身的变革与其相适应，否则，“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sup>[20]</sup>因此，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是当今时代推动民族国家政府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变量之一。

## 注 释

- [1] 刘靖华:《霸权的兴衰》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5 页。
- [2] 畅征、王杏芳等:《国际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 页。
- [3] 刘靖华:《霸权的兴衰》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8 页。
- [4] 同上书第 215 页。
- [5] 同上书第 216 页。
- [6] 夏振坤:《信息革命与经济发展》 载于《江汉论坛》1997 年第 1 期。
- [7] 吴惕安、俞可平:《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7 页。
- [8] 参见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9-209 页。
- [9] 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6 页。
- [10] 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2 页。
- [11] 美 帕特·乔特:《银弹攻势——日本以“金钱政治”手腕操纵美国的经济贸易政策》,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导论第 2 页。
- [12] 刘靖华:《霸权的兴衰》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版第 5 页。

- [13] 转引自邹树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载于《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 [14] R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p. 332 - 333.
- [15] [美]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7页。
- [16]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83页。
- [17] 阿尔温·托夫勒:《力量的转移》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 [18]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83页。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 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

## 浪潮中民族国家的两难抉择

邹树彬

如果我们视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为一个有机的系统，那么世界市场则构成该国的“环境”。根据系统的观点，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系统应当是开放的，不断与其所处“环境”发生各种信息和能量交换的互动系统。相反，一个封闭的系统则是与外部的“环境”相隔的系统，因而也是一个没有生命力并趋于消亡的系统。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社会中影响民族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变量，激流澎湃的全球化浪潮正以不可抗拒之势把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纳入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网络之中，民族国家只有积极参与才能维系自身的存在及获得发展，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所说：“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在享有其带来的巨大的好处的同



时，也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伤害和痛苦。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人类的一切合作和各种形式的社会生活中，有所得必有所失，怎样减少代价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永远面临的课题。”<sup>〔1〕</sup>面对全球化赋予的两难选择，民族国家应制订理性战略，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在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同时为本国民众谋求最大限度的福利。



尽管人们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涵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一致的理解，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却都无法回避：“全球化”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和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并加以热烈讨论的话语。这一话语的明确提出虽然时间不长，<sup>〔2〕</sup>但却并非空穴来风，它反映了人类试图解读时代特征的一种努力。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如战争与和平、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核危机、人口爆炸、难民潮、毒品泛滥、恐怖主义盛行等都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单凭任何一国力量是无法承担的，它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密切合作，正是全球性问题才使人们在“全球化”这一话语中找到共识。简而言之，国际社会各种资源、要素流动并融合成超国家体系的变迁态势和客观现实孕育了“全球化”这一概念。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最基本的动因和最明朗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国际经济联系变量连续变化而导致的一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融合并最终朝着无国界方向转变的一种过程和现实。它

是世界经济国际化的高级形式。世界经济就本质而言是一个以市场为纽带，以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为媒介，将各国经济紧密联接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伴随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程度的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一系列环节周而复始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经济日益成为一种密不可分的“地球村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下，“没有谁可以像孤岛那样，与世隔绝而独善其身”<sup>[3]</sup>。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溢出国界、世界市场飞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 200 多年前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活动的推动，世界市场就已初显端倪。此后，随着国家间商品交易的日益频繁和交通运输业的进步发达，国家经济市场化和市场经济全球化才终成滥觞之势。市场的开放性，资源的流动性，经济的关联性，供求信号敏感性和经济波动的传导性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良性的运行机制。以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实现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从而极大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一国经济运行的效率无论多高总要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世界资源分布不均及资源效益差异是引起资源流动的直接动因，然而在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高时是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只有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一结果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以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管理体制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贸易自由化进程，使国际交换在贸易壁垒日益削减的世界市场上顺利进行。近十年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 30%，投资方式多元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的深化使各国有可能利用本国产

业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谋求最大限度的世界份额。货币、金融、技术、劳务、信息等要素市场的不断国际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不足，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工业化国家。

2. 遍布全球的信息网络构成了人类社会灵敏度极高的“神经中枢系统”，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使信息瞬间分享已非难事。信息高速公路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高速信息传输与处理网络，具有廉价的多功能服务、信息的共享性等特点。以全球互联网络为载体的市场交易方式将使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此外，信息产业也正日益成为各国经济新的增长点。1996年7月，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表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发展技术》报告中认为：“到20世纪结束时，信息将成为世界经济系统中的最重要的商品。”“网络社会”正在形成，据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估计，到2000年，将有1亿台电脑入网，互联网络用户将达5亿。1990年全球信息产业产值为1489亿美元，90年代中期突破1万亿美元，到2000年，将达3.5—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还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最直接的体现者，实行全球战略，进行跨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和经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对世界经济起着越来越大的助推器的作用。德国《世界报》1996年5月10日载文指出：世界上100家最大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额的 $\frac{1}{3}$ ，它们同其他跨国公司所属子公司之间贸易额又占 $\frac{1}{3}$ 。在世界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中，“起先锋作用的是跨国公

司”。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可以使东道国享受到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的好处，从而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4.1996年5月7日，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世界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的最新研究报告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经济全球化从总体上讲是有利于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抓住这一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参与中求生存和发展。

## 二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朗化表明，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现时代，封闭型的经济运行机制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是极不理智的，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任何国家，自觉或不自觉都要融入全球化浪潮中，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不过，对于民族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给民族国家带来机遇，又使民族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对一些国家而言，它并不完全是福音，可能更意味着风险甚至是灾难。“我们可以用一个古老的船的比喻来形容国家，如果一艘驶进国内港口的船只上的舵手必须与其水手们的技术可靠性和风浪的不可测抗衡的话，那么驶进国际水域，他就不仅要与致命的脆弱性和变化无常的自然界抗衡，而且还要提防其他船只和水手——其中有些千方百计地想使他偏离航线，有些则笨拙地挡住他的去

路。”<sup>[4]</sup>

1. 民族国家的主权基础受到侵蚀。在经济生活中，市场和国家的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是极富穿透力的一种力量，具有很强的地理扩张倾向，其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因而往往超越政治藩篱；而国家行动的逻辑则是获取并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进程，并且对经济的管理往往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因此，市场和国家在现实中往往发生冲突。美国学者威廉·奥尔森概括了两者的矛盾：“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sup>[5]</sup>主权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对内享有最高权威性，对外具有最高独立性。然而，经济全球化浪潮却使主权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际协调机制是经济全球化顺利进行的秩序保障，其权威来自民族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然而新的国际权力实体一经产生，便显示出对出让者的异化倾向，即对主权的分割、减损及至“吞噬”。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固有的“核心机能”正渐渐地转化为“协调机能”，有些甚至被废弃，成为“空白国家”。民族国家对本国经济的管理不再享有绝对排他权，其政策的制订必须与国际环境相协调。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更深刻的挑战还在于“无国界经济”正渐渐地侵蚀公众对母国的忠诚感。罗伯特·赖克在《国家的作用》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即将到来的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使命将是应付全球经济的离心力，这种力量正在拆散把公民联系在一起的纽带。”<sup>[6]</sup>因此，虽然世界政治地图主要还是由民族国家来构建，但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必须积极地加以应付。

2.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经济竞争。经济全球化是两个互为表里的因素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各国为防止本国利益完全湮没于全球化浪潮中，则千方百计地增长竞争力，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国公民的福祉。竞争与合作并存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各国在合作中必然伴随冲突，各国都试图通过增强自身实力而增加他国对自己的依赖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支出，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全球化同经济民族主义的对立和冲突。维护国家利益是经济竞争的基本动因，虽然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是相当含糊不清的，但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只要世界还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交往的最后的语言。无论经济全球化怎样拓展，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相互依存的加深并非自然而然地使各国经济利益趋同，反而会隐含着冲突的因子。冷战以后，人类社会充满竞争的一页正在打开，一场争夺资源、市场、科技优势和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将所有国家都卷入其中。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竞争力法案》，旨在加强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反映了美国对国家利益的重视程度。经济竞争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有经济援助、经济渗透、经济禁运、经济制裁、贸易战、关税战等，各国贸易保护主义也愈演愈烈。在国际关系中，经济政治化现象也比较突出，霸权主义仍然支配着国际经济秩序。一些国家在竞争中，往往把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利害关系加以考虑，表面的经济纠纷往往成为暗地里的政治较量，借全球化浪潮对他国进行干涉。正像不结盟运动主席、哥伦比亚总统桑佩尔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应该成为让干涉幽灵

重新回来的大门；相反，应该是把它拒之门外的大锁。”无论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优胜劣汰是一个无情的自然法则。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民族国家制订正确的国际竞争战略方是根本。

3.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各国间财富收益不均的问题。在国际相互依存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的“金字塔”型结构，这种结构由权力——博弈关系构建而成。其中，一些国家对国际事务有较大的发言权，而另一些国家则显得微不足道。<sup>[7]</sup>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曾提出“中心—外围”论，认为世界经济是以高度工业化国家为中心和以不发达国家为广大外围组合而成。中心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宰，他们是技术创新者和传播者，以生产和出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品为主；而外围则是技术的模仿者和接受者，以生产和出口满足工业化国家需要的农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中心和外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中心—外围”论以及其后所提出来的相关理论虽然过于偏颇，但其所揭示的问题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全球化的推动者是富国，受益者也主要是富国。因此，“在分配经济利益的蛋糕时，仍然是大块蛋糕分给少数人，其他人只得到蛋糕屑”。据联合国贸易会议发表的《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增加了40%，10个最大东道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占总量的2/3，而100个量小的外资吸收国引进外资量却只占总量的1%。<sup>[8]</sup>经济全球化带来各国的机遇是不同的，只要国际经济旧秩序不更新，“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这一问题就难以根本解决。

4. 经济全球化对各国政府施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无国界经济”在促进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其脆弱性、

敏感性往往使各国经济安全关联系数增大。一国发生经济危机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殃及他国及整个全球，这对各国政府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24小时电子化交易的全球金融市场业已形成，这为市场交易提供了便捷的融资手段。然而，国际金融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赌博性”极强的投机活动，很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每天1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仅有20%用于贸易支付，其余皆用于短期套利，特别是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暗雷，再加上全球互网络用于资本交易，使全球外汇市场的资金只要在计算机上敲几个键就会成百上千亿地以“光的速度”迅速转移到有利可图的地方。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金融调控机制不健全，放松管制，肆意借贷外资，资金周转不灵，终酿成大祸。索罗斯曾谈到：“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我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sup>[9]</sup>。是政府自己创造了投机机会，索罗斯等国际投资集团正是抓住了金融市场上的“阿基里斯脚踵”才一击成功。因此，如何处理好引资与管制的关系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道难题。此外，随着“互网络革命”的深入进行，经营者越来越容易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经营收入，逃避税务机关的征税。税务机关难以对纳税地址、收入来源、利润进行调查和有效的管理，导致资金外流和财政收入损失。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也往往和该国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发生矛盾。以上种种都表明民族国家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的能力高低直接关系到本国参与全球化的收益大小。



### 三

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国家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一味顺从全球化趋势可能使民族经济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被“化掉”；如果因经济全球化带来负面效应而关闭国门，远离全球化大潮，这不但可能，也极不明智。那么民族国家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社会学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在为他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使他付出代价。在团体生活中因不愿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将会承受更大的代价。然而，“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又值得算计的”<sup>〔10〕</sup>。对于民族国家来说，顺应全球化浪潮是个必然的选择，因为全球化趋势不可抗拒。民族国家在享受全球化的好处的同时，也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大潮中只是一个消极被动角色，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而且是一个可为的、可以设计和引导的过程。<sup>〔11〕</sup>民族国家可以在本国经济最大承受力的基础上寻求开放度最高的与世界市场的结合方式，策略性地参与全球化，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国家作用是日趋衰微，还是更加突出，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还是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都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能够增进全人类的利益和促进共同繁荣，而国家是一种消极力量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一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一直渗透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之中。然而，现实表明，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单凭其中任何一方都无

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人类福祉的增长。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市场和国家是影响国际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说：“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数百年来历史，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逐渐成为决定现代世界国家关系性质与动力的关键因素。”<sup>[12]</sup>自由放任主义理论有效性的前提是存在着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和常数规模经济，然而在现实中，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世界市场同样存在着“市场失效”的问题，国际经济关系的维系及发展有赖于民族国家理性的参与。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一国财富的增长不仅得益于市场的自发调节，国家的积极参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9世纪英国海军到达哪里，英国商人就会随之而来。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一些发达国家大体都有类似的经历。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也纷纷开展“经济外交”，积极为本国企业谋利。60年代到欧洲访问的日本池田首相被人称为“半导体商人”，吴作栋总理也声称愿作新加坡的“第一经纪人”，推销本国产品。“国内经济外交化”已成为各国制订对外政策不言自明的选择。不过，政府对本国经济的扶持不应坚持“此胜彼败”的民族主义立场，因为这既威胁到全球经济的繁荣，又会最终伤及自身，是一种“零和比赛”（Zero-Sum Game）。相反，“积极的民族主义”立场应是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理性选择，即在提高本国公众生活水平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以保证自己国家福祉的增长不以牺牲他国为代价。

西方新经济史学派认为，国家模型在经济变迁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sup>[13]</sup>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民族国家采取的发展战略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民族经济的兴衰，甚至自身的安危。概而言之，民族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应坚持以

下原则。首先,适度保护国内幼稚产业。选择保护的幼稚产业应具有潜在动态比较优势、远期的产出大于近期的保护成本和积极的外部效应等特征。同时,随着幼稚产业的发展要递减保护力度。因为保护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李斯特指出:“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sup>[14]</sup>对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大都是有害的。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应积极发挥进口关税、进口许可证、反倾销、反补贴等手段的综合效应。其次,正确处理引进外资与保护民族经济的关系。根据民族经济竞争能力的实际水平,合理确定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程度。对外开放应有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最后,制订和实施以保障国家经济长期安全为目标的国际竞争战略,引导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国家在金融、税收、信息等方面为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确保本国企业国外利益的安全。

## 注 释

- [1] 郑也夫:《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3、29 页。
- [2] 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研究网络出版的《第三世界的复兴》第 74 期 1996 年 1 月出刊刊登的 C. 拉哈文的文章说全球化概念是 OECD 前首席经济学家 S. 奥斯特雷在 1990 年首先采用。而该刊同一期另一篇文章则说,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在 1985 年。参见“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研讨会纪要”载于《世界经济》1997 年第 7 期。

- [3] 美 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25 页。
- [4] 美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 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05 页。
- [5] 美 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 页。
- [6] 美 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21 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东方编译所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 [7] 赵旻：《国际化战略——理论、模式与中国的选择》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1—88 页。
- [8] 李长久：《经济全球化的进展 内涵和影响》载于《世界经济》1997 年第 7 期。
- [9] 何清涟：《金融危机挑战经济奇迹》载于《读书》1997 年第 12 期
- [10] 郑也夫：《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29 页。
- [11] 赵旻：《国际化战略——理论、模式与中国的选择》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8 页。
- [12] 美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 页。
- [13]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 页。
- [14]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274 页。

#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张西山

冷战后，世界经济进一步向全球方向发展。全球化浪潮对民族国家构成了强大的挑战，这是对传统民族国家的侵蚀。正如威廉·奥尔森所述：“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sup>〔1〕</sup>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全球命题前，都力图获取最大利益，同时避免损失，民族主义随之出现，并和全球化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本文拟对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关系的新态势加以考察，以期引起关注。

## 一、经济全球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思潮

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阻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化社会的变迁过程，是一种超

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的现实运动。它已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人类已步入“全球”时代。

全球化是指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流日益发展情况下的世界各国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和趋势，又表达了一种民族国家对“整个世界的总问题”或“人类的困境”的关注。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来，全球化的意义尤其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际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sup>[2]</sup>而从世界的角度看，全球化经济的无国界活动，无疑对传统国别经济构成巨大冲击，并迫使各民族国家面对这一冲击做出各种反应，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反应，特别是战后世界经济随着资本和生产的国际化趋势加强而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地球村经济”。从文化理念看，经济全球化由于知识经济、信息革命而得到迅猛的发展，导致了改变民族国家观念的“全球主义”思想的形成。全球主义者认为，国家的保存将导致生产力的萎缩，民族国家的主权意义日渐式微。

有趣的是，在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全球化态势愈益明朗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却表现得异常活跃起来。从南非各地到印度洋海岸，从科索沃山谷到印巴冲突，暴力、流血不断，极端民族主义、部族仇杀、右翼排外暴力行动、恐怖活动充斥世界各个角落。民族间的互动、民族意识的消长、民族主义凸现与困顿，也许正是全球化浪潮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这似乎是矛盾的，有如著名政治活动家基辛格博士所说：“世界变小但世界各国彼此并没有更接近。自相矛盾的是，当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只有承认我们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决时，民族主义恰恰在这个时

候抬头的。’<sup>[3]</sup>经济全球化说明民族国家已被纳入全球经济网络之中，而全球化浪潮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和挑战并不意味着民族意识的消失和被取代，相反其外在涵化和衍变的表现形式均带有显性和隐性的，但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是民族主义在现阶段对全球化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反应。

## 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道路交通对于各个文明之间联系与沟通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和跨国公司的无国界经营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历史也表明全球化的根据与民族主义崛起几乎同步这一事实。无论是马克思关于“开辟新大陆与开创新时代”及“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命题，还是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彰显了全球化的动力机制——民族主义。虽然它是伴随着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同化和整合，伴随着血与泪、刀与剑载入人类文字编年史册。

地理大发现与海外殖民主义揭开了经济全球化的帷幕，而参与此进程的国家恰恰又是民族主义呼声最高的国家。16—18世纪在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盛极一时的重商主义便是一例。一般认为，这种民族主义萌芽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欧洲，正如有的论者指出那样：欧洲在中世纪经历了只有教，不知有国，到教、国并重，然后到纳教于国家之中的过

程。<sup>[4]</sup>自近代世界以来由民族意识发展至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社会运动，从其发源地欧洲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19 世纪民族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0 世纪初民族主义牢牢地控制着欧洲各国人民的情绪，并激发他们对实现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渴望。近代国家体系形成后，更由于近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乃至国际法均把“民族国家”视为权力合法性、合理性的重要渊源，从而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极具动员能力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殖民主义。其实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均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果实。同时，民族主义思潮也传播到殖民地国家和地区。20 世纪中期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为追求“民族自决”而进行的一场民族自我觉醒运动。它对 20 世纪国际体系造成重大冲击，导致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民族取得了“国家的地位”，并进而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也为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起飞廓清了道路。此外，从 19 世纪美国工业化、二战后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建以及东亚经济起飞时期，民族主义都是不可小觑的精神动力。

毋庸讳言，这种经济全球化将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使我们不得不对民族国家这一传统概念所蕴含的诸如主权的绝对性、排他性，经济的自主与独立等若干命题进行新的审视。自 1648 年威斯特伐里来会议确认主权原则作为国家交往的基本准则以来，“主权”观念持久不衰。主权作为民族国家的本质属性，其不可分割、不可让渡和民族自决曾被认为是国际社会通行的神圣准则。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下，主权观念的分割、受制、侵蚀乃至吞噬成为不争的事实，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国家主权削弱成为可能。二战以后，市场经济体制向全球化推进。曾经拒



绝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原苏联和东欧地区、中国现正在大力推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得以更加迅速发展，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世界市场的统一力，信息时代的穿透力，科学技术的整合力使民族国家的经济疆域被打破，造成“无国界”经济活动民族国家的经济依附性。其次，跨国公司的无国界经营认同世界经济，这是对传统民族国家观念的侵蚀。目前，全球各种跨国公司达3.7万家，其海外子公司达20万家。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值的40%，贸易的50%，技术转让的75%，技术开发费用的90%。跨国公司的组建和发展使民族国家放弃长期信守的主权观念，民族经济受到挤压、决策权受到控制、财税管制受到钳制、宏观调控无力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跨国公司不仅改变或正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经营思想，而且创造了和正在创造国别经济无法创造和容纳的产品和技术，它使民族国家显得那样脆弱，为此有人预言：本世纪是跨国公司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存在，而下个世纪则是民族国家在跨国公司的世界中生存。最后，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及其作用的日益加强则是影响国家主权的现实基础。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有着这样一些主要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愈益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的活跃因素：区域性非国家行为体（巴解组织）、政府间组织（北约）、国际性组织（联合国）、国际条约等等。这些超国家力量作为民族国家的异化力量形成对主权居高临下的制约，使民族国家主权行使陷入困境。如联合国的经济制裁和维和行动、世界贸易组织的“透明条款”、申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申报”规定、欧盟签订《阿姆斯特丹条约》统一欧元货币说明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和经济自主权削弱这一事实。

特别还应指出的是，“全球性问题”的加深和呈现是对主权国家的一种持久挑战。从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口爆炸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臭氧耗尽、温室效应、生物绝灭）、资源利用问题、南北经济差距、战争与核扩散、恐怖主义、失业与难民、爱滋病与毒品、非法移民、债务与粮食危机、文化发展与人的问题等等，日益成为具有全球性、危机性、普遍性的“全球性”的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相互依存的特点，必须全球范围的协作、治理，这就形成了全球性政治力量的相对增强和民族国家主权的相对受制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

### 三、冷战后民族主义新态势

当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期，整个世界发生了自二战后最重大的嬗变，维系战后世界体系的冷战格局瓦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冷战后的世界发展显示出由政治地缘世界正在逐步转向经济地缘世界<sup>[5]</sup>，从而使冷战时期一度被掩盖和弱化的民族主义又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并表现出一些新态势。

当今世界既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又存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这是各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和政治思潮演进不同步的后果。全球化推动经济一体化、地区一体化，但是文化的融合极其困难。不同民族国家充满了摩擦和冲突，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民族精神、宗教传统、生活方式的存在使民族主义进一步凸现。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如何保持自己民族国家本色而不被全球化浪潮吞噬是

当前民族主义的一种普遍心态。正如美国学者勒纳“痛苦门槛理论”所指出的：每个民族在进入现代的“门槛”时，原先的支撑物和社会结构突然崩溃，这使人们充满了压力和痛苦但又不可避免，于是人们转向民族主义。俄国朝野在苏联解体后喧嚷要真正回到欧洲去，重返“文明社会”，但西欧国家却把它们推之门外。这是因为，东西欧两者分属不同民族（斯拉夫族与法兰西、日耳曼等族）、不同文化（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不同宗教（基督教与东正教）、不同文字（拉丁字与基里尔字）。

当今世界既存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存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趋向，这就提出了全球化发展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按照沃勒斯坦的理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以西欧北美为中心，逐渐扩展到像俄罗斯那样的半边缘国家，再扩展到中国及第三世界的边缘国家，最后完成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当今世界无疑是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也就是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模式，而发展中国家必以民族主义相颉颃。现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重商主义”老调的经济民族主义重弹，即使美国、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在所难免。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重组，形成了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和渗透，民族国家在融入这一相互依赖体系中也要坚持保护民族幼稚工业的政策，正确处理好引进与消化、引进外资与自主的关系。当前我们要处理好机遇和挑战的关系，既要充分考虑世界全球化新趋势，更好地搞好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共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关注全球和平、发展和进步，又要尽量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弘扬民族主义精神，以更加理性的姿态迈向 21 世纪。

民族主义更多地是与一国维护其民族国家利益和谋求国家

发展而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那些干涉别国内政的筹码，成为民族分离主义者的王牌，这就是民族主义问题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其功能的两重性。一方面，民族主义在国家建设中是一种更为持久、深厚的动员力量和内容因素，有如早期的“自由理念”、“新教伦理”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东亚“儒家精神”对发展经济的支撑。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保持领先地位而不惜借助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压制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是一种孤立排外的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因紧迫和危机感而演变发展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也对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这都是我们应该明视的。

## 注 释

- [1] 转引自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98 页。
- [2]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 [3]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349 页。
- [4] 陈东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 页。
- [5] 叶章蓉：《冷战后世界发展的几个问题》 载于《欧洲》1994 年第 3 期。

## 全球化与

### “三个重新认识”的世界性课题

葛守昆 金毅

####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际间合作与交往的不断扩大，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日趋密切而广泛，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化浪潮已经成为全世界都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站在跨世纪的门槛上，想到中华民族要同整个人类的历史进步联系在一起，就要认真地总结过去，冷静地思考未来，不失时机地把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共产党人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为代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大胆探索和积极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比如，突破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论断，指出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充分调动了人们多方面的积极性。不过，毋庸置疑，即使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尽管现在比以前要清楚得多，但是面对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外部世界，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恐怕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社会主义还不能说已经搞得很清楚了。在80年代，小平曾多次在多种场合讲过，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为此他老人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的思想解放。我们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步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这段话很重要，既强调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思想解放，还提出了在今后的实践中要继续思想解放的要求。

事实上，十五大报告中就进一步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比如，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我们认为这些提法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必要的补充”，显然非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是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的，而现在这个提法，则把我国的非公有制

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的范畴，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如果这样理解（这种理解也有科学依据，具体在后面详细分析），那么，那种简单仅仅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属性的认识就要重新认识，也必须重新认识。当然，这也表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浅尝辄止，固步自封，必须以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思想。这也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其实，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一直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作区别所强调的当然也只能是差异，而不是共同性。对此，无论是国人还是外人，都概莫能外。但是同时必须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无一例外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理解，都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有关。问题在于这些认识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是否符合当今世界的实际，说到底，这些认识（即传统认识是，资本主义 = 私有制 + 无政府主义 + 按资分配，社会主义 = 公有制 + 计划经济 + 按劳分配；现今的认识是，资本主义 = 私有制，社会主义 = 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还同时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这“三个重新认识”，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所遇到的跨世纪课题，而且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共同跨世纪的世界性课题。

## 二、马恩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

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性否定基础上而产生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在这个否定过程中，关于所有制的否定是最本质的否定，目前人们强调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异，也主要是在所有制方面。其实，关于所有制理论，在马恩经典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问题在于，对两个社会在所有制方面的本质差异，是否简单就是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对立，这则是关键所在。长期以来，直到目前为止，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在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还有其他学者）都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定义为私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定义为公有制。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学习马恩原著，深入本质，弄懂原意，就不难发现，私有制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公有制也只是马克思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根据生产力发展趋势得出的结论，绝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而把结论当作本质，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是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其实，在马恩经典著作中，就有不少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只是因为“左”的思想束缚以及狭隘的偏见，学者们不愿作深入的思考，干脆接受原有的结论。在《资本论》第1卷24章结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就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实际上就包含着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规定。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



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sup>〔1〕</sup>这里，所谓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就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否定所产生的新型的所有制。但是，何谓“个人所有制”，这是理解两个社会根本属性的要害所在。可以说，到现在人们的认识还未切中要害，掌握真谛。不过，只要我们具备一定的哲学常识，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有制所揭示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我们就不难得出，个人所有制就是劳动者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上不是私有制，而是非劳动者所有制，即不劳动的资本家所有制。构成两个社会所有制对立的，是所有者主体明显具有根本不同的属性。一个以非劳动者为主体，一个则是以劳动者为主体。

首先，我们看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实际上，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上不是要否定私有制，而是要否定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从历史过程来看，就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那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被剥夺，一边是一无所有的单纯劳动者，一边是拥有资本而单纯依靠剥削剩余劳动的资本家。这里否定的实质是否定了劳动者所有制，代之以不劳动的资本家所有制。是所有制主体的属性发生质变。

其次，关于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并不是简单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而是通过剥夺剥夺者，把非劳动者的资本家所有制变成劳动者所有制。这样，关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就是劳动者所有制——非劳动者所有制——劳动者所有制。而不是劳动者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

有制。后者的否定之否定完全不符合否定之否定的哲学逻辑。

再次，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历史上并未直接否定过公有制，因此如果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理解为公有制，也实在令人感到牵强附会。当然，马克思也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所以，“个人所有制”不可能是私有制，但也不是公有制，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对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也表明，个人所有制不可能是公有制，因为“共同占有”已经是公有制，如果个人所有制也是公有制，那么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公有制，完全是同义反复，不仅不符合历史，在语言逻辑上也说不通。而若理解为根据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取得的生产力成就，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所有制，既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又在语言逻辑上不会产生悖论。

资本主义所有制不是一般的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他们说共产主义（亦指社会主义）“不是要废除一般的私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sup>[2]</sup>只是那种自己劳动、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已经和正在被消灭，剩下的只有不劳动的资本家所有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关于私有制，马克思也明确指出，有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sup>[3]</sup>私有制的性质要“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社会主义所要废除的，就是那种“以剥削别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

就手中。”<sup>[4]</sup>必须郑重指出，资本家作为非劳动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和分析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定，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基石上面，没有这个规定，他的全部学说就如沙上建塔。在分析资本主义管理劳动的二重性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家作为生产过程的管理者，作为工业的司令官，主要因为他是资本的所有者。马克思还讲过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随着合作工厂的出现，资本家作为单纯的所有者，跟土地所有者一样成为多余，工人也能自己管理自己。实际上，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暂时性，要取消资本家的统治地位，代之以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并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确立劳动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相对于一切剥削阶级社会，必须肯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进步。

在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劳动者所有制，究竟是采取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只能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不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更不能先人为地主地用公有制的框框来套。其实在马恩设想中，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本已经高度社会化了，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就只能是公有制，而且是公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只是一种过渡形式。那么从现实来看，当今世界所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未达到马恩所设想的生产力水平，即使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也肯定没有达到马恩所设想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继续死抱住马恩关于公有制的结论，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者所有制的本质，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选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实践已经验证，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对某种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硬

是采取公有制的形式，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尊重劳动者权利，不利于在人们相互之间形成平等互利的经济利益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人本身就不公平、不合理，显然这样一种所有制形式跟社会主义确实毫无共同之处。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恰恰也是社会主义的倒退。

### 三关于 三个重新认识 对全球 跨世纪发展的重要意义

彻底告别教条主义，还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对于我们迈向跨世纪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进一步克服“左”的思想困扰，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长期以来，人们根据马恩结论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为之脱离实际而建设的社会主义，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是不符合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必须坚决抛弃。回顾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最大的困惑就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无尽困扰。先是农村“大包干”，农民家庭有了除土地之外的几乎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农业机械），就产生了对“大包干”性质的怀疑；后来又有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争论。事实上，光是这些争论，就白白耽误了改革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可以屏弃“左”的思想禁锢，确立劳动者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属性，一切为了劳动者，一切依靠劳动者，摆脱旷日持久的姓“公”姓“私”、姓“社”姓“资”之

争，在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上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大的实践空间，当然也使得生产力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得到发展。否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避免这样一种现象：凡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往往似乎是“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又往往似乎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其次，共消传统意识形态的隔阂，促进中外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记得在 80 年代初，《参考消息》中曾转载一则消息，意思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提出要与时时的苏共总书记进行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开辩论。不过，美国总统是把社会主义当作共产和专制来看待的。多少年来，中外学者在理论上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基本上都是依据马克思的结论来批驳对方的，他们都坚持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以此作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分界线、分水岭，由此各执一端，自以为是，互相批评对方制度的弱点和缺陷。现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所有制方面的区别不再是“私有制”和“公有制”，就表明中外学者以往的学术论争实在是射击打错了靶子，或者如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根本就没有找到真正的对象。而重新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中外学者就不必纠缠于原来的理论争端，在新的认识起点上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对话交流，共同探索和认真研究全球化现象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人权、民主、平等，以及资源、人口、环境等，广泛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经济与社会协调共进、可持续发展这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这里既包含着价值多元化，也有在基本价值观念上的趋同和认同。

再次，结束无谓纷争，促进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合作。纵观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格

局一方面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断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与激烈，并且以对话代替对抗、合作代替冲突、用协商解决争端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解决“三个重新认识”问题，必将促进各国积极吸收和借鉴反映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优秀文化成果，促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障碍，尽管不同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也会有交往和合作，但是毋庸讳言，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对立对于经济等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是有影响甚至是有伤害的。比如，有些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在经济贸易方面制造障碍或实行制裁，这里既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因素，也有因为传统意识形态对立和隔阂的原因。事实上，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必然会对各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产生消极的影响，我们不能“掩耳盗铃”回避现实。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切实搞懂弄通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扫除传统意识形态的困惑，消除不必要的戒心和误解，我们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多方面合作和交往就会增加更多的包容性，就可以面向未来，建立和发展跨世纪的新型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

## 注 释

- [1]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卷第 832 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265 页。
- [3]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卷第 833 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 卷第 13 页。

## 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美] 阿里夫·德里克著 \* 黄涛译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这里简要重述一下我的几个观点：第一阶段，即 19 世纪，马克思把整个全球的合并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他认为，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也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因为它使那些沉睡了几个世纪的社会产生了勃勃生机。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temporality）。他认为社会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已经预设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阶段，从 19 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确已变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homogeniz-

\* 本文译自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之后》一书第四章。

ing)，而是产生了新的分化。这种新的分化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加剧了欧洲和北美（还有日本）中心地区（core areas）的民族竞争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引起对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地区的扩张使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但它并没有使外围地区（也就是使外围的经济）沦为资本主义中心的附属物。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认识到了外围社会争取民族政治与文化自治权的斗争，必须同时采取抵制不发达状况的形式。换言之，民族解放不仅是要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从欧洲霸权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资本的同质化过程中解放出来。如果考虑到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不平等，那么这种解放在追求自治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采取使民族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度“脱钩”（delinking）的方式。

资本主义的扩张并没有使世界同质化，而毋宁说是制造了发达与不发达这两个新的世界。随着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因政治改革而日趋缓和，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革命的社会主义（revolutionary socialism）移向了外围，开始与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混合在一起。1917年之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的产生更使得世界分裂为“三个世界”，这种分裂在二战后形成一种历史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比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要出现得晚）。这一阶段的斗争在二战之后越来越尖锐化，其实质是一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争夺第三世界民心和思想的斗争。

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世界分化并没有使意识形态的同质化过程停止。在这一阶段，虽然从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



上对欧美资本主义的抵制是非常真实的，而且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如在中国的情形）努力将一种民族文化的声音带入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之中去。但是与此同时，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吸收了资本主义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已经被吸收到关于发展的概念之中（这一概念在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理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是相同的）。社会主义作为革命的民族主义（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的源泉之一，也表现为民族发展的一种工具。在那些核心国家中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与扩张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样，在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与对社会主义的全球性期待之间的矛盾；而最终的结果是，民族主义的发展主义（nationalist developmentalism）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压制那些曾经是社会主义支持者的劳动者群体。

第三个阶段，它从 70 年代起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阶段开始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初具形态的时候。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外围形式和相应的发达—不发达状况（当然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保留着），但它看来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 19 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了，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实际上，就像沃勒斯坦（Wallerstein）等人所论述过的，生产的跨国化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因为“商品链”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这也许就是一些分析者，试图通过类比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的原因。然而这些类比走得太远，有可能被简单化，实际上资本主义新阶段与早期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却相反，它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 ( nodes ) 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 ( decentered ) , 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 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性的同质化过程中导致了以民族为经济发展单位的格局 ( 或者至少是与民族的经济发展相联系 ) , 而在新的阶段却相反, 资本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 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 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的最重要单位就是跨国公司。虽然跨国公司的某些方面容易使人想起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那些大型公司 ( 例如西印度公司 ) , 但是当代跨国公司以其实实在在的跨国性 ( authentically transnational ) 为荣, 他们不带有从中发展起来的那个国家的任何特殊印记。早期公司的商业目的代表着与国家 and 经济实体之间的合作, 而新的跨国公司则意味着资本从国家和社会中获得解脱, 因而他们的活动就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跨国化在世界经济中取得霸权的结果, 是一个全球性的专业化管理者阶级 ( a global professional - managerial class ) 的产生, 乃至一个全球性文化的产生。

有人把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写成一种“全球性的区域主义” ( global regionalism ) 或“全球性的地方主义” ( global localism ) , 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同质化与散裂化 ( fragmentation ) 的同时产生。生产和经济活动 ( 从而是经济的“发展” ) 越来越成为国家范围内的地区性活动, 而其管理却越来越需要超国家的监督和调节。换言之, 资本发展的新道路穿越国家界线并侵犯国家经济主权, 这使得原来那种国家市场或民族经济单位的概念变得名不符实, 民族经济的破裂从内部削弱了国家主权。同样地, 超国家调节的必要性改变了民族国家的功能, 使之在更大的区域或全球性的范围内进行合并。那些正

在走资本的道路的国家和地区（或正努力使自己走上这些道路国家和地区），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越来越相似；相反，没有走上这资本的道路的国家和地区，在越来越紧张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边缘化的形势下，不得不尽全力维护自己的独立性。

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外围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走资本的道路的国家和地区与被资本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的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与地方主义（localism）同时并存的悖论。这种新的发展，正如它削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族国家一样，也侵蚀了那些曾被预言为具有国家经济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世界再一次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实现了资产跨国化的第一世界，另一个是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原来属于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并正想通过资本的道路改变现状。把世界分为南—北两部分的办法比较清晰地描绘了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它们不仅指地理上的位置，而且指在世界经济分布中的位置：北方意味着走资本化的道路，南方则在此之外。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建立在国家自给自足和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脱钩的前提下，但这个前提在新的环境下已经不存在了。同样地，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现代化的理论，也已经名不符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意义上包含了对欧洲中心资本主义的时空预设，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因为这种新的形势既具有同质化特征

又具有散裂化特征。资本主义本身已力图通过认识这种散裂化来超越自身，而使用新的术语为理解世界经济的初步努力产生于非欧美资本，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但是这并不像有人宣称的那样：新的世界形势意味着现代化战胜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在二战后作为与列宁主义相对抗而形成的现代化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更有效地解释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事实上，是否马克思主义在它和现代化理论相重复的地方失败了，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当社会主义按照它来谋求资本主义的生产目标时，是否就暴露出自身的尖锐矛盾，这些问题仍是可争论的。

现代化理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新的发展时，明显表现出一种力不从心。除了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人为现代化理论引入的一些重要限定之外——他们很敏锐地发现了现代化理论的经济主义在应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挑战时的脆弱性——到现在为止，现代化理论的结构中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时空目的论（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teleology），甚至比马克思主义更带有决定论色彩。既然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竞争对手已经消失，这种目的论便再一次站到了理论的最前沿——可能比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中更为迫切地——他们认为生产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出现代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包括普遍的福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者，例如中国，仍然简单地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也同样能够实现现代化。但是，一种情况是不论他们多么严肃地坚持这一看法，他们过去的历史留下的遗产——现代化成功之路上必须加以清除的障碍——却产生了与他们的看法相反的情形。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了解释一些社会——这些社会在既拒绝抛弃他们的历史，又真诚地努力摆脱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之间的联系时，也部分地获得了现

代性——他们努力发掘非欧洲历史中包含的现代性。很显然，后一种情况并未有效地影响现代化理论的目的论，它仅仅是简单地把非欧洲式的历史纳入到现代化的主流中。现代化理论一直以来都想用资本主义来掩盖自己的起源，想通过使自己表现为一种关于无时空界限发展（development without spatial and temporal boundaries）的抽象理论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一意图曾一时使得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现代化理论的变种——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但是其理由是错误的。

由于这种目的论，现代化理论并不比一个现代化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能更好地解释世界。现代化理论拒绝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提出空间关系问题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暗藏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目的论的辩辞。我这里所说的空间关系，是指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关系，他们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中不同的位置；这种空间关系还指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在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一样，这种关系是现代化理论进行分析时所使用的基本单位；最后，这种关系也指全球的中心与外围结构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忽略这些关系就意味着忽略了这些关系中的决定性要素即不平等的权力，也就意味着忽略了把握那些对资本主义的抵制力量的必要性，那些抵制不仅是过去的历史遗产的表现，而且是这些关系本身的产物。现代化理论已经看不到事实上只有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强制方式才可能战胜对资本主义的抵制。因此，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认为所有的国家迟早都会依照那些先进的群体、国家和社会的模式而加入到进步的行列中。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就是从这种理想化的思考中汲取力量的。这样，这种理论便通过时间把自己同资本主义的进程联系了起来，而简单地省略了那些在这一进程之外的国家，或

者说是拖延了这些国家进行资本主义进程的时间。

这种意识形态在今天最明显的失败表现为那些以前曾经很“先进的”社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退步，例如美国，它的情况说明了所谓无限进步的预设不过是一个谎言。这种退步与过去的时代的时间性混合在一起，同样地，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发生跨国界的相互混合（*intermixture*），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模糊了一个处于资本主义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或地区的、或全球的）时间目的论。实际上，在世界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那些国家愿意承认这样一点，即资本主义的近期发展只是有利于世界人口中的很小部分，而世界人口的大部分（即“南方”）则越来越一厢情愿地退缩到了边缘化的位置上。而且，在全球一体化（*global unity*）和同质化的过程中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在国家范围内或全球范围内确实存在着散裂化。这种散裂化比任何东西更有损于现代化理论者的目的论，并且也更能解释当代文化中增加的有关时间和空间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来。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把“后现代主义”描述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与此相似，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他最近的《后现代性的状况》一书中，直接将后现代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同“弹性生产和积累规制”（*the regime of flexible production or accumulation*）相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理解当代文化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散裂；根据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 Francois Lyotard*）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今天，作为一种“元叙事”的现代化已经不再比马克思主义更能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时空元叙事相关。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比现代化理论更能解释资本主义

的空间关系。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建立在一些对立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而这些关系为他的分析引入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概念。列宁因为认识到国家与地区之间；发达与不发达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全部空间性。“世界体系”论也明确而完整地把握了空间的重要性，这种分析虽然严格地讲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围，然而却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世界的自然推论。而且，与列宁首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关系不同，世界体系论在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那里已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历史。（甚至是在这之前历史）

由于现阶段资本主义空间关系的重要性，世界体系论在解释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态时非常恰当。在我看来，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的理论必须与另外两种目的论区分开来：关于资本主义时间性的目的论和资本主义自身概念的目的论，换言之，那些分析概念（例如“阶级”）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存在中加以实现。上述讨论也清楚地表明，民族国家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单位（在分析资本的运作时），世界体系论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它贬低经济结构的政治重要性时太偏激了。

沃勒斯坦在他最近的《轻率的社会科学》一书中，不仅否认欧洲中心的时间性，而且对发展概念本身提出质疑，包括那种已经被单向的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主义（*Marxist Utopianism*）所吸收了的发展概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目的论集中指向阶级的观念。对社会分析而言，阶级概念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阶级分析已经很大程度上被一些社会概念弄得复杂化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性别、道德、人种等。今天，这些概念几乎出现在

所有的批判性作品中，而且都因循着既定的陈规老套。从 E. P. 汤普森 (E. P. Thompson)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到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的近期著述，阶级被当作一个僵化的范畴来使用，不是说明了而是掩盖了社会的真实性。阶级已经被当作构成社会存在整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不是被当作一种社会分析的解释学工具 (hermeneutic tool) ——阶级是描述社会关系网络的诸多范畴中不可省略的一个范畴。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这个概念被先驱领导者抽象化了，用于否定工人阶级自身的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这种目的论不仅被证明是具有政治和社会的危险性，而且在社会存在结构和个人意识已经变得异常突出的时候，尤其不能恰当地说明社会阶级关系。

这些观点和我在讨论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实践时的观点之间的相似并不是偶然的。我前面已提到过，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目的论，而与其自身的实践产生了一系列矛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目标与民族主义目标之间，以及理论概念与社会存在。我并不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前成熟期的后现代主义，但我想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较，即由游击战引起的政治弹性 (political flexibility) 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 (flexible production) 之间的比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我敢说就是毛的马克思主义) 与共产党的目的论没有联系，因而它成为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个恰当的马克思式的范例 (paradigm)。

虽然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激进分子已经因其后果而否认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话语仍然通过全球性资本的操作者在世界的概念化过程中继续存在着。所以，一个“游击式营销” (guerilla marketing) 策略的倡导者说道：



各位先生们，1984 年来到了，怎样应对呢？我们的建议是“游击式营销”。就像游击队员必须依靠熟悉地形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一样，当今的跨国公司同样如此。世界就是我们的地形。随着技术的扩展，我们的目标最终会实现。当今的世界市场，正在被电脑依据残存文化因素（residual cultural factors）（如：习惯用语、当地传统、宗教类别、政治意识形态、民间习俗、传统角色等）、主导文化因素（dominant cultural factors）（如：建立在消费模式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类型学、电视收视率、音乐品味、时装、动画艺术和音乐会、家庭影碟出租业、杂志订阅人、家庭电脑软件选择，参与大型超市采购等）和新兴文化因素（emergent cultural factors）（如：提供编导与观众互相交流的影碟片、备有大型图表指南的自动超市、电脑提供多层面交流的消费服务、机器人服务等），浓缩绘制成消费者地形图。我们首先必须关注新兴的市场地形，如果电脑绘制出来的 304 个消费地带图，不仅能表示出巨型消费单位相当同质的“有意识”需求，而且也能表示出微型消费者花样百出的“无意识”需求，那么，我们就能够占领整个新兴市场。目前，后一种绘制过程已经通过电脑对每个巨型消费单位高达 507 种类型的微型消费进行了定义和划分。为了扩展和控制市场，通过继续进行这种绘制，不管是最自然的还是最不寻常的欲望都可以加以重构。新兴的营销策略是，要使所有营销队伍的思路从商品本身走向商品之意识。这里指的是游击式营销的任务：要像游击队员那样，把我们创造和反对的观念灌输到那些商品意识还没有被系统地建构起来的地方。历史证明，只有发展才有

生存。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只有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才能满足公司壮大的需要。我们仍然需要控制和扩展市场，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控制生产和消费——我们需要推行一整套观念，就像游击队员那样，我们必须赢得民心。要赢得民心，我们就必须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我们的观念永不停息地得以建构和再建构。

如果除去这段引文中的电脑词汇，它读起来很像 30 年代在游击战略基础上壮大起来的共产党的一份地方分析报告，而且两者之内的相似还不止于此。游击战争的流动策略需要一种组织上的弹性——既要能适应不同环境下条件变化，又要能始终坚持组织的终极目标不动摇。同样，游击式营销的强制性要求也使得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组织必须具备一定的弹性。“全球性的地方主义”意味着大公司一方面要有组织有系统地顺应地方，融入地方，另一方面又要时刻牢记自己全球性的组织和目标。公司所扮演的这两种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自然会引起公司组织上的问题，就像那些忙于游击战的共产党集权中央所遇的问题一样。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就是这类公司的代表，他们宁愿把自己称为“跨区域” (multi-domestic) 公司，而不愿称自己为“跨国”公司，他们对公司面临的组织问题的说法，常像毛泽东描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时所持的说法，他们说：“ABB (Asea Brown Boveri) 是一个有三种内在矛盾的组织，我们既想成为全球性的，又想成为地方的；既想大，又想小；还要用集权来推进非集权。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就能创造出真正组织化的优势。”

较早时候的一句激进口号：“全球性地思考，地方化地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已经被跨国公司成功地吸

收了。营销策略中对地方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真正承认什么地方自治权，而只是打算用全球的强制性来吞并地方的独特性。让公司在当地社会中“本地化”（domestication）的做法实际上只是使权力的位置变得更加模糊，因为这些权力并不存在于地方而是集中在公司的全球性总指挥部（the global headquarters），是它在调节着公司在各个地方的分支的活动。就像日本的营销分析家 Kenichi Ohame 曾说过的（听起来又是很像毛泽东）：“全球性的地方主义”是“七分全球，三分地方”。当代跨国公司的指南性理想就是使全球同质化。同一个 CEO 这样说到：“我们真是凌驾于政府之上吗？不是的。我们回答政府的问题。我们遵守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各国的法律，我们并不制定法律。然而我们的确改变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润滑剂。”

这真是润滑剂，它顺畅地改变了诸种关系！这无疑说明了一处重要的事实：今天的跨国公司就像激进的游击队员一样，不仅要对环境做出反应，而且为他们自己的成功创造条件。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们首先必须把握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全部复杂性，而不能仅仅依赖抽象的分析范畴。这些范畴在跨国公司的分析当中充当着解释学的工具而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就像在毛泽东的作品中一样。跨国公司进行这种分析，目的不是去满足社会需要而是要确切地表达出组织机构的目的论，当然那个目的论只有用地方性语言来表述才能在各国都获得合法性。

如果全球性资本主义操作者的话听起来很像毛主义者，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毛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和游击革命者（guerilla revolutionaries）相似的情形，并且也力图通过具体的地方环境表明他们的理论。换言之，全

球性资本主义操作者的任务是，既要在不同的地方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本地化同时又不能损害资本的全球强制性。他们的分析表明一种想要解释（如包含）各种矛盾的愿望，而这些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本身的产物。这种状况的产生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来自于地方对资本的抵制，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地方对资本的抵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从宣称民族经济自治权，到非常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在那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坚决地反抗（或至少是阻碍）那些有助于资本渗透的生产关系和消费习惯。对本土文化和习惯的重新确认（*reaffirmation*）（甚至可以说是有意地宣称）已成为这种反抗的一部分，并且是构成地方语言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不过资本已经对此做出了反应，也就是把这种地方语言看成是和自己的语言一致的。就像游击式营销宣言所表达的那样，他们的目的是要解散（*disorganize*）本土文化和习惯以便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强制性来加以“重构”（*reconstructed*）。

这个问题产生于早期资本主义从欧洲和北美扩张的过程中，那时的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以欧洲中心为特征的，而地方本土性文化的抵制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某种合理性。真正使当代具有当代性的，实际上是资本成功的全球化。这一方面是对早期本土文化抵制的成功消解，另一方面也使资本在欧美的根基“非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的成功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矛盾的产生。非欧美资本主义的产生带来了一种新的声音，它呼唤不同文化结构中探求新的组成形式，这构成对欧美模式的挑战，最新的例子就是与“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individualistic capitalism*）相对的“社群主义的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italism*）概念。虽然这

个概念是个使人迷惑的矛盾修饰词 (oxymoron)，并且诉诸本土文化合法性的做法可能正是为了回应资本主义的要求而重建过去的历史，但是这个问题仍然与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同质性相冲突。

同样地，资本的全球化在一些新的地方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争夺市场的竞争，即使这种竞争基本上只是关于谁能最好地“重建”地方消费习惯，但它的确使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地方消费习惯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垄断状况下，公司可以专注于对生产性质的抽象研究，但是现在，公司必须认真考虑具体的消费习惯和具体的营销环境。汽车工业的例子最能说明这种新的现实，就像日本的制造商一直说的，美国的制造商就因为忽视消费者状况而丢失了市场。最后，资本的全球性的和地方性的同时成功，意味着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资本的推动者的分化，也就意味着资本不得不充分考虑到以前曾经只具有边际利润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妇女、种族团体 (ethnic groups)、年龄群体 (age groups)，等等。因此这些群体也必须加以解散以利于“重建”，也就是说必须分析他们已经具有的复杂性和他们的思想意识，而不再是用一些抽象的范畴来加以认识。

无论如何，资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分裂，以便于按照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图景全球性地重建社会。在当代环境下，散裂化和同质化同样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条件。用结构语言，我们可以把这种环境描述成“结构连接” (conjunction of structures) ——全球性资本的结构与地方存在的结构之间的连接——的产物；用计算机语言——对资本操作者来说如此熟悉的一种语言，这些环境就是一种“界面” (interface) 状况。这样，空间化范畴就成为一种存在的条件；时间性的不确定性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一种已经过于确定的结构连

接，不容许轻易地预设未来。一种全球性图景和跨国化的机构也许有助于容纳这些矛盾。但是为了解释矛盾，这种图景和机构必须加以调整，因而现在这些矛盾成为人们关注的首要对象。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却远未终结。如果抽掉它的意识形态成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世界时仍然是有效的，并且在当代众多进行激进批判（radical criticism）的后现代主义理论那里仍然有生命力。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了，它的理论一致地受到破坏，它的概念也被解构了。但是资本已经吸收了它（其原因却迥异于这种理论的初衷）。与资本通过“现实世界”获得力量相反，激进的批判看来只能够拙劣地模仿它所批判的散裂化状况。资本仍然希望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论来“重构”矛盾，而后现代的批判却不同，它已经直接地将所有目的论都抛弃了，这使得它既缺少一种指南性的理想图示，而且在面临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提示过的组织化历史时，也没有任何想要说明组织化活动的意愿。

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什么地方仍然是一种关于解放的理论和话语呢？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也许并不完全是反讽地），那些过去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分子这个时候也以怀疑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值得尊重。但就是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同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最相似，资本已经从地域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真正成了全球性的这个时候，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地成为跨国的；而且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再造、复制相同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而产生的同质化结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今天很少有激进分子会追问：是否社会

主义国家的解体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不相关性 (irrelevance), 或者它是否为一些人提供了某种借口, 这些人的阶级利益——不管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中——要求永远地怀疑和“埋葬”(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报复性术语) 作为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话语的两个方面确切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 坚持整体性, 坚持阶级分析的首要性。后结构主义抛弃整体性, 不过是对激进分子抛弃所有的“基本的”历史话语 (“foundational” historical discourse) ——包括作为资本主义在现代历史的“基本身份” (foundational status) 的那些话语——的一种仿效。这实际上也是对“散裂化”和“差异”的盲目崇拜。他们把诸如此类的概念当成是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压迫问题的民主化方式由以产生的源泉。同样地, 阶级这个概念也遭到批判, 因为它“特权化” (“privileging”) 了一个特定的高于其他阶层的压迫阶级; 也因为它坚持社会位置固定化的可能性; 以及因为它假设了一个主体, 这个主体因阶级分布而被固定化。仔细分析起来,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缠绕的: 作为社会范畴的阶级的首要地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本身份之上的, 而否定其首要地位又立即引起关于资本主义在社会与历史中的基本身份的问题。

上述的观点应该很清楚了,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整体化出路 (totalizing solutions), 因其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相关, 而使得既不可能也不受欢迎, 这个问题我下面还会深入分析。而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即有人认为任何对当代问题的分析 (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案), 可以不用管资本主义下的整体概念 (totality), 也不用管作为首要议题的阶级问题。对整体性的拒绝忽略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 即如何看待当代

激进主义，如何在控制和压迫力量在其所在地和实施处都相当整体化（totalistic）的情况下，提出非整体化（nontotalizing）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在当代激进的批判中，如果省略这些基本问题，就必须对模糊这样一种区别负责，即对批判社会分裂和压迫的流行形式与使之合理化之间的区别。也因此，激进批判听起来往往像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说辞，激进主义者常给人造成他们与压迫体制合谋的印象，而这个压迫制度就是他们宣称要加以批判的。这在他们对阶级的拒绝中表现最为明显（这种阶级拒绝和阶级限制非常不同，阶级限制下面会评说）。对于“主体之死”（death of subject）病态的执着，或者对主体位置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无尽推断，不管他们在同义反复的抽象中听起来多么有道理，他们还是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掌握着控制权，而另外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他们是因为什么或如何被人控制了。诸如此类的争论没有认识到那些非主体掌握着世界的财富而另一些人则在挨饿。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否定“主体”的做法，其实抽掉了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基础。政治变成了“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在任何有意味的方面结束了否定性政治（negating politics）。

在论文的前言中，我曾提到，阶级的概念，在非常抽象的意义上，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公然反抗权力的抽象运作成为可能。不用说，阶级的概念，像其他任何概念一样，对于一种目的论的和简单主义的解释方式来说是有缺陷的，因为这种解释方式使概念变成一种纯粹的社会范畴，剥离了它的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性，使它容易被意识形态和政治所操纵。然而，阶级身份的抽象性使得取消其他政治身份要求变得很困难，并且也造成对把政治空间缩减进入到阶级的空间的持续反抗。同时，诸如性、道德等概念，——不论它们对指向不同社会地位和政治



权力的激进批判多么重要——也自愿地要求在它们的具体联系中得到身份认同，并轻易地被掩盖在具体一致性的假象之后，这种一致性的活力来自于权力关系（例如他们的供应商的阶级利益）。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操作的工具，而这种意识形态操纵最大限度地导致了一种排他主义的（而在道德上就是邪恶的）政治生物学——现在这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政治的主要特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天如此之多的理论活动正致力于克服过去批判中的概念约简论（conceptual reductionism）时，“整体性”这个概念却被认为应该加以抛弃了。这种力求在相互关连的关系中揭示社会范畴的企图，一开始就给自己预设了一个比任何一个范畴所能提供的都大的空间。这说明问题不在“整体性”的概念，而是在于我们怎样看待“整体性”（即怎样划定“整体性”的边界），以及对待整体性是否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即用一种或另一种范畴来取代“整体性”）。“差异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要求理解并尊重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并要求密切关注处于整体同质化过程中的地方自治权。但是，如果不考虑一种更广泛的整体性，那么对差异的强调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都是无意义的：一是强调一种社会群体面丢弃其他的社会群体，二是强调一个地域面忽略其他的地域。无论我们对“差异”持有多么深厚的游戏式的同情，无论我们对社会群体和地方自治权多么尊重，几乎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自相矛盾的幼稚想法。总之，对“差异”的强调看来是为了避开资本主义的面临的问题而设计的，这些问题为社会整体性概念和理论话语本身的定位提供了广阔的语境（context）。正如社会存在被社会关系网络过分清晰地确定，最终，理论话语自身也要被这一文本塑造。如果强调区域高于全球，到了好

像区域可以脱离全球而被理解的程度，那么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且这还会产生认识论上的误导，尤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

无论如何，一种关于解放的话语是无法避开对“整体性”问题的，因为整体性概念——即使不是对解放的目的，也是对关于解放的环境的综合“认知图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差异政治学”混淆结构与同质化之间的区别，认为资本对世界结构的强调自然而然地表明一个被资本同化了的世界。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结构本身就意味着构成它的关系之间存在的差异。激进批判对“整体”的拒斥实际上使激进分子丧失了绘制构成世界关系之图的能力，而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操作者，他们可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激进分子对整体性的焦虑。实际上，激进分子在使人们对全球权力现实状况越来越感到迷惑时，却为资本的运作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遮掩，使人们把这种运作每天产生的问题当成是一种对于解放的承诺。

为什么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整体性”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其原因可以由当代阶级构成来说明。斯克莱尔 (Leslie Sklair) 在他的《全球体系社会学》中认为，国际资本的优势地位的产生，伴随着“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出现，这一阶级服务于国际资本，为资本的全球运作提供便利，并且使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普遍化。国际资本的意识形态不仅强化了这种现象，而且强调它建构全球关系的方式，包括对第一与第三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塑造。罗伯特·里奇 (Robert Reich) 是一位重要的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家，现任克林顿政府的劳动部长，他力图按照全球性资本所创造的新的世界形势来调整美国经济。里奇认为，资本的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劳动的性

质。他对劳动进行新的划分，认为劳动分为三种：“符号分析者”（“symbolic-analysts”）、常规产业工人（routine production workers）和普通服务工人。他认为，不论对国家经济来说还是对劳动的国际分工来说，权力都是建立在运用“符号分析”功能的基础上，而这种功能对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里奇并未谈到实际上是人口中的极小部分控制着美国经济 50% 的资产，但即便如此，他所提出的劳动分类法仍然是建设性的。那些运用自己的头脑进行工作的人（即“符号分析者”），构成本国的和全球经济的统治阶级，而那些运用自己的体力从事劳动的人就成为经济的下层阶级。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作为决定阶级地位的主要因素而进行划分的做法也许并不新鲜，但它现在具有了全球性特征。这种分法同样是使世界划分为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基本根据，因为符号分析功能（进而是研究和发展）要求一种控制全球经济的权力，而常规生产和服务工作则被贬低到了第三世界范围内。这样，在全球经济中的阶级分析就对应于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划分，而这两者都依赖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

这里的关键不是在于这种分析对世界的描述是否可以不再受到指责，因为在现在激进改革的时代，现实状况比这种分析所提到的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关键在于那种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里奇（或《哈佛商业评论》）通过一般公认的激进分子急于加以否定的概念化过程分析了它的运作，他们的分析非常清晰、广泛，并且注意到了种种区域细节。因为他们只有抹平全球性经济的不平等，才能巩固它，并保障它所产生的权力关系。无疑，激进分子排斥整体性问题和全球资本主义抛弃阶级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精神的缺乏和意识形态的无知。

## “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研讨会综述

薛晓源

“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全国学术研讨会 1998 年 5 月 6 至 10 日在深圳大学召开。这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特区报社、深圳市委党校、深圳市综合治理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李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等老领导、老专家和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单位和理论宣传部门、新闻出版部门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教授出席了会议。

这是国内近年来规模较大的、有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学者参加的有关全球化的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学者们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金融、党史、文化学等学科出发，围绕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和深远影响，全球化趋势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球化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等

五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全球化概念是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提出的，并在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得到普遍使用。80 年代，全球化概念演变成一个描述未来发展趋势及其特征的基本概念。9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问题成为世界上各传媒体关注的热点。90 年代以前，从全球化进程的发轫来看，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西方势力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武力的支持下进行的世界范围的扩张；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是全球化进程中最主要的活动者。这些特点使西方全球化理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90 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的剧变，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进程的新时代，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全球化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把粉碎“西方中心论”明确列为建构全球化理论的首要任务。此次研讨会对建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作了积极的、有益的探讨，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变化、深化的过程。全球化进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其发展的动因源于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国际贸易的扩大、国际金融的深化以及知识产业迅速崛起等。全球化进程的未来不应该是一元的、单一模式的普遍化，而应该是多元化并存、多种模式共生的局面。而且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是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等不同共同体的积极参与、平等对话、相互交融，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的共同利益得以在全球化范围得到共识。代表们特别强调，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上就是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

在参与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增强了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影响的实力。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更要不断地革新自己，抛弃陈旧落后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改革体制，学习先进的思想与方法，励志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沦为边缘，同时也能为全球化进程的顺利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众多问题达成共识基础上，一些学者对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上限划分也提出不同意见。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其发轫可追溯到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也有学者指出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全球化就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开始了自身的发展历程；还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全球化历程的真实起点，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核心内容就是市场经济。

与会代表认为，在今后研究和实践过程中，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关注全球化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二是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使对全球化进程的研究向跨学科和多学科方向发展；三是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也要警惕狭隘的“中国中心论”的倾向。总的来说，本次研讨会为继续深入对全球化进程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同时也为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合作以及多学科的交流提供了有益经验。

## 后 记

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深圳特区报》、深圳大学联合主办，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具体承办的“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研讨会”，于1998年5月6日至10日在深圳大学顺利召开。此次会议还得到了中共深圳市委南山区委宣传部、深圳大学文化科技服务公司、深圳市综合治理协会，以及深大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铁行渣华（深圳）总经理黄树人先生、深圳康达尔（集团）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郝耀聪先生等鼎力资助。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学者欢聚一堂，畅所欲言。朱厚泽、李锐、李慎之等老领导、老专家也饶有兴致地出席了会议，并作了精彩的演讲。会议结束后，我们将此次研讨会的有关论文和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全球化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若干成果一并汇编成册，以期推动世纪之交我国理论界对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现象的研究。此书的出版得到许多部门、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谨代表会议的主办和承办单位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俞可平 黄卫平

1998年10月6日